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N YEN-KING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5061/5600.1

65
MAY 27 1959

中國語文

ZHONGGUO YUWEN

3

1959

师提
面不
解放,
物。

。

实际,

汉字
人的語
問題,

点、方
水平。
务而努

加教研

组的同

0

局

局

書店

5 册

2-44

1959年3月号(总第81期)目录

- 試談一年来文字改革工作的跃进情况 杜 松 寿 (101)
- 外来詞拼写法問題 周 有 光 (106)
- 談談高名凱先生的治学态度 王福祥、赵云中、胡孟浩、吕国軍 (114)
- 关于汉语副詞轉变为其他詞类的問題 ... [苏] E. H. 罗日捷斯溫斯卡婭 (119)
- 現代汉语詞語的縮簡 筱 文 (125)
- 广东陽江話物量詞的語法特点 黃 伯 榮 (128)
- 晋东南方言中的“圪 ke?” 王 迅 (130)
- 《詩經》中成对关联詞的格式 竹 安 (131)
- 关于改进汉语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几点意見
南京大学中文系語言教研組 (133)
- 語文短評
- 評《由“可畏”到“可愛”》 楊 万 昌 (135)
- 写作时要正确对待用字 安 汝 磐 (135)
- 《中国語文》二月号一篇文章中的語言毛病 宋 玉 柱 (136)
- 書刊評介
- 对張濂华《現代汉语》一書的意見 楊長礼、胡振荣、李子云 (137)
- 評介《人文杂志》批判傅子东的文章 李 千 英 (140)
- 《有关語言学的几个問題》簡介 管 燮 初 (141)
- 語文筆記
- 談“軋”字的讀音 陈 鉄 卿 (118)
- 把話說得簡洁些 郝 小 洲 (144)
- 語法研究上要求加强协作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現代汉语小組 (142)
- 語言学名詞解釋(六) 北京大学語言学教研室 (145)
- 动 态
- 山东师范学院語言教研組的新跃进 子 朗 (127)
- 湖南师范学院語言教研組的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 秦 旭 卿 (134)
- 讀者 * 作者 * 編者 (150)

們全
進。
胜利
个形
擬备
錢的
同志
切关
作用
巨大

曹耳
化体
关的
化一
些展
舉出
难以
們是
一样
从去
解地
原来
立新
多的

国人
广大
数不
使用
“汉
的。
地名
以前
的突
給我

試談一年來文字改革工作的躍進情況

——祝賀漢語拼音方案產生一周年——

杜松壽

一年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各項建設飛躍發展，我國全國人民艱苦而愉快地參加了祖國建設空前的大躍進。這是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所規定的總路線的光輝勝利。作為文化革命內容之一的文字改革工作隨着整個形勢的發展，在黨的領導和重視之下也出現了令人鼓舞的躍進局面。在整風反右勝利的基礎上，在總路線的精神鼓舞下，全國人民尤其是文化教育戰綫上的同志們認清了文字改革工作和社會主義各項建設的密切關係，認清了它對學習文化和發展生產的積極促進作用，因而在文字改革的當前三大任務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成就。

簡化漢字在廣大人民，尤其是工农群眾和學生的書寫中已經扎下了根，人們不再論長論短，指責這個簡化體，批評那個代用字，而是相反，嫌簡化得太少了。有關的雜誌常接到這樣一些讀者意見：有的說“還得再簡化一批字”，有的提出了自己的新的簡化方案。到過一些展覽會，參觀過各地人民公社或學校的同志們不難看出很多新產生的簡化字。特別令人興奮的是，連最難以更改的生僻地名字也開始動搖了。人們習慣於他們縣名鎮名的老寫法，就象習慣於他們的姓氏的寫法一樣，有了某種感情，雖然麻煩些也不願意改。但是自從去年10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出“更改一部分生僻地名字的建議”以後，各地即紛紛響應，表示願意把原來生僻的地名字改為容易寫容易認的同音字或者另立新的名稱。河南省民政廳還進一步建議本省更改更多的縣名用字，並建議更改一部分鎮名用字。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同志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說：“目前大群眾對於簡化漢字是熱烈歡迎的，但是簡化的字數不多，不能滿足他們的迫切要求——這是目前群眾採用簡化漢字方面產生一些分歧現象的主要原因。”“漢字簡化工作必須繼續積極推進，使所有比較常用的、筆劃較繁的字都能逐步得到簡化。”“還有一部分地名用字，或者筆劃較多，或者生僻難認……也必須加以簡化，或者用同音而筆劃簡單的熟字代替。”一年來的實踐證明了吳老這些話充分反映了群眾的要求，也我們指出了今後漢字簡化工作的正確方向。

一年來普通話的推廣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別引起人們注意的是福建大田縣吳山鄉。該縣是個山區，交通不便，而且方言複雜，本縣的人相互了解都有困難，更不用說跟普通話差別之大了。但是在當地的黨領導之下，以陳進四同志為首的共青團員們破除迷信，鼓足干劲，發動群眾，居然在全鄉實現了普通話化。這真是一個奇蹟，許多人都不相信，但通過大田縣在該鄉召開的現場會議，人們的懷疑消釋了。一位副教授參觀後不得不說：“大受感動，大受啓發，大受教育。”另外一位參觀者也承認：“過去不信，思想糊塗；今日一見，口服心服。”

吳山鄉推廣普通話的成功，說明了兩個問題：1) 方言複雜和跟普通話差別懸殊的地區雖然學起普通話來比較困難，但是在全國大搞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形勢下，反而愈加需要學習普通話。客觀上的迫切要求必然要戰勝主觀上的技術困難，這就是吳山鄉出現奇蹟的平凡道理。2) 一般說學生和知識分子，比起農民來，要容易學會普通話。因為一則他們認識漢字，已經掌握了普通話的語法和詞彙，僅僅是語音上需要努一把力。可是書面讀音多跟普通話相近，也有規律可循。二則他們外出的機會多，要求更迫切些。但是1958年的大躍進，打破了这个常規，全國廣大勞動人民交往的機會也多了，協作空前頻繁起來，全民學習普通話的要求普遍迫切起來，而不再是只限於知識分子階層的需要了。吳山鄉的經驗正是告訴我們，普通話的推廣在新形勢之下已經成了全民的事，它已經走出學校的圈子而逐步深入廣大農村了。

接着吳山鄉普通話的推廣，全大田縣也搞開了，福建全省也動起來了。據悉全省已有三分之二的地區約44個縣，在青壯年中基本上實現了普通話化。在其他方言地區，如廣東的東莞縣和潮陽縣，江蘇的崑山縣等也都實現了普通話化。北方話區的江蘇新沂縣，山東鄒平縣，河北河間縣，河南登封縣、叶縣等都是農村中推廣普通話成績優良的地區。上海新成區飲食業學習普通話的試點工作，給在城市推廣普通話作出了良好的榜樣。

由於群眾政治覺悟的提高，而且把學習普通話當做一項政治任務，原先長期在群眾中所存在的思想障

碍瓦解了。因此，只要通过一番思想动员、大辩论，就可以形成学习的高潮，打破羞脸、解除顾虑，大胆地讲起普通话来，并且形成一种人人讲、到处讲的风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七十几岁的老大爷讲普通话，也看到女学生回家去坚持对妈妈讲普通话，还听说有的夫妇在床头也讲普通话。这儿解决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对不同对象学习普通话有不同要求的问题。当然，我们应该肯定，对不同对象应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这种要求还必须以知识基础和学习条件为标准，而不是绝对地从人们的身分职务之类出发。比方说，广播员和演员要讲更标准的普通话，这是对的，因为他们的职务和能力都要求作到这一点。对学校教师和学生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对于一般群众，对于工人和农民是不是就是只要求声韵母合乎或接近标准音而不必考虑声调呢？一年来的事实证明，方言悬殊地区不光是学字音，而且也学词，甚至于学习区别一些语法上的差异，因而声调也就一同学习了。他们学着说：“同志，你到哪兒去？”“大家都要学普通话”，就是整个仿照北京音说的。至于北方话地区，差别主要在于调值，所以掀起了全民性的学习普通话高潮的时候，总是把声调一块儿考虑进去的。比方河北省河间县掀起全民性学习普通话的高潮时，群众不仅知道他们应该纠正某些字音，而且都能说出他们学北京阳平声最困难，是他们学习的重点。自然，领导普通话工作的同志应该根据不同对象作不同要求，具体说，对农民不宜要求过高，一般不要求他们改变声调。但是我们的认识也不要落后于实际，当群众已经自动地在学更标准的普通话时，我们如果还是唱着老调，那就不对了。应该知道，学习声调一般是按自然的系统类推的作用，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记的。学习上的困难主要是思想障碍：怕羞，不好意思。当学习普通话形成全民性的高潮时，这种思想障碍就被冲垮了，从而鼓足了勇气连声调也改了（虽然是不彻底的，粗糙的）。而且在学习效果上，只有改了声调才更易于想到音韵的标准，更容易引起进一步学好普通话的决心。从改声调开始，可以说是给下决心学习普通话押了注。对全民性学习普通话时这样处理声调问题的看法是客观实践告诉我们的，而不是什么人坐在办公室里主观地想出来的。因此它值得引起我们注意。

福建省大力推广普通话的经验证明，大家都说普通话不单纯是方言不同的人彼此能听得懂的问题，虽然这是主要的。经验还证明，由于大家都讲普通话，还得到了一些意外的收获。这些收获直接为政治服务，有利于生产建设。这些收获主要是：1）来自不同方言区的干部，以前因为语言不能畅通，交流思想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因而影响到相互了解；现在由于讲了相同的话，便于交流思想，相互了解，干部中的团结

也就加强了。2）过去外地干部由于语言关系跟群众里，总有一些隔阂，现在干部、群众都讲普通话，关系密切了。3）先前普通话广播筒下无人去听，人们只听方言广播，现在大家都愿意收听普通话广播，因而党和政府的政策能更多地跟群众见面，群众的政治觉悟更加提高了。4）先前由于语言隔阂，生产经验不好交流，现在可以广泛地交流经验，从而促进了生产。5）群众在田间劳动时也学习讲普通话，改变了过去爱玩用方言嘻闹的风气。说普通话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6）全县性的报告会再不用人做翻译了，从而节省了时间，增强了工作效果。7）熟习普通话给学习普通话准备了条件，从而便利学习文化。福建省把推广普通话和扫盲结合起来是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群众对于普通话有这样一些好处，所以群众非常热爱它。他们说：“普通话真正是咱们普通人的话，再不是官话了。感谢党把它交给咱们人民。”

1958年普通话的实践经验和跃进形势给今后推广普通话打下了基础，增强了信心，提出了方向。这种形势经过中央召开的“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更加迈进了一步。这次会议是七八月间召开的，它开阔了全国推广普通话的力量，交流了经验，从而增强了信心。

在推广普通话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个别地方也有做得不够好的现象，需要注意：1）对方言的态度问题。方言是历史的产物，今天还有它的作用，今后还将长期存在。即使大家都讲普通话了，方言还会在小范围内继续行使。在学习普通话的时候，为了学得更快更好而强调只说普通话不说方言，这是可以的；但是提出消灭方言或方言光之类的口号就不合适，应该避免。2）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大力推广普通话是对的；但是方法上必须本着自愿原则。要进行思想动员工作，启发群众的自觉。不要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迫群众学习，否则对不讲普通话的人加以某种精神压力或讽刺。学习普通话是长期的，不能一阵风，运动过去了就着凉下去。发生这种现象的地方应该重整旗鼓，掀起第二次的高潮，并且从此坚持下去。4）应该把推广普通话同推行拼音字母密切结合起来。只有通过拼音字母才能使普通话学得更加巩固更加彻底。广东、福建某些地区是先学普通话的，他们获得了一定的效果，现在他们已经认识到学习拼音字母对普通话的积极作用。吴山乡于去年九月就在普及普通话的基础上开始了拼音字母的学习，全乡青壮年基本上都掌握了拼音字母。该县推广普通话的红旗陈进四同志自从月间学会拼音字母以后，普通话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我们很高兴地获悉福建省在1959年文改工作

里，把推广普通話和推行拼音字母密切地結合起來了。

汉语拼音方案从去年2月第一屆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到今年2月整整一年。由于汉语拼音字母的正式产生和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文字改革工作的發展更加广泛深入了，一年来取得了輝煌的巨大成果。

首先是在全国訓練了大批的教师作为推广拼音字母的骨干力量。据極不完全的报导，山东省共訓練各类拼音字母教师二十四万多名，河北省除举办了九次省訓練班以外，許多县市如河間、保定、定县、怀安等都設立了訓練班，河南省普遍訓練了教师，仅許昌专区就訓練了二万五千名教师。成績比較好的县市有登封、叶县、开封市、新乡市、扶沟等二十几个地区；东北三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小学語文教师学会了拼音字母，成績較好的有哈尔滨市、开原县、長春市、沈阳市等。广东对培养拼音字母师资也非常注意，比較作得好的有广州、普宁、汕头、潮阳、揭陽等县市；北京除一部分中小学教师学了拼音字母外，永丰屯試点并訓練了213名民校教师；山西普遍訓練了中小学教师，其中文水、万荣、稷山、临猗等县的成績比較显著；四川、貴州等省也都开办了教师訓練班。此外，江西安义、鉛山、湖北麻城、甘肅兰州市、湖南湘潭、長沙、貴州爐山、陕西宝鷄、邠县、長武、吳旗、西安市蓮湖区、福建龙岩、青島、青海西宁市……都是訓練师资較好的地区。

一年来不少师范、中小学生学习拼音字母，1958年下学期約有二千万以上的一年級小学生普遍学习了拼音字母。作得好的还帮助学校附近的农村或街巷群众教学，帮助群众注标語、設立拼音識字崗。有些大專学校的师生拼音字母学习得很好，如山东曲阜师范学院、菏泽师專、北京人民大学、福建厦門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学院都曾掀起学习拼音字母和普通話的高潮，北京大学中文系并設立了文字改革課。

部队学习拼音字母和普通話的干劲也是很大的，如沈阳部队为在官兵中推广拼音字母，訓練了一百八十名教师，9376部队五百多軍官学习了拼音，其中四大队全体官兵都学会了，空軍2912部队官兵五千多人学会了拼音，在福州前綫的解放軍某部軍官全部掌握了拼音字母。

不少机关的干部也都学会了拼音字母，如南京铁路电报所、浙江邮电管理局、北京百貨大楼的职工、陝西省直屬机关党团干部、广东高要專署直屬机关干部，都学习了拼音字母。中国科学院中年和青年干部有六百多人参加了拼音字母学习班。

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掀起了学习拼音字母的高潮。

如呼和浩特和內蒙开魯县都开班訓練了拼音字母教师。广西僮族自治区采取巡回教学的方式訓練了二百五十名拼音字母教师。康藏高原上的甘孜自治州在康定、瀘定、甘孜三县举办了拼音字母师资訓練班，职工干部也参加了学习。

在公共場合也逐渐出现了拼音字母。全国大多数杂志报纸的报头下和封面上都用拼音字母注了音，商标圖样、商店包装用紙、电影广告、商店櫥窗和招牌上也出现了拼音字母，上海、旅大市等的主要路名，济南铁路局所屬津浦、胶济、隴海各綫路站名牌也都注上了音。这种令人兴奋的場面正日益扩大。

同时在国外，兄弟国家已經用汉语拼音字母教汉语，国际友人中的汉学家也有用它給我們写信的。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字也以它为依据創造或調整了自己的文字。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重1958年在文字改革方面也是不平常的一年，汉语拼音字母被广大人民衷心地接受着，推广工作在轟轟烈烈地开展起来。

應該特別談到的是利用拼音字母扫盲和提高巩固扫盲成果的問題。吳玉章主任在談到汉语拼音方案的用处时說：“第一，是用来給汉字注音，以提高教学汉字的效率。”“初学文字的兒童和文盲，就可以依靠拼音字母閱讀書报，并且进一步認識更多的汉字。”^①吳老的这番話完全为一年来的实践所証实。差不多是跟人民公社在全国逐步建立的同时，在一些地区的农民、工人群众中也进行了拼音字母教学的試点工作。規模較大的是山东省、河北省。山东以平原、历城、泗水、济南为試点地区。河北以保定和定县为試点地区。江苏南京栖霞山試点、江浦县和崑山試点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北京市永丰屯試点已取得了初步的优良效果。此外，貴州的修文县和东北的部分地区也都进行了試点工作。

这些試点地区的成績，証明了拼音字母对扫盲和提高巩固扫盲成果的積極有效作用，因而贏得了群众的喜爱。下边引用一些群众自己对拼音字母的評語和生动的事例來說明这个問題。

山东历城貧农出身的張永勤同志，沒学拼音字母时学了三百二十四个汉字，两天不看就忘得差不多了。学了拼音字母以后，每晚能記二百字，离开拼音也能記百分之六七十。他兴奋地說：“拼音字母真是农民的宝贝，有了它，农民就能很快地变成識字有文化的人。”

山东莘县車貴平說：“过去一字学不会，找人教給跑折腿。現在見字不認識，把嘴一張就拼会。”

^① 吳玉章：《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1958年2月3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會第一屆第五次會議上的發言。

保定地毯厂扫盲以后停课日久，大多回生了。惟有楊秀芬因常看“拼音看圖識字”沒有回生。其他几位学过拼音字母的忘了三分之一，沒有学的忘了三分之二。但認識拼音字母的保証說，两周以內要抓回来，不認識拼音字母的就覺得困难了。

山东平原張昭英說：“过去看書，掀开書本，遇到不認識的字就没办法。意思不懂就看不下去，也就不願意看了。現在有了拼音字母，不認識的字，拼拼順順，就看下去了，越看越愛看。”

一位貧农出身的农业社主任吳友仁同志認字不多，沒法看文件，沒法記錄，学了拼音字母以后，帮助他認識了很多汉字，能看簡單的文件了。記筆記時写不上的汉字就用拼音字母代替，工作越来越方便。他感激地說：“拼音字母治好了我聾啞瞎，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拼音字母的好处！”

学了拼音字母也可以解决暂时不識汉字或識字不多所發生的困难。山东鄒平县的殷玉玲还不会使用汉字，她用拼音字母給她的解放軍丈夫亲手写了信，說出了自己的知心話。河北完县一位村支委曹洛芬同志，是53岁的文盲了，父子两輩給人当長工。他用20天工夫学会了拼音字母，写出了下边的詩：“我的名叫曹洛芬，扛了長活十八春。剝削制度真难忍，階級敌人是狼心。共产党来了咱翻身，苦命人变成了幸福人。农业跃进再跃进，粮棉堆起頂破云。文化革命高潮起，汉语拼音称我心。老年也愛学文化，尽忠祖国报党恩。”感謝拼音字母，这位老人写出了这么好的詩。

下边几位同志的話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对于拼音字母的态度和心情。河間县的楊澤如过去年年上民校，文盲帽子总是摘不掉。学了拼音字母，巩固了一千五百个汉字，还多認了五百多个字。他逢人便說：“拼音字母用处真大，我算是知道啦！”北京市永丰屯文盲謝景龙学了拼音字母以后用拼音字母写道：“汉语拼音是明灯，照到哪里哪里明。文盲要是学会它，好象失明变双明。”山东平原王瑞和說：“过去学汉字，难于上青天。如今有法宝，老粗把身翻。扫盲不費勁，只需二十天。感謝毛主席，恩情重如山。”

各地試点的成功經驗加强了人們的信心，人們認識到拼音字母确实是帮助扫盲和巩固提高扫盲的有力武器。全民性的學習拼音字母运动在若干地区展开了，河北省河間、保定、怀安等十余县，11月以后全面展开學習，估計全省有一百多万人在學習拼音字母。該省在省委和教育厅号召之下已經进入全省逐步普遍推行的阶段。山东全民性學習的地方有鄒平、范县、宁阳（葛石乡）等县，估計有一百三十三万人在學習拼音字母。其他全民性學習的地区有福建的四十几个县，山西万荣、稷山、临猗閭家庄，江苏崑山、新沂，河南叶县、登

封等。黑龙江和辽宁计划在一年以內全省少年青壯基本上学会拼音字母和普通話，吉林省准备以两年未完成这项任务。

虽然汉语拼音字母主要是用来帮助學習汉字和普通話的，但是还具有一些其它的用处，这些用处对于学技术的掌握有很大的帮助，从而有利于我們的建設事业，同时也只有把拼音字母在各方面加以利用才能使人民群众在生活中对它更加熟悉，更容易成为整个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回顧一下短短一年里这方面的成就，也是令人十分滿意的。先是拼音电报的使用。六月間上海鐵路局即試用拼音电报，济南鐵路局青島电务段“七一”起試用，9376队直屬无綫电队以及其他單位也采用了拼音电报。国庆节起国家即正式开办拼音电报。汉语拼音电报的推行不仅是我国电报业务一大改革，而且也具有重大文化革命的意义。

汉语拼音方案产生以后，我国原来的盲文符号体制即据以进行修改，同时也拟定了盲啞人使用的指字母。这不仅对盲啞同胞有很大好处，而且也給啞人和視听觉正常的人在相互利用書刊文件上以便利。

在利用音序方面也有了很好的开端。商务印書出版的《农民詞典》即已按a b c的音序排列，按a b c音序排列的《新华字典》新版本已經編好待印，这给全国学过汉语拼音方案的广大群众在查字方面以很大的便利。也有不少地方圖書館在試行按a b c音序目的办法，如孙一民同志用新方法查書，十册所需時間由原来的二十分鐘减少为三分鐘。安徽省高級人民院档案室已經用a b c音序編排档案索引卡片。文改出版社和屯溪日报印刷厂等都按照新的音序改了字架。医院和公安部門等原来用其它拼音方案排人名卡的也逐步在改用新方案排列。也有按新汉语拼音字母排列病历表的（如商县医院）。

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代号，以代替原来的外文字母，以减免各种外文代号的混乱情况，也有人在試驗，效果良好。如秦岭电工厂赵永利同志把汉语拼音字母用于产品分析試驗报告里，某工业部也把汉语拼音字母作了代号。旗語也依据汉语拼音方案进行了改革，北京海俱乐部在这方面作了出色的工作。他們用新旗語練了三十一万多名大中学生。預計这项旗語将在中小学生和民兵、勘探人員中普及开来。随着拼音字母的产生也出現了一些拼音玩具，这里就不細說了。拼音字母应用到科学技术上去是社会主义建設所需要的，过去一年来虽然作了不少工作，但畢竟还是个端，希望1959年有更多、更深入、更广泛的成就。

在此汉语拼音方案产生一周年的时候，回忆一

短短一年来的各项成就，我们不能不为它的成功而祝贺，不能不为文字改革的光辉前景而振奋。

一年来文字改革工作的跃进固然是整个社会主义跃进形势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促成的，但是党和人民政府所规定的正确的文字改革方针和大力支持，却是重要的决定因素。1958年一月间，周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二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的发言；三月，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地进行汉字的改革”；中央教育部发出在中小学和各师范学校教学拼音字母的通知；七月，举行“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接见了到会代表并作了指示；九月，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出联合通知，作出商标图样和商品包装上必须加注拼音字母的规定；中央邮电部发布从国庆（10月1日）起开办汉语拼音电报的通知；十月，文改会在北京举行文字改革展览会，并向部分省市县发出“更改一部分生僻地名字的建建议”；十二月，中央教育部发出关于介绍山东、河北两省拼音字母扫盲试点经验的通知。从七月起一直到最近，文字改革委员会吴玉章主任先后到河北、东北三省、河南、武汉、上海、江苏、山东、北京市郊区等地了解情况并指示工作。

一年来我们在文字改革工作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也获得了不少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是党委重视，书记挂帅；依靠群众，作好思想动员工作；训练师资，培养骨干力量；结合生产，结合政治，造成学习环境。从各地推行的情况看来，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有几点应该特别注意，主要是：1) 普通话和拼音字母的经常使用问题。搞起一个运动，掀起热潮，不是很难的，困难的是，运动过去以后如何把拼音字母和生活密切结合起来，愈用愈熟悉，愈用愈发现文字改革的更大的作用。这方面山东鄒平和河北河间都已经注意到了，而且有了初步的布置和经验。这是全国各地应一致注意解决的问题。2) 教材读物问题。只有配合上足够的教材读物，才能使普通话和拼音字母得到巩固并且经常化。过去一年，文字改革出版社编印了有关图书二百多种，对全国的推广普及工作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必须进一步扩大数量，提高质量。同时地方也必须自行解决这方面的問題，这不仅是为了数量上的要求，而且主要是为了使教材内容更能结合当地实际更能配合当地生产任务、配合政治教育上的知识传授和宣传鼓动。一年来各地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成绩，如山东省编印的课本、读物

在一百五十万册以上，并出刊了拼音小报。河北省也编印了大量教材、读物，而且从1958年的第四季度起，《河北教育》、《河北教育工农版》、《河北扫盲》等期刊都开辟了拼音读物栏。各地方出版社也出版了不少有关图书和期刊。其他如江苏新沂，山东鄒平、历城，山西稷山，厦门大学都出版了油印拼音小报，配合了当地的文字改革工作。这些已有基础的地方还需要提高质量，扩大数量；没有基础的应该积极着手进行。3) 学校必须配合上去。学校有较好的学习条件，学好之后，是周围广大农村和工矿劳动人民中进行宣传和教学拼音字母的骨干力量。一年来确实出现了这样一些先进学校，如福建的厦门大学，山东青岛的顺兴路小学，河北河间县的米各庄中学都是。但是更多的学校还没有作到这一点，有的自己还学得不够好或者没有学。各地教育行政单位和学校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4) 应该在幼儿园教学拼音字母。经验证明，五六岁的幼儿完全可以轻松愉快地学会拼音字母，这不仅为他们在幼儿园提供了一套表达语言的工具，而且对正式进入小学时准备了加快认识汉字的条件。自从全国人民大搞人民公社以来，绝大部分幼儿都进了幼儿园。所以在幼儿园教学拼音字母和普通话就有了巨大的现实意义。一年来各地训练拼音师资时大多包括幼儿园教养员在内，不少幼儿园都在教拼音字母和普通话。河间县的幼儿园在普遍进行拼音教学。希望1959年这项工作能够在全国全面展开。5) 各地应该成立文字改革协会。客观形势的发展大大有利于文字改革工作的推进，各地做具体工作的机构显然同客观要求不相适应了。各地现在只有普通话推广委员会，具体工作人员属教育厅局。这样，简化汉字和拼音字母方面的事就不能作得很全面，教育厅局同其它单位联系也有不方便之处，因而影响文字改革工作的开展。此外，各地方都有不少文字改革积极分子，充分利用这批潜在的力量也是重要的，地方如果成立了文字改革协会，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今年一月，上海、广州相继成立了文字改革协会，这是一个可喜的开始。希望各地今年都能适应客观要求成立此项组织，并为全国文字改革协会的成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年来我国的文字改革成就绝不是这篇文章所能说得完说得好的，这不仅限于篇幅，更重要的是限于作者的了解范围和认识水平，不够和不正确的地方希望能得到同志们补充、指正。

更正：本刊1958年12月号574页左栏倒7行“而‘仔’则仍然具有量词的语法特点”应改为“而閩南話帶‘仔’的量詞仍然具有量詞的語法特点”；1959年2月号82页右栏倒12行“倉頡造字說不足信”应为“倉頡造字固說不足信”。

外來詞拼寫法問題

(漢語拼音文字正字法問題之一)

周有光

一 一個新的問題

漢語拼音方案的功用之一是作為研究和實驗漢語拼音文字的基础。漢語拼音文字正字法有不少問題等待着人們去研究，其中主要的三個問題是：(1)詞的連寫法問題，(2)同音詞區分法問題，(3)外來詞拼寫法問題。外來詞拼寫法在目前科學詞匯的整理工作和世界地名、人名的拼寫工作中，已經是急於要解決的問題了。這裡對這個問題做一次一般的探討；錯誤的地方，請讀者指正。

1 外來詞是詞匯所不可缺少的構成部分 任何語言都有外來詞。外來詞是不同語言的社會或者民族相互接觸的結果，特別是文化交流的結果。外來詞的吸收可以豐富文化，擴大詞匯，發展語言。對任何一種現代語言的詞匯來說，外來詞是不可缺少的構成部分。

有人認為，漢語有“不可滲透”的特性，難於吸收外來詞，更難吸收音譯外來詞，拒絕外來詞和音譯外來詞就是保持漢語的純潔。這種見解是十分錯誤的。世界上沒有“不可滲透”的語言。所謂語言的純潔是指語言的規範化，合乎規範就是純潔，不合規範就是不純潔。拒絕外來詞和音譯外來詞，會使我們的語言貧乏和萎縮，落後於時代的要求，這樣也就談不上什麼純潔了。

漢語在近代已經有不少外來詞和音譯外來詞，到了唐宋時代大量增加，近百年來外來詞的輸入使我們的詞匯發生極大變化，甚至語法也發生變化。同時，漢語詞也在各個時代不斷輸出成為其他民族的外來詞，特別對越南、朝鮮、日本等國影響重大。

不過，由於我們的漢字是音節文字，用漢字音譯外來詞，表音既難準確，書寫又嫌繁重，翻譯者傾向少用音譯，多用意譯，所以音譯外來詞的比重小。好些世界通用的音譯詞，我們特地創造意譯詞。現在，我們有了漢語拼音方案，運用漢語拼音字母，不但外來詞的音譯方便，還可以直接借用國際通用的詞形。外來詞的新時代開始了。

對漢語來說，一切從非漢語借入的詞，都是外來詞。音譯外來詞拼寫法的原則，適用於從外國語言借入的詞，也適用於從國內各少數民族語言借入的詞。

2 外來詞的翻譯方式 翻譯有意譯，有音譯，又

可以結合為音譯兼意譯，半音譯半意譯，音譯再加意譯等方式。

例如：“民主”是意譯，“德模克拉西”是音譯，“化學”是意譯，“賽因斯”是音譯；“電話”是意譯，“德律風”是音譯。“氫”(hydrogenium)是意譯，“氦”(helium)是音譯（音譯的省略）。“浪漫史”(romance)、“生命”(vitamin)、“霓虹[燈]”(neon)、“拖拉機”(tractor)是音譯兼意譯。“冰忌淋”(ice-cream)半音譯半意譯（廣東話“雪糕”是意譯）。“酒吧”(bar)“車胎”(tyre)是音譯前面加意譯；“高爾夫球”(golf)“啤酒”(beer)是音譯後面加意譯。

一般用詞和學術用詞有以上各種翻譯方式，人名等專有名詞也同樣可以如此。例如：“冰島”(Iceland)、“牛津”(Oxford)是意譯地名；“倫敦”(London)、“巴黎”(Paris)是音譯地名。“聖大馬利安”(Santa Maria)、“聖約翰”(Saint John)、“聖胡安”(San Juan)等地名（也是人名），都是音譯兼意譯。“劍橋”(Cambridge)、“新西蘭”(New Zealand)、“南斯拉夫”(Jugoslaviya)等地名，是半音譯半意譯。“雅魯藏布江”是音譯加意譯（“藏布”是“江”的意思）。“龍果夫”(A. A. Драгунов)是半音譯的人名。

翻譯外來詞首先要考慮在意譯和音譯兩種方法中採取哪一種，意譯要考慮如何譯法，音譯又有音譯字母書寫法和漢語拼音字母拼寫法兩個問題。這裡我們討論的是漢語拼音字母拼寫法。

3 漢字音譯的缺點 漢字音譯，很不準確。如此，一方面由於漢字本身的缺點，一方面由於音譯法的混亂。

漢字本身的缺點：

1) 有音無字：漢字不能書寫出北京口語的全部音。普通話的音素在口語里的配合要比在漢字里配合靈活得多。例如，口語能說 zem(怎麼)、don(窩)、luob(羅卜)、dat(打他)、nabd(拿不得)、bladla、gla-gla，等等，用漢字就無法描寫這些音。由於有音無字，不能利用全部語音，只好用讀音不準確的漢字代替，造成音譯不準確。

2) 音節限制和常用字限制：《同音字典》收一

个汉字,只能写出 418 个音节,其中好多音节只有生僻汉字可写,还有一些音节是字典编者勉强拼凑写成汉字的。音节形式的限制,加上缺乏常用汉字的限制,汉字音译能够写出的语音就更少。例如 so 这个音节,汉字写不出来,不得不改成“苏”(su)或“索”(suo);“so 联”变成“su 联”。又如 den 这个音节,《同音字典》写作“撻”,字太生僻,不宜应用;Aden(地名)不写“啊撻”(这样译音准确),沿用“亚丁”(Yading),跟原音相去很远。

3) 字音无定:汉字一字多音,读音混乱。例如《同音字典》列有元音化的 m、n、ng 三个音节,这三个音节同样可以用“嗯、唔、伍”中任何一个汉字书写;这样的汉字如果用来说音译外来词,读音就莫衷一是。又如 ga、ka 这样的音节,外来词常常用到,却没有适当汉字可写。《同音字典》列读 ga 的汉字十一个,其中不会变成别的读音的只有四个生僻字(沓、孕、主、钁),其他都会变成别的读音(“嘎、价、价、价、介”变 jia,“轧”变 zha,“噶”变 ge)。读 ka 的汉字有五个,全部经常变成别的读音(“咖、卡”变 qia,“喀、咳、”变 ke,“咯”变 lo)。

应用方法的混乱:

1) 乱写汉字:音译用字,信手乱写,形成一词多音。例如 chocolate 就有“巧克力、巧格力、巧古力、朱古力、朱古律、查古律、查古列、诸古力”等等写法,字形不同,读音也不同。有些翻译机构规定音译汉字的写法,但是混乱并没有多大改变。

2) 方言音译:方言读音的汉字音译,改用普通话读音就变成很不准确。上面谈到的“亚丁”就是一个例子。又如:上海人把 motor 译成“马达”,sofa 译成“沙发”,普通话读音变成 mada、shafa,这已经不合适了。福建人把 Bandung 译成“万隆”,Bombay 译成“孟买”,方言跟原文读音本来是接近的,在普通话读音里 b 变 w,变 m, d 变 l,就变得离奇了。

3) 任意省略:外来词往往音节较多,音译时候任意省略,失去音译作用。例如“华盛顿”简称“华府”,“莎士比亚”简称“莎翁”。此外,音译兼随意译,译音就难准确。例如, San 和 Santa 是可以译得准确的,兼随意译写成“圣”(sheng)和“圣大”(shengda),就不准确了。翻译者往往喜欢选择“好字眼”而不考虑译音的是否准确。

不少外来词的汉字音译已经在混乱中写成习惯,积重难返。

4 汉字注音和直接音译 用拼音字母音译外来词,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根据音译汉字的读音来注音呢?还是根据原文(或者通用的拉丁字母拼写法)直接音译呢?在这两条不同道路中间选择一条,就是音译外来词拼写法的重大抉择。

汉字注音的好处是:适合汉字习惯。缺点是:译音很多不准确,不准确的地方在用字母拼写时候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形成面目全非的情况。

直接音译的好处是:译音比较准确,借此纠正汉字译音的错误,还可以借用国际通用的词形,发挥拉丁字母国际化的优点。缺点是:新拼写法的读音跟汉字将发生一定的差别。

举一个例:“斯大林”这个名字用汉语拼音字母将怎样拼写呢?还是按照音译汉字的注音写成 Sidalin 呢?还是根据原文直接音译写成 Stalin 呢?

从汉语拼音文字的前途着想,从文化发展的长远利益打算,从地名、人名和学术词汇日趋国际共同的方向考虑,我们认为应当选择第二条路:直接音译。

汉字改革倡导人之一钱玄同先生在三十五年前就说过:“除非有痴人会把 Bolshevik 的音译‘布尔什维克’五个字再依国音译为 Buershiweike!”①钱先生所指点的道路就是汉语拼音文字应当走的道路。

二 外来词拼写法的一般原则

1 从一个词看问题 用汉语拼音字母直接音译外来词,在拼写法上有哪些问题呢?让我们用一个词作为例子来观察。

法文 gramme,我们意译为“公分”。拼写时候,如果意译,可以按照“公分”的读音写成 gongfen。如果音译,还有一系列问题要考虑。

Gramme 的汉字音译是“克兰姆”(还有“格兰姆”等写法),简称“克”,有时又用日文音译简称“瓦”。拼写时候是否根据汉字注音写成 kelanmu (简称 ke 或 wa)呢?

如果不然,那么,直接音译还有问题。法文 gramme,末尾元音字母 e 不读音,汉语能这样写么?德文根据法文加以修改,写成 Gramm,去掉了末尾不读音的 e,保留两个 m,汉语能这样写么?英文又去掉一个 m,写成 gram,比较简单,汉语是否可以根据英文拼写呢?原来的法文词,我们根据英文拼写,是否违背“名从主人”的原则呢?

如果根据英文拼写,也不是没有问题。音节用 m 收尾是汉字的普通话读音所没有的,复辅音 gr 更是汉字的普通话读音所没有的,音译外来词能如此拼写么? r 作为声母,方案规定应当读[r](日),但是汉字音译习惯用声母[l](力)的汉字对译,在拼音字母的拼写法里将怎样读音呢?读[r]不合习惯,而且发音也比较困难;读[l]不是又不合方案的规定么?是否可以把

① 钱玄同:《汉字革命》,载《国语月刊》的“汉字改革号”,1923 年出版。

gram 改写为 glam 呢? 不論写成 gram 或者 glam, 复輔音将如何發音呢? 是否可以使复輔音和不合汉语常用音节结构的尾輔音“音节化”, 改写为 gelamu 或者 gulame? 如果这样做, 不是跟“克兰姆”的汉字注音 kelanmu 沒有多大区别了么? 而且, 跟原文詞形相比也变得看不出什么关系了。这跟錢玄同先生所謂“痴人”的办法又有什么不同呢?

Gram 一个詞虽然不能說明音譯外来詞拼写法的一切問題, 但是由此可見問題一斑。

2 基本原則 音譯外来詞拼写法的一系列問題, 可以分成三个步驟来解决。第一个步驟是确定基本原則。基本原則可以提出如下三条:

1) 根据習慣, 划分意譯和音譯。在拼写法上, 意譯根据汉语拼音是沒有問題的, 音譯根据原文“轉写”才是一个新的問題。汉字翻譯原来意譯的, 不論是詞的全部, 一部或者附加部分, 应当遵从習慣, 仍旧意譯, 按照汉字注音拼写, 除非原来缺点很大, 不要輕易改譯。这样, 意譯部分的汉字讀音和字母拼音是一致的。例如“牛津”写作 Niu jin, “冰島”写作 Bingdao。部分意譯和附加意譯也照汉字注音拼写。音譯兼意譯的拼写法可能發生困难, 要个别考虑作为意譯处理还是作为音譯处理。

2) 直接音譯, 不按照汉字注音。汉字音譯的缺点已如上述。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不采取根据汉字注音的办法, 要直接根据原文或其通用的拉丁字母拼写法, 按照轉写規則拼写。例如 Aden, 不根据音譯汉字“亞丁”的讀音写成 Yading, 要根据原文的通用的拉丁字母拼写法写成 Aden; 又如 Bandung 不根据“万隆”写成 Wanlong, 要根据原文写成 Bandung。

直接音譯可以使汉语的外来詞拼写法跟原文或其通用的拉丁字母拼写法一致或者接近, 解决汉字注音跟原文不一致的矛盾。但是又产生直接音譯跟汉字注音之間的矛盾。象上面的例子, 一方面用汉字“亞丁”、“万隆”, 一方面用直接音譯 Aden, Bandung, 这就是解决旧矛盾以后产生的新矛盾。

3) 汉语音素, 容許灵活配合。外来詞經過音譯轉写就成了汉语的詞。既然是汉语的詞, 当然要用汉语普通話的音素构成。所以音譯外来詞全部要用代表普通話音素的汉语拼音字母来拼写, 只有字母“v”是唯一的例外。根据方案規定, 普通話虽然沒有 v 这个輔音, 但是可以用它来拼写外来詞, 例如 volt, vitamin。

但是, 汉语音素的配合, 是否一定要受汉字音节结构的限制呢? 如果要受汉字音节结构的限制, 那么, gram, glam 都不能写, 只能写 gelamu 或者 gulame, 結果跟汉字注音就相去不远了。这个限制应当打破。不打破这个限制, 仍旧会走上錢玄同先生所說的“痴

人”的道路。打破汉字音节结构的限制, 容許汉语灵活配合, 这是音譯外来詞拼写法的重要原則。例如汉字沒有 do, ko, so 等音节, 可是普通話有 d, k, s 等音素, 就可以配合成为 do, ko, so。“多哈”(卡塔尔首府)可以按照通用拉丁字母拼写法写作 Dohar, 不按照汉字音节结构写成 Duohā。Soviet 中的 so, gram 中的 am, 在灵活配合的原則下, 也都成为容許采用的拼写形式。

3 轉写方法: 借形法和借音法 第二个步驟是确定轉写方法。轉写方法可以分为两种方法: 借形法和借音法。所謂“名从主人”可以分为“形从主人”和“音从主人”, 前者就是借形法, 后者就是借音法。

1) 借形法。借形法就是尽可能保持原文或其通用的拉丁字母拼写法的詞形。例如原文中的字母 a 可以有許多种差别的讀音(例如 Webster 詞典列英 a 有 8 种讀音), 我們不問它的讀音差別, 照写一个 a, 如, Ghana(加納)中間的 h 是不發音的, 我們在轉写的时候照样保留这个字母, 写 Ghana, 不改为 Gana。这是借形法。

借形法只在文字符号共同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汉语拼音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 就使借形的可能性扩展到極大的范围。非拉丁字母文字大都有法定或者通用的拉丁字母拼写法。汉语拼音字母不但可以对拉丁字母文字借形, 还可以对其他文字的拉丁字母拼写法借形。国际間的詞汇交流, 詞形重于詞音, 所以借形法是轉写方法的基础。拉丁字母基本上是形和音統一的; 一般地說, 借形同时也就借音。

2) 借音法。拉丁字母在不同文字中間的讀音, 相同的一面, 也有相异的一面。相同的一面是主要的, 相异的一面是次要的。因此借形和借音大都能統一。但是, 每一种文字总有少数几个字母的讀音比较特殊, 这就产生一些形同而音异的紛歧。对于这些讀音上冲突的字母, 根据讀音規定一定的对譯改写法, 这就叫借音法。借音法不是借形法的对立物, 只是借形法的补充。

例如, 在許多文字里 c 在 a 前讀 k, 可是在汉语里 c 的讀音不变, 一既讀 [tsʰ]。Canada(加拿大)如果照原样写, 就会讀成“擦拿大”, 这是不妥的; 根据借音法应当轉写成 Kanada。又如, x 在多数国文字里讀 [ks], 我們讀 [ʃ]。Marx(馬克思)如果照原样写, 就会讀成“馬尔希”, 这也是不妥的; 根据借音法应当轉写成 Marks。C 改 k, x 改 ks, 这都是规律的轉写。需要这样改写的字母是不多的。

4 讀音方法: 汉讀法 第三个步驟是規定讀音方法。轉写方法可以說是“名从主人”的方法, 讀音方法可以說是“主从客便”的方法。如果只有轉写方法而

有讀音方法，外來詞的拼寫法是不完備的。

上面說過，直接音譯必須用代表普通話音素的字母來拼寫。從這個原則可以引伸出另一個原則：音譯外來詞必須用普通話的音素來發音。

轉寫法把來自多種外國文字的外來詞變成漢語詞匯的構成部分。這樣就使人們產生一種顧慮：是否需要懂得那麼許多種外國文字然後能夠讀得出這些外來詞的音呢？懂得那麼許多種外國文字是不可能的。希望全國同胞學習一種外文然後再來閱讀外來詞，也顯然是荒謬的。而且用一種外國話去讀各種語言的外來詞，仍舊不是原文讀音。為了使任何能說漢語的人容易讀出任何外來詞的讀音，就必須規定外來詞的“漢語讀音法”（簡稱“漢讀法”）。

1) 按照漢語拼音方案讀音。這是“漢讀法”的基礎。看見任何字母，如果不是另有補充規定，一律按照方案規定讀音。例如，看見字母 a, u, 不問在原文里讀什麼音，在漢語的外來詞里一律讀如漢語的 a, u。看見 kuba (Cuba 古巴) 就讀 kuba (ㄅㄨㄚˊ)。

用本國的語音和讀法來讀本國文字中間的外來詞，這是國際通例。這在英文可以說是“英讀法”，在法文可以說是“法讀法”。例如 Cuba，英國人讀作 [kʰubə]（近乎“丘伯”），法國人讀作 [kyba]（近乎“居巴”）。法國首都 Paris，法國人讀 [paʁi]，英國人把它讀成 [p'æris]（近乎“佩日思”）；英國首都 London，英國人讀 [landŋ]，法國人把它讀成 [lɔ̃don]（近乎“隆冬”，例如 londonien）或者改說 [lɔ̃:dr]（近乎“隆得兒”）。這就是國際間對外來詞借形改讀的一般情況。借形使大家有共同的或者近似的書寫形式，改讀使讀音適合本民族的字母讀音。改讀以後，同一個詞在各國間發生一定的讀音差別，但是差別是不大的，這跟漢字譯音不準確是兩回事。

2) 外來詞讀音的補充規定。外來詞不能完全按照漢語拼音方案來讀音，還要在方案的基礎上補充一些簡單的讀音規定，使“漢讀法”成為完備的讀音規則。下面是外來詞讀音補充規定的初步擬議：

a) 元音字母全部發音。漢語里的外來詞的元音字母一律發音，原文詞末如果有不發音的元音字母要刪去。例如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 轉寫為 Shake-spear，把詞末不發音的 e 刪去。

b) 輔音字母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不發音。除 zh, ch, sh 以外，表示單輔音的雙字母中的 h 不發音，例如 th, ph, gh, kb, rh 讀如 t, p, g, k, r。（讀 f 的 ph 轉寫為 f。）Ghana (加納) 讀如 gana。其他輔音字母如果不發音，就在字母下面加一橫綫。沒有區別詞形作用的不發音字母可以刪去。

c) 重迭字母讀如單字母。例如 Tallinn (地名) 讀

如 talin。沒有區別詞形作用的重迭字母可以轉寫成單字母。

d) 輔音加輕元音的讀音法。漢語里一般沒有復輔音。復輔音中跟元音結合的輔音，以及在元音后面的輔音（除 -n, -ng, -r, -l），發音時可以附加一個輕元音一道念出。m, f, v 附加 [ʊ]；z, c, s 附加 [ɿ]；j 附加 [ɪ]；b, p, d, t, g, k 附加 [ə]。例如 Stalingrad (斯大林格勒) 可以讀作 s[ɿ]·ta·lin·g[ə]·la·d[ə]；Marks (馬克思) 可以讀作 mar·k[ə]·s[ɿ]。附加元音要讀得很輕。附加輕元音使沒有元音結合的輔音在讀音時候“音節化”，但是書寫形式上不寫出來。

e) 個別字母的讀音規定。e (單元音聲母) 讀 ê。例如 Amerika (阿美利加)，Egipt (埃及) 中的 e 讀 ê。其他如 ei, en, eng 等復韻母讀音照舊。

i 在外來詞中一律讀 [i]，不讀 “ㄣ” ([ɿ][ɿ])。例如 Asia (亞細亞) 中的 i 讀 [i]。

y, w 讀 i, u。例如 Paraguay (巴拉圭) 的最后一个音節讀 -guai。不在音節開頭又不影響詞形的 y, w 轉寫為 i, u。

l 在元音後讀如 -r (ㄌ)。例如 Nepal (尼泊爾) 讀如 nêpar。元音前的 l (聲母) 仍舊讀 l- (ㄌ)。

r 在元音前讀如 l- (ㄌ)。例如 Roma (羅馬) 讀如 loma；Paris (巴黎) 讀如 pali。元音後的 r 仍舊讀 -r (ㄌ)。字母 r 對於詞形有重大關係，r 改寫為 l 是不妥當的。如果把 Paris 改寫成 Bali，就會誤會成印度尼西亞的 Bali (峇厘) 島。如果把 Roma 改寫成 Loma，也會誤會成別的地方（有好多個叫 Loma 的地名）。我們的習慣，外國文字里的 r 一般改讀為 l，例如 Roma 的漢字譯音是“羅馬”，不說“若馬”；要把 r 一律改讀 [ɹ] (ㄹ) 也是不妥當的。兼顧的辦法只有 r 照寫而改讀為 l。

gi, ki, hi 和 zi, ei, si 可以讀如 ji, qi, xi。例如 Egipt 讀為 ê·ji·p[ə]·t[ə]；Pakistan 讀如 pa·qi·s[ɿ]·tan；Asia 讀如 a·xia。zh, ch, sh 可以讀如 j, q, x。例如 Karachi (卡拉奇) 讀如 ka·la·qi。這種所謂“變讀法”在過去各種舊的漢語拼音方案中是有傳統習慣的。

f) 音節分界。音節分界如有可混之處，用隔音符號 ['] 隔開。隔音符號可以只在詞典上寫出，在一般書寫上省略。例如在詞典上寫 stalin'grad 以免誤讀成 staling-rad。

有些外國文字（例如英文）對於外來詞沒有一般通用的讀音規則，只是在詞典里一個一個地規定讀音。這種辦法增加學習的負擔。漢語拼音文字如果規定一

般通用的讀音補充規則，適用於一切音譯外來詞的拼寫法，就可以使學習負擔減輕到最小限度。外來詞的來源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漢讀法”是可以劃一規定的。

“漢讀法”使借形這條道路走得通；沒有“漢讀法”，借形是不可能實現的。借形法和借音法加上“漢讀法”，非漢語的外來詞就變成了真正的漢語的詞。沒有“漢讀法”，外來詞是“洋文”；有了“漢讀法”，他們就變成“漢文”了。

5 基礎詞形的選定 有了基本原則，轉寫方法和讀音方法，就可以開始實際工作了。實際工作是：了解需要輸入的詞的情況，選定基礎詞形，運用轉寫方法，確定拼寫形式。

基礎詞形有幾種可能性：

a) 如果原文是拉丁字母文字，原文可以做基礎詞形。

b) 如果原文不是拉丁字母文字，它的法定的或者通用的拉丁字母拼寫法可以做基礎詞形。

c) 有時原文形式在國際間並不通用，通用的是另一個詞或者另一種拼寫形式，那麼我們就要考慮在原文和國際通用形式中間選擇一個。例如“埃及”自稱 Miṣr，可是國際間的通用名稱是 Egipt（在 26 種文字中間，21 種寫 Egipt 或者近似形式；5 種寫 Miṣr 或者近似的形式；英文寫 Egypt）。① 漢字“埃及”也是根據 Egipt 譯音的。這樣，我們就可以選擇 Egipt 為基礎詞形。（埃及用阿拉伯字母，Miṣr 是通用的拉丁字母拼寫法。）又如，“阿爾巴尼亞”自稱 Shqipri，“匈牙利”自稱 Magyar，我們可以根據原來漢字譯音的國際通用名稱寫成 Albania, Hungari。

d) 有時原文不如另一種文字的轉寫形式適合我們拼寫和讀音，也可以採取後者作為基礎詞形。

雖然我們不以漢字注音作為拼寫的根據，但是在選擇基礎詞形時候應該考慮漢字音譯的習慣。例如“也門”有 Yaman 和 Yemen 等不同寫法，後者跟漢字注音相同，我們就選擇後者；“莫斯科”也可以考慮寫成 Mosko，不一定寫成 Moskva。這樣可以減少字母拼寫法跟漢字讀音之間的矛盾。

基礎詞形有的可以照樣借用，有的需要修改：

1) 少數字母要按照轉寫規則改寫。

2) 外文的形態詞尾要去掉。例如 helium(氦)改寫成 heli(有人主張寫做 hel，不如 heli 好讀)

3) 原文的附加符號可以一律省去。例如 Lomê(多哥的首府)可以省去 ê 上的符號，寫作 Lome(按照漢讀法讀 Lomê)。漢語有區別符號的兩個元音字母 ü 和 ê，需要時候可以用 ü(例如“敘利亞”寫作“Süria”)，但是 ê 上的帽子一般可以省略(例如按照漢讀法，

Amêrika 中的 e 不必戴帽子)。

漢語的聲調符號在音譯外來詞上一律不用。

三 外來詞的分類處理

1 各種文字類型的分別處理 在拼寫法的一般規則的基礎上，各種不同的文字類型要作分別的處理。各種文字的結構制度不同，字母體系不同，跟漢語的歷史關係也不同。每一種文字有它的特殊性，同一類型的各種文字又有共同的一般性。

從外來詞拼寫法的角度來看，外國文字大體上可以分成如下幾種類型：

1) 拉丁字母類型 拉丁字母類型的文字當中，影響比較大的是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由於俄國規定以捷克式拉丁字母為轉寫標準，捷克文就成為轉寫法上的重要文字。從外文拉丁字母到漢語拼音字母的轉寫法研究，應當以這五種文字為主。

每一種文字應當有一個轉寫成漢語拼音字母的專用規則。專用規則裡面，應當規定某一種文字的通用轉寫方法和個別詞的特殊轉寫方法。例如德文 w 轉寫成 v，西班牙文 j 轉寫成 h，這對各該文字來說是通用轉寫方法，雖然對整個拉丁字母類型來說，並不是一般通用的。各種文字都有一些個別詞，需要作特別的寫法規定。例如英文地名 Worcester 的讀音是 wɔːstər(俄文轉寫成 Вустер)，漢語應當如何轉寫，需要特殊規定。

以主要的幾種拉丁字母文字的一般情況為基礎，可以擬訂一個從外文到漢語的“拉丁字母一般轉寫規則”。一般轉寫規則是各個專用規則的共同規範。有了一般轉寫規則，只要稍加修改和補充，就成為某一種拉丁字母文字的專用規則。“拉丁字母一般轉寫規則”事實上對其他類型文字的轉寫規則也同樣發生規範作用。

“拉丁字母一般轉寫規則”的基本內容可以提出以下的擬議：

[外文]	[漢語]	[外文]	[漢語]
a	a	h	h(漢字母中不發音)
b	b	i	i(一律讀 i)
c	$\begin{cases} c \\ s \\ k \end{cases}$	j	$\begin{cases} j \\ y \end{cases}$
d	d	k	k
e	e(單韻母讀 ê)	l	l(元音前讀 l- 元音後讀 -r)
f	f	m	m
g	g	n	n

① 參看《拼音月刊》第 3 期。

o—o	ng—ng
p—p	zh—zh (可以讀 j)
q—k	ch—ch (可以讀 q)
r—r (元音前讀 l-) (元音后讀 -r)	sh—sh (可以讀 x)
s—s	gi—gi (可以讀 ji)
t—t	ki—ki (可以讀 qi)
u—u	hi—hi (可以讀 xi)
v—v	zi—zi (讀 zii 或 ji)
w— $\begin{bmatrix} w \\ v \end{bmatrix}$	ci—ci (讀 cii 或 qi)
x—ks	si—si (讀 sii 或 xi)
y— $\begin{bmatrix} y \\ i \end{bmatrix}$	ph— $\begin{bmatrix} f \\ ph \end{bmatrix}$ (讀 p)
z—z	

q—ch	ю— $\begin{bmatrix} iu \\ yu \end{bmatrix}$
ш—sh	я— $\begin{bmatrix} ia \\ ya \end{bmatrix}$
щ—shch(sh)	и—i ²
ь—省略	б—'
	а—e

(* 俄文跟乌克兰文,白俄罗斯文比较,往往 ш 跟 и(i) 对应,例如 тшш 跟 тшш。)

3) 其他字母类型 其他字母类型主要有:希腊文字,希伯来文字,各种阿拉伯字母文字,印度系统各种字母文字等。

希腊文字是许多科学名词的构词基础,因此希腊字母的转写法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希伯来字母转写法对宗教书籍是必要的。阿拉伯字母转写法是横跨西亚和北非的所谓阿拉伯世界文化的钥匙。印度系统各种字母文字包括印度和锡兰各种文字,缅甸文,暹罗文,等等,其中印地文最为重要。有些文字的元音表示法不完备,有些文字由于历史演变在拼法和读音上有显著的差别,这使转写发生一定的困难。

在各种文字的专用转写规则尚待研究的时候,可以暂用各该文字的通用拉丁文字母拼写法作为转写为汉语拼音字母的依据。当然,这样“间接转写”是不很准确的。

4) 传统的汉字类型,日本文,朝鲜文,越南文 日本文,朝鲜文,越南文,从历史传统来看,跟中文同属于汉字类型。他们过去长期采用汉字作为文字,今天多数地名、人名、学术用语和一般用语仍旧是以汉字汉义汉音(历史上的汉音)为构词材料并且按照汉语构词法造成的。虽然日本有假名字母,朝鲜已经改用谚文字母,越南已经改用拉丁字母,可是词汇中汉字汉义汉音的影响并未改变。这一历史所造成的事实要求我们在翻译时候作特殊考虑。

过去习惯,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相互之间采用汉字词形的“借形法”,在读音上各自按照本民族的读音加以调整。例如“体操”,这是一个按照日本语法构成的词,日本读音是 taiso; 我们用“借形法”把它原样借来,没有按照我们的语法改写为“操体”,但是按照“汉读法”改读 tieao。过去汉字类型各种文字相互输入外来词的处理方法大致如此。

从日本、朝鲜、越南借入的外来词,如果是由汉字汉义汉音构成的,可以有两种拼写方法。一种是根据汉语普通话读音拼写。例如“日本”(日语拼写法是 Nihon, Nippon) 写成 Riben; “朝鲜”(Chosen) 写成 Chaoxian; “越南”(Viet-Nam) 写成 Yuenan。另一种是根据原文的拉丁字母拼写法转写。例如“东京”(Tokyo) 写成 Tokio, “平壤”(Phyongyang)

2) 斯拉夫字母类型 在斯拉夫字母文字中间,俄文是代表性的文字。通过俄文转写法,可以解决苏联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字的转写法。稍加补充,又可以解决保加利亚文字的转写法。至于南斯拉夫文字,由于同时有拉丁字母式,可以从拉丁字母式转写。斯拉夫字母和拉丁字母同出于一源,所以转写方便,可以保持词形上的对应关系。

为了使俄文跟拉丁字母文字的转写能有统一的标准,苏联科学院在 1939 年提出以捷克文拉丁字母为标准的“俄捷转写规则”(俄字母的捷克式拉丁字母转写规则)。例如一个俄文字母 ш 过去可以转写成 sch, ch, sh, sz, se 等形式,现在统一转写成捷克字母 š。苏联跟欧洲国家共同组织“国际标准化协会”,努力于转写法的标准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各国在学术用语上接受苏联的规定,例如英国语言学书刊采用“俄捷转写规则”,虽然在一般用语上沿用英国皇家科学院的转写规则(只差几个字母)。从俄文到汉语的转写规则,也应当以“俄捷转写规则”为基础。

俄汉转写规则的基本内容可以提出如下的初步拟议:

[俄文]	[汉语]	[俄文]	[汉语]
а—а		а—l	
б—b		м—m	
в—v		н—n	
г—g		о—o	
д—d		п—p	
е— $\begin{bmatrix} e \text{ (辅音后)} \\ ye \text{ (音节开头)} \end{bmatrix}$		р—r	
ё— $\begin{bmatrix} io \\ yo \end{bmatrix}$		с—s	
ж—rh		т—t	
з—z		у—u	
и—i		ф—f	
й—i (yü 写 i)		х—h	
к—k		ц—c	

写成 Phiongyang,“河内”(Ha-Noi)写成 Ha-Noi。国名大致可以采取前一种办法,其他地名可以采取后一种办法。不是汉字构成的词,当然以原音为转写根据。

汉字汉义构成的外来词在日本、朝鲜、越南的读音(汉音),本来是汉语读音的转变,这跟汉字的方言读音多少有些相似。用汉字注音方法来拼写这些外来词,可以使我们从汉字读音听懂词义。非汉字类型的外来词就不是这样。例如:Costa Rica 这个国名,原义是“富庶的海岸”。① 我们不可能从翻译的词形和读音来了解它的意义。如果按照“哥斯达·黎加”汉字注音写成 Gesida Lijia,不能使我们从汉字读音听懂词义,这种汉字注音只是错误的转写而已,应当按照转写规则写成 Kosta Rika。

2 各种词汇类别的分别处理 音译外来词拼写法可以说有三种“尺度”:原文化,国际化和汉字化(汉字注音)。不同的词汇类别可以考虑“尺度”的伸缩。

从时代来看,外来词可以分为古代外来词和近代外来词。大体上可以把近百年来的称为近代外来词,百年以上的称为古代外来词。古代外来词,除去少数例外,可以一概按照汉字注音来拼写,不重新直接音译。例如“菩萨”(Bodhisattva)就写 pusa,“刹那”(kshana)就写 chana 或者 shana(“刹”读 cha,又读 sha,后者跟原音较近)。

近代音译外来词可以归纳为三大类:1)地名、人名;2)学术词汇;3)一般词汇。大致说来,地名、人名要求原文化,学术词汇要求国际化,一般词汇不妨汉字化。

1) 地名、人名 地名、人名要求比较严格的“名从主人”。但是地名,特别是大地名,不能只考虑“原文化”,还要考虑“国际化”。人名还有个别性。个人或者家族标记有时以一个不发音的字母或者特别的拼法来区别。例如 Johnson 和 Jonson。人名最好“原文化”和“原名化”(保存原名词形)。如果把音译的地名、人名都“汉字化”,按照汉字注音拼写,无异给全世界的地名、人名一概重新起一个名字,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学习世界地理和历史将增加无意义的重担,了解国际时事将多一重不必要的障碍。

地名结构包含通名和专名,有的还有形容词。通名以意译为原则,音译为例外。例如“伏尔加河”的“河”是意译通名,“斯大林格勒”的“格勒”(原文“城”)是音译通名。专名以音译为原则,意译为例外。有明显的表示意义作用的专名大都是意译的。例如“好望角”,“共青团”。形容词有两种。一种形容词是专名的构成部分,是不可分离的;这种形容词宜于音译。例如“纽约”的“纽”(原义“新”),“新西兰”的“新”(最好改为音译)。另

一种形容词是必要时候随时加上的,是可以分离的;这种形容词应当意译。例如“北阿美利加”的“北”,“东亚细亚”的“东南”。按照拼写法的基本原则,我们要分清习惯上意译和音译的界线;除非有改译的必要,意的根据汉字注音,音译的根据基础词形转写。

人名应当音译,不应当意译(除非绰号)。

翻译者往往把外国人姓名译成汉人姓名形式,如“高尔基”、“罗斯福”。这种“汉化”姓名往往只包“姓”而不包括“名”。如果把这样的汉字音译按照汉字注音拼写成 Gao Erji(高尔基)、Luo Sifu(罗斯福)就跟原名 Горький(Gorki), Roosevelt 相去太远。为了不使姓名失去个人标记的作用,应当按照原名转写。

汉字类型文字的姓名比较特殊。例如“胡志明”“金日成”,这些“汉式”(不是“汉化”)姓名将怎样拼写呢?根据“名从主人”,应当写 Ho Chi-Minh, Kim Il-sung;根据我们的读音又可以写 Hu Zhiming, Jin R. cheng。折中办法是,少数周知的姓名照我们的读音拼写,附注原文的拉丁字母拼写法;其他根据原音拼写。日本姓名很少“汉式”,虽然用汉字书写,而是日语音构,应当根据原音转写。例如“田中”写 Tanaka,附注汉字。

比较完备的外文词典有附载的“地名录”和“人名录”,上面写明世界地名和人名在本国文字中的拼写和读音法。我们的汉语拼音词典也应当这样做。

2) 学术词汇 学术词汇趋向国际化,这是大家知道的事情。

学术词汇可以简单地分为社会科学词汇和自然科学词汇。我们的习惯,前者一般用意译(包括从日文来的意译),很少音译,后者有意译、有音译。“五·四”时代曾经一度流行的“德先生”(德模克拉西)和“赛先生”(赛因斯),终于让位于意译的“民主”和“科学”。用频繁的社会科学术语,其中主要的是政治经济术语在汉语拼音文字中间也将仍旧以意译为主。

自然科学术语,音译和意译并用,而音译多于意译。不同的自然科学部门各自有处理术语的规定,这里不能一一讨论。我们只拿一张“化学元素表”②作例子来谈谈。

从汉字改革、汉语规范化和汉语拼音文字正字法的角度来看这张“化学元素表”,可以提出如下几项意见:

a) 汉字改革,要求简化汉字笔画,停止生造新字,限制和逐步减少现代汉语通用汉字数目。化学

① 西班牙语 costa 海岸, rica 富庶,请比较英语 coast 和 rich。

② 参看《新华字典》或其他书籍附载的“化学元素表”。

生造許多新漢字，難認、難念、難寫、更難聽懂，這跟文字改革是背道而馳的。多一個名詞就造一個漢字的時代早已過去了。希望化學家不要再走這條道路。

b) 漢語詞匯由古代以單音節詞為主發展為現代以多音節為主，這是漢語演進的重要規律。社會科學術語大都是意譯或音譯的多音節詞，這種造詞方法符合漢語演進規律，所以在應用上取得顯著的成功。“化學元素表”卻把多音節的國際通用名稱一概簡縮為單音節，使化學家在講壇上難於用漢語說清元素名稱（例如鉍、鎰、鉈），這是違反漢語演進規律的。希望化學家學習社會科學的造詞方法，儘可能改單音節詞為多音節詞。

c) “化學元素表”的一百多個“中文名稱”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意譯名稱（例如1. 氫，6. 碳，7. 氮，8. 氧，15. 磷，16. 硫，26. 鐵，29. 銅，35. 溴，47. 銀，50. 錫，78. 鉑，79. 金，80. 汞，82. 鉛等），這些名稱多數是漢語中固有的，如果沒有改譯的必要，可以按照漢字讀音拼寫。不必勉強把意譯改為音譯。

另一類是音譯名稱（大多數），應當根據音譯外來詞拼寫法用漢語拼音字母拼寫，以拉丁文名稱為基礎詞形，去除詞尾 -um，按照轉寫規則更改個別字母（如詞尾為 -ium，保留 -i，讀音方便，也接近俄文，例如 helium 轉寫為 heli，zincum 轉寫為 zink），並按照“漢讀法”讀音。這些用字母拼寫的名詞應當是我們的正規科學名詞。如果必要，可以保留那些“化學字”作為一種符號，不作正式文字。

3) 一般詞匯 所謂一般詞匯，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範圍。這裡主要是指地名、人名和學術用語以外的日常用語。

一般詞匯當中也包括一部分在拼寫法上要求原文文化和國際化的外來詞，不能簡單地一概照漢字注音來拼寫。可是有些在口頭上按照漢字讀音說慣了的詞，如果跟原文的不一致並不引起問題，而不按照漢字注音反而可能發生困難，這就不妨“漢字化”。

例如，humour 音譯“幽默”，modern 音譯“摩登”，不妨按照漢字注音寫成 youmo，modeng；如果根據原文轉寫，可能發生困難。

又如，lemon 音譯“檸檬”（ningmeng），sofa 音譯“沙發”（shafa），原來方音是接近原文的，普通話的漢字讀音跟原文有距離。這些詞借用原文詞形不生困難，採用漢字注音也不會引起問題，可以任采一種“尺度”。這些詞跟國際學術交流沒有多大關係。

每一個音譯外來詞拼寫法的寫定，就是一次國際化或者原文化跟漢字化的矛盾的解決。絕對國際化者主張把“共和國”寫成 republik，因為這個名詞在漢字類型文字以外的各種文字中間都是音譯的。^① 絕對漢

字化者認為 tractor 音譯兼意譯寫成 tuolaji（拖拉機）還不理想，最好把它改名“鉄牛”。兩個極端都是不合适的，只有分別情況斟酌尺度，名從主人而又主聽客便，才是漢語拼音文字中音譯外來詞拼寫法的正確道路。

參考資料

(A) 關於地名、人名的拼寫法及其他：

1) 地名拼寫法樣品：a) 全世界國家名稱拼寫法初稿（文字改革，1958，9，15）；b) 各國首都名稱拼寫法初稿（11，15）；c) 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及其首都名稱拼寫法初稿（12，30）。文改會第一研究室編。

2) 曾世英：統一外國地名翻譯的商榷（地理學報，22卷4期）；從整理外國地名譯名的角度上來談談漢語拼音文字（拼音，5期）。

3) 勞寧：外國人名、地名的轉寫原則問題（拼音，5期）。

4) 林祝啟：拼音文字與國際化（拼音，6期）；擁護全世界國家名稱拼寫法初稿（文字改革，1959，1，15）。

5) 葛綏成：也談拼音文字處理地名的問題（拼音，9期）。

6) 埃及為什麼寫成 Egipt？（拼音，3期）

7) 關於拼音文字中外來語的寫法問題（“來稿摘登”四篇，拼音，3期）。

8) 持平：漢語中的外來語（拼音，9期）。

9) 高崇：漢語拼音文字怎樣處理日本譯名（拼音，9期）。

10) Li Balin：名從主人和形聲兼顧（拼音，9期）；外來語的譯寫問題（讀者來信，拼音，7期）。

11) 魯詹：外來語的處理問題（拼音，6期）。

12) 胡双宝：對如何吸收外來語詞的意見（文字改革，1958，7，15）。

(B) 關於科學名詞的拼寫法及其他：

1) 劉澤先：科學名詞和文字改革（論文集，其中主要論文是“關於化學名詞的整理和改革的意見”，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科學名詞外來語拼寫討論（文字改革，1958年7月及9月15日）。

2) 惲子強：談談化學名詞的整理和改革（光明日報，1956，10，8）。

3) 黃鳴龍，吳國沛：希望早日實現化學名詞拼音化（同，10，9）。

4) 嵇汝運：關於化學名詞的一些意見（同，10，9）。

5) 沈家祥：化學名詞要趕快拉丁化（同，10，14）。

6) 周孟立：談化學名詞的改革和科學名詞的國際化（同，10，21）。

7) 馬太和：化學名詞應該怎樣改造（同，10，31）。

8) 陶坤：從現行化學物質的命名方法說起（同，11，20）；化學物質的中文命名問題（科學通報，8卷6期）；詞匯的發展與學術名詞的制訂問題（光明日報，1952，12，26）。

（下轉139頁）

① 參看 Linlon 給《拼音月刊》的信，該刊1956年10月号“來稿摘登”之二。

談談高名凱先生的治學態度

王福祥 趙云中 胡孟浩 呂國軍

《中國語文》從去年9月號開始連續刊載文章，揭露和批判了高名凱先生在《普通語言學》一書中所表現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但是，我們覺得揭露的事實還不夠。最近我們重讀了高先生的一些著作和譯作以後，更覺得高先生雖然在他的著作中也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以及許多蘇聯語言學家的話，但是高先生並沒有完全擺脫資產階級的學術觀點和作風。由於高先生的寫作態度不夠嚴肅，因而在引用俄語材料或翻譯俄語資料時就免不了出錯誤。高先生雖然在《中國語文》（1958年10月號）上也發表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檢查出他自己的治學方法和態度所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形而上學的方法論，理論脫離實際，為學術而學術的思想。在這三方面“流露”了他的“許多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味道”；但是，在那篇文章里，高先生把抄襲別人加以改頭換面的東西美其名曰“受……語言學的影響”，並沒有認真地檢查一下自己的治學態度。我們這篇文章只就高先生在引用和翻譯俄語材料上的一些事實來加以揭露和批判。

關於俄語材料的引用

（一）現代俄語部分

高先生著作中在說明“性”這個語法範疇時曾引俄語為例。他寫道：

有的語言，除了陰、陽、中之外，還分別有生性與無生性（例如俄語），有的語言就沒有這種區別。①

……俄語有“陰、陽、中、有生、無生”等性的區別，……

俄語的名詞都有“性”的區別，陰、陽、中、有生和無生各性之中的一種性是俄語名詞所必具的一種語法範疇，但在反映客觀事物的邏輯範疇中，俄羅斯人民顯然沒有把一切事物都歸為陰、陽、中、有生、無生等性。②

高先生這兒所說的“有生性”、“無生性”可能是指俄語中的所謂“одушевленность”，“неодушевленность”。是的，俄語名詞中確實有動物名詞和非動物名詞之分。但這怎能和“性”相提並論呢？所謂“性”，即俄語中的 род，確是俄語中的語法範疇之一，但它是從根本上區別於所謂“有生性”和“無生性”的。俄語名詞中除極少數的所謂“共性名詞”（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ое общего рода）之外，有三種“性”的區別：陽性（мужской род），陰性（женский род）和中性（средний

род）。任何一個俄語名詞都屬於其中之一。名詞的區別是用不同的詞尾形態表示的。而動物名詞與非動物名詞則僅僅由第四格單數、複數的詞尾之不同而定（陰性及中性名詞單數除外）：即動物名詞的第四格詞尾與第二格詞尾相同，非動物名詞的第四格與第一格詞尾相同。

其次，“性的範疇”（категория рода）與“動物和非動物範疇”（категория одушевленности и неодушевленности）在歷史形成上也是不同的。“性的範疇”是俄語自古就有的，而“動物名詞與非動物名詞範疇”則是在後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

再次，“性的範疇”與“動物名詞與非動物名詞範疇”的關係是錯綜的。陽性名詞、陰性名詞和中性名詞中都有動物名詞和非動物名詞，換句話說，動物名詞與非動物名詞都可以有陽、陰、中性的區別。

由此可見，高先生所說的“無生性”、“有生性”是與“性”（род）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所以把兩者混為一談是錯誤的。

這樣錯誤的說法被高先生重複了三次，但高先生並沒有舉出一個具體例子來證明自己的說法。

高先生在《語言與思維》一書中（25頁）寫道：

例如，同是中性名詞的單數主格，俄語卻可以拿 -o, -e, -ë 等詞尾來表達它（село, поле, ружьё）。以語法理論，-o, -e, -ë 等都是詞尾，但卻是這一語法方式內以不同音位來担負的不同語法形式。

高先生在這裡犯了兩個錯誤：首先，俄語中根本沒有 -ë 這個詞尾。屬於中性名詞的有：1）以 -o, -e 結尾的詞（如 окно, поле）；2）以 -мя 結尾的詞（如 имя）；3）дنيا；4）一部分不變格的名詞（非動物名詞）：депо, рагу, такси 等。③

ружьё 的詞尾不是 -ë，而是 j 後帶重音的 o，因而是屬於以 -o 結尾的同一類。

其次，從上面高先生的幾句話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印象，似乎高先生把字母 -ë 也看成了音位（фонема）。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高先生就犯了一個原則

① 《語言與思維》，1953年，74頁。

② 《語法範疇》，見《語法論集》第二集，中華書局，1957，32頁。

③ 參看《俄語語法》，蘇聯科學院，中譯本，91頁。

性的錯誤。其實 ё 僅僅是個字母而已，它不是一個音 (звук)，也更談不上什麼音位了。ё 代表兩個音：jé，字母和音 (何況又和音位) 是混淆不得的。

在高先生的《普通語言學》(修訂本) 里也有類似的錯誤，比如，第四章談地方方言時說：“俄語管德國人叫做 немецкий，意即‘啞吧’。(49 頁)。

其實，俄語中的“德國人”一詞是 немец (由 нем 加 ец 構成的)，不是 немецкий。後者只是由 немец 派生出來的形容詞。在現代俄語中它已同“啞吧”(немой) 沒有任何直接的聯系了。

再如，高先生把 маяк (燈塔)、почта (郵局) 誤認為是單音綴的詞(429 頁)，其實，兩個都是雙音綴的詞(маяк [ма-ják] 與 почта [пóч-та]——書中誤印為 полта)。

又如，高先生在同書中(431 頁)寫道：

一般的說，附加成分的作用在於構詞，但是附加成分也有表示同一個詞的語法變化的。俄語的 идти (走) 和 пойти (應為 пойти——筆者) 比，後一個詞的前加成分 по- 除了詞彙意義略有不同之外，又表示語法作用的變化，идти 是未完成體，пойти (應為 пойти——筆者) 是完成體。

從這段話中不难看出，高先生是用 идти 和 пойти 間的關係來證明附加成分 (在這裡即是 по-) 是可以表示“同一個詞的語法變化的”。恰好和高先生的打算相反，идти 和 пойти 雖然一個是未完成體動詞，一個是完成體動詞，但這卻不是同一個動詞的不同體的形式，而是兩個獨立的單詞，因為 по- 不僅改變了 идти 的體的語法意義，而且引起了詞義上的變化 (пойти 表示動作的開始)。

上面我們所舉的幾個例子無疑的可以證明高先生在自己還沒有弄懂俄語現象之前，就忙著引用俄語例子，結果不但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反而降低了其論述的準確性。

在《語法範疇》一文中，高先生也有同上面一樣的錯誤。比如在 26 頁上說：

同樣的語法形式卻可以表達不同的語法意義。這情形並且是多方面的。例如，同樣的語法方式 (詞尾) 既可以表示“格”，又可以表示“數”，甚至於表示“身”，表示構詞上的變化 (俄語的 книгу, говорит, народность)。

這裡說得十分模糊。給人造成一種印象：似乎所舉的例子中每個俄語詞的詞尾起碼可以表示“格”、“數”兩者，多則可以表示“格”、“數”、“身”。高先生並沒有具體指明每個詞的語法意義。這三個詞中沒有一個詞是可以兼有“格”、“數”、“身”的：книгу——第四格，單數；говорит——第三人稱 (即第三身)，單數；народность——第一或第四格，單數。

在 46 頁上說：

“完成體”指明動作或過程已經完成了，如俄語的 я прочитаю (我讀完了)。“未完成體”指明動作或過程並沒完成，如俄語的 я читаю (我讀——即：我還在讀)。

首先，我們認為把完成體和未完成體簡單地理解成表示動作 (действие) 完成了或未完成是不科學的，也是錯誤的。

其次，я прочитаю 是完成體將來時形式，如何能理解成“我讀過了”？這也恐怕是印刷上的錯誤。

另外，在 49 頁上說：“……俄語的動詞在‘過去時’里就有陰陽性的區別。”這裡漏掉了中性，比方，скрылось, настало 等。

(二) 俄語歷史及與此有關方面的材料

高先生在這方面也有不妥當的地方，在上舉三種著作中也都各有所見。比如，高先生在《普通語言學》(126 頁) 里說：

希臘字母之傳入俄羅斯有個特殊的歷史。第九世紀的時候，一個名叫息立爾 (俄語為 Кирилл——筆者) ① 的哲學家依據希臘字母的式樣給斯拉夫人創造了一套包括三十八個字的字母，其中一部分是依據斯拉夫語言的特點而後加上去的。後來的俄文雖然減少了一些字母，但是仍然沒有脫離息立爾字母的範圍。

一些蘇聯學者認為：斯拉夫字母表 (俄語字母表在內) 的產生是由於當時階級社會的出現，生產力的提高，私有制的產生，手工業和交易的發展，國家的形成，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們對文字的需要的結果。②

遠在息立爾字母表產生之前，俄羅斯及斯拉夫其它部落就有他們自己的文字形式。當然，這種文字形式比起息立爾的字母表來是十分原始，十分簡單的，但並不能因此就否定它們的存在。而某些資產階級學者沒有看到當時社會內部發展的需要，只是悶在息立爾給斯拉夫人創造了一套字母表一說的圈子里，把斯拉夫字母表的產生看成是某個人的“創造”，從而否定了斯拉夫各部落的原始文字形式的存在。根據歷史文獻上的記載，我們不能完全否認息立爾創造了字母表的說法，但是，不能因此就把斯拉夫字母表的產生看成是他個人的功績，正象我們不能把漢字看成是倉頡創造的一樣。因為，要使斯拉夫人的語言適應於轉達希臘宗教文獻，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作相當長時間的准备工作。這件工作因莫拉維亞宣敎使團的產生而由

① 關於俄羅斯文字史，或更具體一些，關於俄語字母表的來源問題，國內外學者的說法很不統一，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假設。這裡只把我們認為比較可靠的意見，簡單地整理一下，供高先生及讀者們參考。

② 請參閱 А. В. Черепнин «Русская палеография», Москва, 1956, глава I,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славян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息立尔結束了。至于这套字母的素材問題，也并不象某些学者所說的那样，好象是从希腊字母中借用来，只做了些改头换面的工作。我們觉得认为斯拉夫字母表的产生与息立尔和梅佛基（俄語为 Мефодий）的活动有关系，是斯拉夫人依据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利用和参考希腊字母創造出来的說法是比較正确的。^①

其次，在高先生看来，息立尔“創造了一套包括三十八个字的字母”。在这句話中高先生犯了两个錯誤：第一，据我們所知，当时用作翻譯宗教文献的字母有两套，一套是俄語叫做 кириллица 的，另一套叫做 глаголица，至于其中的哪一套字母和息立尔發生关系，国外学者还在爭論。不过問題不在于此，而在于无论是 кириллица 还是 глаголица 都不是由三十八个字母組成的。前一套應該有四十三个字母，^② 而 глаголица 这一套則有四十个字母。^③ 捷克学者 Čestmír Loukotka 教授在其所著《文字的發展》（俄譯本《Развитие письма》，Москва，1950）一書160頁写作三十八个，但在他所用的字母表中（見156頁）却是三十九个，沒有 ѡ 这个字母。在一些記述息立尔和梅佛基活动的作品中，有人也認為息立尔在去莫拉維亞之前曾“制做”了一套包括三十八个字母的字母表，因沒有实际字母材料，无法断定其正确性。第二，高先生說是“包括三十八个字的字母”。我們認為應該写做“包括…字母的字母表”。字和字母完全是两回事，这种錯誤，可能是高先生的疏忽。

高先生說：“古斯拉夫語被俄語、捷克語、波兰語、烏克蘭語等所代替，这是新的語言的产生”（48頁），又說：例如，古斯拉夫語是俄罗斯語言、烏克蘭語言、白俄罗斯語言等的基础語言”（103頁）。

高先生这里所說的“古斯拉夫語”如果是指俄語 старославянский язык 講的話，那么，这两句話說得都有毛病。根据这两句話，讀者不难看出高先生是想說現代斯拉夫諸語言是由斯拉夫这个“基础語言”产生出来的“新語言”。这是不正确的。

現代各斯拉夫語的基础語言（俄語为 язык-основа）不是古斯拉夫語，而是根据历史比較法构拟起来的共同斯拉夫語（общеславянский язык）。不可否認，古斯拉夫語在各斯拉夫民族的标准語形成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絕不等于古斯拉夫語就是現代斯拉夫語的基础語言。每个現代斯拉夫語，无论是俄語、烏克蘭語、白俄罗斯語、波兰語、捷克語、斯洛伐克語、保加利亞語或塞爾維亞語，都有其独特的历史發展过程。远在古代斯拉夫語产生之前，这些語言就以共同斯拉夫語的方言形式存在了。因此，也不能說“古斯拉夫語”被現代各斯拉夫語所“代替”。

在《語言与思維》一書中，高先生說：

古代印欧諸語言的動詞有許多“體”的形态变化，梵語和希臘語的動詞所分別的多半是“體”，而不是“時”。斯拉夫諸語言的動詞還把這些“體”保留到相当的时期，現在也還保留其一部分，例如，俄語的動詞就有“完成體”和“未完成體”的分別。（76頁）

高先生的意思是想說：俄語動詞中的完成體與未完成體是被保留下來的古代印欧語中的“體”。然而事實并不如此。据我們所知，現代俄語中的“體”的范疇（категория вида）并不是保留了古俄語或更早的“共同斯拉夫語”中的體的一部分，并不是古代語言中體機械的延續。現代俄語中的體是晚期形成的，具有新質和新的表現形式的范疇。^④

高先生說“梵語和希臘語的動詞所分別的多半是‘體’，而不是‘時’”。这里所謂“多半”是多少，我們固不得而知。可是我們可以在 Кузнецов 那里找到完全相反的說法：

在希臘語與梵語中我們就可以看到清楚表示出“時”，在拉丁語中在沒有體的范疇的情況下，“時”的體就更加明顯了。^⑤

這一點究竟是誰對誰錯，我們還不能確定，提出來供參考。

关于俄語材料的翻譯

高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總愛引証一些外国的材料和觀點。有的材料是高先生從別人的譯文中摘引下來的，有的則是高先生自己譯的。我們想再就這方面給高先生提些意見，供高先生和其他同志參考。

高名凱和劉正堃在《庫茲涅措夫對漢語詞類問題

① 見 Д. С. Лихаче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36頁; Е. Э. Гранстрем «О связи кирилловского устава с византийским унциалом» «Византийский временник», т. III, 218—229)。

② 參見 А. Лескин «Грамматика древнеболгарского (древнецерковнославянского) языка», 俄譯本, Казань, 1915, 20—21頁; С. М. Кульбакин, «Древне-церковнославянский язык», 200 издание, Харьков, 1913, 16頁; А. Байан,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о старославянскому языку», 俄譯本, Москва, 1952, 29頁; А. В. Черепнин, «Русская палеография», 98—100頁)。

③ 引處見上, 又 Шницер Я. Б. «Всеобщая история письмен» С-Петербург, 1903, 200頁。

④ 參見 П. С. Кузнец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 яз. Морфология», 動詞一章, 1953。

⑤ П. С. Кузнец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 яз. Морфология», 俄文版, 221頁。

的看法》一文①中摘譯庫茲涅錯夫的《俄語历史語法》中的一段話。譯文是：

詞類是詞的語法分類，由於語義，句法和形態的標志而彼此有所分別。語義和句法雖然也是劃分詞類所需要的，但總是不夠的，如果沒有讓我們能夠劃分不同詞類的形態標志的話。而鑒定不同詞類的形態標志，却是每一個被劃分的特殊詞類自己身上所具備的，它們是特殊詞類的語法範疇所固有的，這些語法範疇不但是由屬於相應詞類的詞的結構，同時，在許多情況之下，也是由那種在句子里依照它們為轉移的詞的結構來表現的。（100頁）

毫無疑問，這段話表明了庫茲涅錯夫劃分詞類的基本觀點，正因為這樣，譯者應當精確地翻譯出來。可是當我們同原文對照以後，發現這段話譯得並不確切。②

只要細心一點，就不難發現原文里形動詞 различающихся 是與 слов 有語法上的一致關係的，而譯文卻說成“詞類是具有不同的詞義、句法和形態特征的詞的語法分類”。

使人不明白的是：什麼叫“特殊詞類”（是不是俄語中還有非特殊詞類），怎樣來理解“鑒定不同詞類的形態標志”是“特殊詞類的語法範疇所固有的”？換句話說，這就成了“特殊詞類的語法範疇”有“鑒定不同詞類的形態標準”。按照原文，這句話的意思應該是：

而鑒別不同詞類的形態特征在於每個被劃分出來的詞類，都有其自身所固有的語法範疇，這些語法範疇不僅表現在屬於一定詞類的詞的結構中；在許多情況下，也表現在句子里從屬於這些詞的其他詞的結構中。

高先生在《普通語言學》（增訂本）133頁譯引契科巴瓦教授的一段話也使人費解。

按照契科巴瓦教授所說，大意是這樣的：

根據語音學原則，應該把 вода 寫為“вадà”，把 моря 寫為“маря”，把 трубка 寫為“трупка”。然而在俄語中這些詞卻沒有這種寫法。可有些詞還是按照發音來寫的，如：беспокойный，беспечный，бестолковый（而不是寫成“безпокойный”，“безпечный”，“безтолковый”）。

可是高先生的譯文根本沒有表達出這種意思。

另外，有些譯文的意思非常含混，甚至根本是譯錯的。當然，高名凱、劉正琰兩位先生要想把蘇聯象庫茲涅錯夫這樣的學者的觀點介紹給讀者，這是值得歡迎的好事，同時這也是一件極應嚴肅對待的事情。但是，在上面提到的高、劉合寫的《庫茲涅錯夫對漢語詞類問題的看法》一文中，就有好几處譯文是錯誤的。

例如把“в применении к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ому типу языка”譯成“考察語言類型”，把“вообще нет”譯成“一般的情形沒有”，顯然是大錯而特錯。原文這裡何曾說過要拿“無形態語”這個術語去用到

“考察語言類型”呢？其實，原文是說：有些語言學家認為既然根本沒有無形式的語言，那麼，把“無形態語”這一術語用到我們所探討的這一語言類型上就不恰當了。而譯文卻說成：“某些語言學家認為一般的情形既沒有沒有形式的語言，那麼拿‘無形態語’這個術語應用在考察語言類型的問題上，就是不適當的”（98—99頁）。

再如譯文說：“在這種情形之下，問題不在於缺乏一般的形式（因為可能在構詞法和句子方面有形式的存在）而在於缺乏個別詞的形式”（99頁）。

這裡有兩個錯譯：一個是把 отсутствие（沒有，不存在）譯成了“缺乏”，另一個就是把 формы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譯成了“構詞法和句子方面有形式”，這樣，譯文就把原文的意思完全給模糊了。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е 是“詞組”的意思，怎麼變成“構詞法”了呢？我們覺得，庫茲涅錯夫教授的原意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講的不是根本沒有形式（因為可能就有詞組和句子的形式），而是講沒有單個詞的形式。”

至於象“這些語言學家認為詞的形式外表上可能什麼也沒有表達出來，不待說，這是不能同意的”（99頁）這樣的譯文，同原文意思相差更遠。原文是說：“這些語言學家認為外表上沒有任何表現的詞的形式可能存在，當然，這種看法是不能令人同意的。”

還有這樣的錯誤譯文：

事實上，我們卻的確看到許多語言，在這些語言里，詞並沒有任何形式（外面的）上的變化，詞沒有語法的形式，因此，無形態語這個術語是完全合理的。

不難看出，譯者是根本沒有搞清原文的語法關係。俄語原文的句子結構並不複雜，只要簡化一下，把句中次要的成分去掉，我們就會看到下面這樣一個架子：Мы вправе считать языки... не имеющими...，我們參照譯文，這句話可以重譯為：“我們完全有理由把詞沒有任何形式上的（外面的）變化的語言稱做詞沒有語法形式的語言，因此，無形態語言這個術語完全是合理的。”

在同一文章的譯文中，我們還可以找到類似的錯誤。試問誰能理解“新的概念的廣泛發達的表達是根詞結合的結果”（98頁）這樣的話呢？高名凱先生的《普通語言學》（新知識出版社，1957年）曾強調指出“我國有一些作家和有一些希望成為作家的人們，平常多半

① 見《語法論集》第二集，中華書局，1957年，97—113頁。

② 為了節省篇幅，我們以下談到高先生的譯文時，都不再照引原文，讀者可以分別查對所見各書。

不重視語言……”①高先生是個語言學家，根據高先生自己的說法，自然是掌握了“語言的表現方法”的，可是“概念的廣泛發達的表達”怎麼理解呢？其實，如果“表現方法”好的話，按照原文，這句話的意思應該是“用詞根的結合去表示新的概念的方法得到廣泛運用”。

從上面几例已可看出，這不單純是譯者對俄語修辭的夠不夠的問題，而是說明高先生在翻譯工作上所表現的資產階級作風。

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不妨再看一看高先生的翻譯錯誤。還是見於上引一文中的例子：

屬於這一類型的，比方說，有漢語……，几乎是程度更高的……的印度-支那的越南語（安南語），某些西非洲居民的詞根語。（98頁）

“几乎是程度更高的……越南語”是什麼意思，什麼叫做“程度更高”？其實原文意思是說，印度-支那的越南語（安南語）差不多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屬於接近無形態語這一類型語言的。

再象把 некоторые языки корен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западной Африки（某些西非洲土著居民的語言）錯譯成“某些西非洲居民的詞根語”，這不能不說是譯者的粗心大意，這裡恐怕譯者是把“коренной”看成

“корневой”了。至於把 помимо порядка слов（除了詞序外）譯成“即詞序”，就完全把原文的意思顛倒了。

高名凱先生在自我批判的文章中說：“朋友們多次勸我寫一部通俗的漢語語法書，寫一部通俗的語學著作，我都回答說：‘這一類書總有人寫，何況寫書是為的多拿稿費，我寧願多花時間寫有學術價值書。’”②高先生想通過這段話來批判自己為學術而學術的思想，但是我們覺得高先生實際上是在替自己噓，吹噓自己的創作不是為名為利。

從我們所揭露的材料來看，可以看出高先生並沒有充分掌握俄語，而想大量使用俄語材料，因而出這樣的錯譯。這是一種什麼思想呢？

這種資產階級的治學態度，我們認為必須進行肅的批判。我們由於知識和客觀條件的限制，這篇文章，一定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希望高先生和其他同志指正。（1958，12，10，於莫斯科）

① 見《普通語言學》，6頁。按這裡高先生所強調的這段話，也表現了自己的資產階級觀點。

② 見《中國語文》1958年10月號，13頁。

談“軋”字的讀音

陳鐵卿

“軋”這個字現在常聽到有兩種念法，一念 yà，如“軋人”“軋面”一念 zhá，如“軋鋼”。普通話審音委員會發表的《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初稿》里所列“軋鋼”的“軋”規定讀 zhá，那麼，這個字是不是在其他詞里也都讀 zhá 呢？我認為應該明確一下。

根據有關方面的解釋，“軋鋼”的“軋”字代表了三種不同的動作，一種是軋輥的旋轉，一種是軋輥向軋軋材料的壓進，一種是材料的延長。這樣的動作，同《新華字典》所注的念 yà 的“軋”字所表示的動作似乎一樣，和“軋面”的動作也沒有多大分別。既系代表同一類的動作的字，讀音有的念“zhá”有的念“yà”這就使人分辨不清現在用“軋”字組成的許多名詞，哪個應該念“zhá”，哪個應該念“yà”。用“軋”字組成的名詞，就所見到的，有下列各種：

- 1) “軋道機”，是把道路輥壓平整的機器，通常這“軋”字全念“yà”。
- 2) “軋路機”，這名稱見1954年6月24日天津日報，題為“天津製造的軋路機開動在東北和雲南”。這機器不知是否和前舉的相同。

3) “軋面機”，全念“yà”。

4) “軋膠機”，這名稱在天津人民廣播電台是念“yà 機”，不知道還有念“zhá”的沒有。

5) “紙版軋制廠”，似乎是把紙漿軋(yà)平制成紙版意思，按照習慣，應該念“yà”；但有一次聽電台播，念為“紙版 zhá 制廠”。

6) “軋花機”，是把棉花籽輥壓出來的機器。很多人念“yà”，《辭源》和《辭海》上亦同，但也有人念“zhá”。

7) “電軋刀”，這名稱見於1954年6月14日天津日報《電氣用具最好用三眼插座》一文中，這“軋”字尚未聽見如何念法。

上面這些名詞，或者念法各異（如“軋花”），或者知道怎樣念（如“電軋刀”），很使人感到不便。

另一方面也說明“軋”字的念法，還存在着問題。這些問題，都是由“軋鋼”念“zhá 鋼”所引起的。如果一統念“yà”，則所有的問題，似乎全都解決。有人考慮到“zhá 鋼”念為“yà 鋼”是否容易，我認為問題在於是否當改，如果當改，在這“河水讓路，高山低頭”的躍進時代，一音之變，那就談不到有什麼困難了。

关于汉语副词转变为其他词类的问题

苏联 E. И. 罗日捷斯温斯卡娅

汉语里副词范畴的界限很不稳定。因此跟所有实词类和虚词类都有关系这一点，是副词范畴的特征。在语言里常常发生这样的转变过程：别的词类转变为副词，副词又转变为别的词类。副词靠所有基本的实词类来补充，而副词本身又是语气词（модальное слово）、连接词和助词（частица）的来源。

大家都知道，一个实词转变为其他实词，并没有失去实词性，只是改变它的意义和语法特性。实词转变为虚词，则不仅引起语法特征的变化，而且该词的实在意义也弱化了，进而消失了。

现代汉语里有着大量语音形式完全相同的并行的实词和虚词。其中最常见的是副词和语气词（总〔经常，总是〕，总〔一定，必定〕），副词和助词（才〔刚才〕，才〔只〕），副词和连接词（然后〔以后〕，然后〔其后〕；就〔马上〕，就〔便〕）。

上面这些词是一词兼有虚实两种功能呢，还是两个亲属词（同音词）呢？这个问题在汉学界到今天还没有一致的意見。大多数学者把这些词跟副词混为一谈，并把它們划在副词的范畴里。有些学者（馬尔施曼 Д. Маршман, 維格爾 L. Wiegner, 黎錦熙）无条件地把它們看成是等同的。另外一些学者感觉到了副词和非副词間的界限，或是指出了副词的虚实两种功能，但是仍把它們划在副词的范畴里；或是把它們从副词的范畴里分了出来。

例如王力教授，^①他把语气词“偏、偏偏、偏生、偏偏兒地、居然”和语气助词“还、又”合为一类，并且不是在研究副词的章节里討論它們，而是在研究“语气词”的章节里討論它們。王力教授还把句末语气助词“吧、呢”等放在研究语气词的章节里来討論。但是，王力教授在研究“语气词”的章节里討論这些词的时候，又不叫它們为“语气词”，而叫它們为“语气副词”（着重点是——我加的——罗）。可以猜想，王力教授所以把这些词叫做“语气副词”，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这些词是跟副词有亲属关系的。但是王力教授把那些在他看来是由形容词变来的语气词（偏、偏偏兒地）也归在这一类里。并且，除了语气词、语气助词以外，我們还能够在这里找到限制助词（用我們的术语）“只、倒”。这样，不同范畴的词就被混而为一了。

龙果夫則在本来是副词的词（忽然、已經、馬上）以

外，甚至把“幸亏、一定”^②这些沒有副词同音词的语气词，也归在副词的范畴里。那些起源于副词，但已脱离副词并已失去实词性和副词功能的词（就、才、还），龙果夫也把它們归在副词的范畴里。龙果夫把它們叫做“半实语气副词”^③（着重点是我加的——罗）。龙果夫指出了这些词的半实和半虚的作用，并指出了它們脱离副词范畴而转变为“语气-时间词素范畴”（разряд модально-временных морфем）^④（用龙果夫的术语，是謂語前加成分〔префиксы, сказуемого〕）的可能趋势。龙果夫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就、才、还”这些词的语气性質（如所周知，副词不能表現语气色彩），以及这些词转变为虚词的可能性，但是并没有把语气助词“就、才、还”从沒有语气意义的副词“就、才、还”里分离出来。相反，他还认为它們是副词。这样，在龙果夫的这一著作里，我們也看不出副词和非副词的多多少少有些清楚的界限。

在 C. E. 雅洪托夫的論文《现代汉语里带有虚副词的复合从句的构成》^⑤里，副词和语气助词（才—才，还—还），副词和限制助词（才—才，就—就），副词和连接词（才—才，就—就），也都合成了一类，^⑥他把副词“就”（馬上），限制助词“就”（只）和时间-条件连接词“就”（你来我就去）看作是同一个词；把副词“才”（刚才），限制助词“才”（只），语气词“才”（你才不去呢）^⑦和时间-条件连接词“才”（你来我才去）也看作是同一个词。“便”这个词，雅洪托夫則认为是副词。用他的話来说，在现代汉语里，“便”这个词是“永远不用作实词的”。^⑧

由于雅洪托夫不把副词（就、才、还）、语气助词

① 王力：《中国語法理論》，三章 22 节。

② 龙果夫：《现代汉语語法研究》，206 頁。比較：幸亏他跟着姓馬的跑去了……。你成全大嬌，大嬌一定对得起你。

③ 同上書，185 頁。

④ 《现代汉语語法研究》，207 頁。

⑤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ложноподчиненного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служебных наречи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載《东方學研究所学术札記》第四卷，莫斯科，1952 年，376 頁。

⑥ 參看 122 頁左栏下例句。

⑦ 例子引自王力《中国語法理論》，上海，1941 年。

⑧ 見上引⑤論文，378 頁。

(就、才、还),限制助詞(就、才)、連接詞(就、才)認為是不同的詞,而認為它們是同一個詞的不同功能,在上述論文里我們就可以看到,什麼副詞“失去獨立的意义”(378頁),副詞是“虛詞”(381頁),副詞“就、便、才”有語氣的(強調的)意义,“作為句子依存性的标志,這三個副詞(着重點是我加的——羅)得到了從屬連接詞的純語法功能”(392頁)。以上論斷和以下論點是有矛盾的:副詞是實詞,它的任務是表現動作或性質的特征,它的基本功能是做狀語用。我們要是贊同雅洪托夫的意見,把所有上述各點都算作是副詞的特征和屬性(缺乏獨立的意义,有語氣的意义和虛詞的职能),那就意味着不合理地提出過寬地解釋副詞范疇的觀點,意味着把副詞范疇融化在其他詞類里。

這些詞的親屬關係是十分明顯的,因為在語言里可以碰見過渡的情況。但是過渡的情況必須跟已經轉變過去的情況區別開來。一個詞一旦轉入另一詞類,它的新的語法特性和語法职能就不允許它再歸到原來的詞類里去。

此外,在我們看來,賈布基娜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①賈布基娜把有親屬關係的同音詞區分為副詞性名詞跟后置詞兩種不同的詞類。

關於劃分副詞及其鄰近的詞類的界限的問題,是非常複雜的。主要的困難在於漢語里有大量這樣的詞,它們處在兩個詞類的邊界上,它們離開了原來的詞類,可又沒有完全轉入另一類詞。語言里同音詞的急劇發展也帶來了不少的麻煩;一個新形成的詞的語音形式通常跟它所由發展而來的詞完全相同。

我們在提出關於劃分副詞和由副詞變來的詞的界限這一問題時,自然不會給自己提出不能勝任的任務——為這一非常複雜的問題作出某種全面的描述。這無疑地是值得作專門研究的。我們只是由於我們的著作《副詞的語法分類》的主題才涉及這一問題,我們的目的也只是尽可能地劃清副詞和其他由副詞變來的詞類的界限。

在解決關於詞的語法分類這一問題時,我們根據的是蘇聯語言學界里頭偉大的俄羅斯語言學家謝爾巴所制訂的原則。按照謝爾巴《論俄語詞類》^②一文中的觀點和見解,我們認為,在劃分漢語詞類時,必須注意詞的意义和所有它們的語法特征的總和,其中包括它們的句法特征——和其他詞類結合的搭配性,它們在位置上的可能性,它們的語法职能。

詞有不同的意义和不同的語法特征,說明它們有着不同的語法本質,說明它們有着不同的詞類屬性,儘管它們的語音形式可以是相同的。

上面已經說過,詞從一個詞類完全轉入另一個詞類的情況,應該跟那種情況區別開來,就是說,一個

詞可以用作原來詞類的功能,也可以用作新的詞類功能。我們把這種詞當作是從一個詞類到另一個詞類的過渡。

事實證明,漢語里的副詞可以完全失去副詞所有的語法特性,獲得新的、完全跟副詞范疇不同的語法特征,從而轉入其他的詞類——語氣詞、助詞、連詞。但是除了這種情況以外,還可以有過渡的情況,就是說,可以有不完全脫離副詞的范疇,不完全失去詞的實詞性,只是在功能上近於上述詞類的過渡性詞。

底下我們把跟副詞鄰近的三個詞類略加探討,三個詞類基本上靠副詞來補充。

一 副詞和語氣詞

語氣詞最容易跟副詞混淆起來。不僅那些在副詞基礎上產生的語氣詞是如此,就是那些從來不曾是副詞的語氣詞,^③以及甚至那些在詞源方面跟副詞沒有任何關係的語氣詞,也是如此。語氣詞所以會這樣,來不僅是因為在形態方面,語氣詞和副詞有部分一致而且更主要的是,因為語氣詞跟虛詞不一樣(虛詞也以靠副詞來補充),語氣詞在詞彙上跟副詞一樣,也是獨立的。正因為這樣,大多數漢學家都無條件地把下列語氣詞歸到副詞里:

居然	果然	固然	定然	竟然	必然	當然
確然	自然	誠然	顯然	或然	確是	的確
真(真是)	幸而	不幸	幸亏	也許	一定	
總	大概	偏	偏生	偏偏兒地		

其實,大多數上述語氣詞在意义上(語氣的意义但不是特征的标志)^④和語法特征上也跟副詞不同,這種語法特征表現在位置的活動性上。無論從詞匯內部的觀點來看,或是從語氣詞的現時分化的觀點來看,移動了語氣詞的位置,都不影響句子的意义。語氣詞是句子的插入成分,並不歸附在句子的某一個成分(主語、賓語)上。語氣詞不跟某一詞類相連系,它是屬於整個句子的。在這點上語氣詞也跟副詞不同。

語氣詞在漢語里,也正如在其他語言里一樣,是表達語氣的手段之一。以下這種語言現象,通常也認為是語氣:借助於一定的手段(語法的或者詞彙的)來表達說話人對陳述內容的態度,對現實的態度,以及對

① H. H. 賈布基娜:《現代漢語中的后置詞》,譯載《中國語文》,1957年12月號及1958年1月號。

② 謝爾巴:《論俄語詞類》,時代出版社,1957年。

③ 正如王力教授所指出的那樣,漢語里的語氣詞也可以由其他的詞類構成。參看王力《中國語法理論》三章第23節“語氣味品”。

④ 單音節的語氣詞“總”例外,看下文。

的評價。在漢語里，語氣可以用不同的手段來表達：語氣詞（自然、當然）、語氣助詞（呢）、熟語（自然而然）、詞組（不成問題）、語調，等等。但不管用什麼來表達語氣，目的只有一個，即表示說話內容對於現實的關係。

我們可以用語氣詞從以下觀點來表達說話人對於所述意見的態度：確實性（真、真是、的確、確然、確是）、可能性（顯然、大概、或許、也許）、必然性（當然、一定、總、必然），等等。

以上所列举的詞中，絕大多數只用作語氣詞。但是其中有的是分屬於兩個不同詞類的。例如，“總”在語言里既可以用作副詞（經常、總是），也可以用作語氣詞（一定、必定）。

比較以下各個例子：

- 1) 我|在|那|間|小|屋子|住|慣|了，總|以爲|東西|不|少……。 (老舍：櫻海集，人間書屋，1938年，200頁)
- 2) 她|那兒|總|有|事，這個|家|還|能|攔|得了|她|啦！ (孫芋：婦女代表，新華月報，1953，9，240頁)
- 3) 不過|我|相信|他|總|有|一|天|會|明|白|過|來|的。 (馮峰：韓海梅，中國青年報，1954，6，29)
- 4) 你|總|得|惹|他|嗎？ (孫芋，242頁)

從以上四個例子里可以明顯地看出，頭兩個句子中的“總”和後兩個句子中的“總”，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詞。在頭兩個句子里，“總”是副詞，是修飾動作的狀語，並且既可以屬於它所修飾的詞（總|以爲），也可以屬於在它後頭的詞組（總|有|事）；語氣詞“總”（後兩句）則表明說話人認為他自己所說的話是真實的，他自己所描述的事實或現象一定會發生或者必定要發生。副詞“總”起狀語的作用，語氣詞“總”則是句子的插入成分。

語氣詞“總”（例3、4）用作這一意義時，可以用其他語氣詞（例如“一定、准”）來代替，而句子的意義不變。副詞“總”（例1、2）則只能用自己的等價物，即雙音節的“總是”來代替。它不能用語氣詞“一定、准”來代替而使句子保持原義不變。

語氣詞“總”通常是在動詞或形容詞的前頭。儘管這樣，它仍然跟那些在句子里可以處於不同位置（在謂語的前頭，謂語的後頭或者離謂語很遠的地方）的其他語氣詞一樣，是屬於整個陳述而不屬於某一個詞的。語氣詞“總”的這一特點，看來是決定於它的形態學的構成（состав）和它的單音節性。

如上所述，其他的語氣詞在句子里可以處於不同的位置。由於它們不跟句子的某一成分相聯繫，而是屬於整個陳述，它們位置的或前或後並不影響句子的意義。

比較以下幾對例子：

- 1) 自然，他|也|曉得|這樣的|機會，不|完全|出|于|偶然。 (老舍：駱駝祥子)

我|才|二十|歲，自然|記|不得。 (趙樹理：李家庄的變遷，7頁)

- 2) 當然|這|是|“中國|今日|之|必需”，當然|“本|黨|願意|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

這|當然|不是|了！ (趙樹理，李家庄的變遷，92頁)

- 3) 我|的確|不|難看。 (櫻海集，229頁)
- 的確|他|不|難看。 (人民日報)

- 4) 這|誠然|是|事實。 (中國語文，1954，4，12頁)

誠然|他|來了。 (人民日報)

在以上所舉的例子中，語氣詞都可以跟主語掉換位置而句子意義不變。而副詞如果掉換位置，就會影響到句子意義的變化（在它現時的分化方面）。

是什麼促使副詞變為語氣詞的呢？

使得副詞有可能變為語氣詞的條件之一，是副詞在句法上的獨立性。我們知道，副詞的某些個小類（主要是狀語副詞和性狀副詞）①可以位於句子的前頭（在主語前）。我們還知道，有的副詞有時並不直接跟一定的詞相結合，它們可以不只是屬於一定的詞，而且與其說是屬於一定的詞，還不如說是屬於後面的整個陳述。②上述幾個小類里的某些個副詞可以跟它所修飾的詞分離開來。這種句法上的分離情況（這時副詞挪到句子的前頭來，屬於整個陳述，文字上用逗點隔開來）是一個詞脫離副詞範疇並轉變為語氣詞的一個機會。這樣，由於副詞跟它所修飾的詞間聯繫的減弱，副詞就有可能轉變為語氣詞。

然而，我們知道，並不是所有位於句子前頭的副詞都脫離副詞的範疇而轉變為語氣詞。我們還知道，並不是所有的語氣詞都處在整個句子的前頭。例如，我們上面提到過的語氣詞“總”，它通常是在動詞（形容詞）的前面的。但是它雖然在動詞的前頭，仍然跟所有其他在這一位置上的語氣詞一樣，不是為了表示這一動詞的性狀或特性，而是為了表示句子的語氣。因而，無論是句法上分離的副詞，或者句法上並不分離的副詞，都可以轉變為語氣詞。副詞的意義是確定副詞轉變為語氣詞的決定性的因素。如果副詞由於自己的意義，能夠表達語氣的色彩和句子的語氣，它在一定的條件下（跟被修飾的詞脫離，即互相分開）就可以轉變為語氣詞。

二 副詞和助詞（частицы）

由於助詞和副詞外形的吻合，很多漢學家常常把助詞歸到副詞的範疇里。不少助詞跟副詞的親屬關係是十分明顯的。就來源論，許多助詞就是以前的副詞，

① 參看《漢語里副詞的語法分類》一文。

② 參看《決定副詞位置的原因》一文。

它們在語言發展的过程中，获得了跟基本副詞职能并行的新职能，因而無論在意义上或者在語法特征上，都跟副詞分离开了。

作为独立詞类的副詞，它的特征和助詞的特征不相符合也不可能符合。副詞是修飾动作的性状的，助詞的职能則是表达詞或整个句子的意义色彩（或語气色彩）。副詞是实詞，即在詞彙上有实际价值的詞。它在句子里起状語的作用。助詞則不是实詞，即在詞彙上没有实际价值的詞。它不能充当句子的独立成分。“助詞的基本語法特征是不独立性，沒有一定的句法功能”。^①

汉语里的助詞可以是：

1. 表示說話人对现实現象的确实性的态度（語气詞“就、才、还”等）（例子見下文）。

2. 表示句子里詞义的不同語义色彩（例如限制助詞“只、才就”）（例子見下文）。

3. 把濃厚的感情色彩帶到話里去（簡直）。^②

語气助詞可以是：

a) 肯定的（是，是的），

b) 否定的（不，不是），

c) 疑問的（难道），

d) 比拟的（似乎），

e) 強調的（加强語調的，是），

f) 連接的。

在句子里它們可以屬於个别的詞，也可以屬整个陈述。

表示詞义的意义色彩的助詞，往往屬於那种由于助詞的帮助而使得在邏輯上从句子里強調了出来的詞；但是也可以屬於整个陈述。这里我們分为：

a) 限制助詞（只、才、就），

b) 加强助詞（也、还、才）（例子見下文）。

所有我們列举的助詞，大多数汉学家都把它們归到副詞里去。其实，它們在語言發展过程中，已经从副詞的范畴里分离了出来（而其中的某些个則本来就不是副詞）。^③并且，如果注意到这些詞的功能以及它們在汉语語法上的职能（例如龙果夫所說的“半独立詞”，王力所說的“語气副詞”，雅洪托夫所說的“虛副詞”），我們就不应该把它們看作是副詞。

上述的大多数助詞跟副詞的联系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在現代汉语里，所有这些助詞都失去了自己的实詞的、副詞的特性，并且从副詞里分离出来，变成了特殊的詞类。这也是沒有疑問的。

为了証实这点，可以比較下列各个例子里“才”的語法功能：

1) 他|才|来了。

2) 他|才|十|几|岁。（懷海集，257）

3) 我|才|不|去|呢！（王力：中国語法現論，上）

4) 他|来，我|才|去。

第1句里“才”（剛才）是实詞，起状語的作用。詞“才”（第2句里是限制助詞“才”，第3句里是語气詞“才”，第4句里是連接詞“才”）則失去了实詞性。方面副詞跟在它基础上形成的虛詞也根本不同。

限制助詞“才”（第2句）跟具有数量-实体意义詞組（числительно-предмет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結合，副詞“才”不能跟这类詞組相結合。这方面也可以看出这些詞的語法差別。

第3句里的語气詞“才”，一方面強調“我”（比“則”），另一方面表示不願完成动作的語气色彩。詞“才”在这方面也和这个同音的語气助詞不同。副詞由于修飾“特征”，在句子里只能作状語用。）

第4句里的“才”是連接詞，連接两个句子，表明一个事实是另一个事实的依存条件。（如所周知，不論副詞“才”，限制助詞“才”或者是語气助詞“才”都不具有这种职能。）

因此，博戈罗第茨基（Б. А. Богородицкий）教授俄語所說的“副詞在进一步的發展中会削弱它自己实詞性，并轉变为助詞”这一原理也完全适用于汉语。

只是根据两者外形的相似和詞源上的联系，就上列助詞归入有着自己一定語法特征的副詞，我們得是不合适的。象王力教授所做的那样，把語气助詞和句末語气助詞归入語气詞，也不能認為是有理由的。因為它們中間除了有共同的特点以外，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別。

語气詞是表达整个句子的語气的。語气助詞也以表达句子的語气色彩。但是，語气助詞往往使語調有不同的語气色彩：祈求，希望，不希望…。就是說語气助詞是表达个别詞的語气色彩的，不同于語气詞語气助詞的独立性較差，缺少实詞意义。在这一点上語气助詞跟那些按其意义來說是屬於实詞的語气詞也是不同的。

例如，可以比較一下底下的句子：

1) 当然|这|是|“中国|今日|之|必需”，当然|“本党|願|为|其|徹底|实现|而|奋斗”。

2) “的”|字|的|用法|誠然|有|許多|地方|和“之”|字|不|同。（中国語文，1954，4，12頁）

3) 沒有|就|拉倒|喂！还|总|得|你們|張罗。（孙犁，237頁）。

4) 我|才|不|去|呢！（中国語法理論）

① 《俄語語法》，苏联科学院，639頁。（譯者按：时出版社中譯本669頁把 частица 譯作“語气詞”）。

② 我簡直不知道干啥！

③ 例如以上所举的語气助詞。

在头两个句子里，語气詞“当然、誠然”表达句子的語气，即表达所述意見的絕對性与无疑性。語气助詞則只是表达語气色彩：在第3句里(还)是表示贊成那个动作被完成，第4句里(才)是表示不希望去完成那个动作。

在“又、还、也、才、就、便”等这种詞的輔助职能这一問題上，我們可以在中苏两国的許多学者的著作里得到指示。

例如，王力教授曾經指出，“我|又|不|是|鬼”的“又”并不象“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又”。王力写道：“前者表示坚决否認的語气，带有强烈的情緒，却不表示事情的重复…。后者并没有带着强烈的情緒，却是表示事情的重复的…”^①

但是，王力沒有从这一正确的观察中得出在我們看来是正确的結論：副詞“又”失去了原来的副詞意义(再、重新)，失去了实詞性，并且获得了新的意义(即發詞它所屬的那个詞的語义作用)，改变了自己詞类屬性，因而不是副詞了。

在第2句里，“又”是独立的詞，作動詞“来”的状态；而在第1句里，“又”是強調-突出助詞(усилитель-во-выделительная частица)，它失去了实詞性，只是起着強調所述意見的絕對性的作用。

雅洪托夫在写下面这段话时，指的也正是这一状态：“在一定的条件下，副詞‘还’和‘又’失去了自己独立的意义(着重点是我加的——罗)，并且連‘就、便、才’也強調或加强在句子里跟它們相結合的某个其他詞的意义…”^②

在下面的句子里，“也”應該認為是強調-突出助詞：

- 1) 这|棵|桑树|也|不是|我|栽|的，是|他|自己|出的…(赵树理，5頁)
- 2) 那|个|时候，我|也|不过|是|七|岁|呢！(櫻海集，196頁)
- 3) 你的|藥|也|不|是|大|風|刮来的。(孙犁，239頁)

助詞“还”也有这种強調的意义：

“那|还|用|說！”矮子|猜到|他的|意思。(駱駝祥子，14頁)

助詞“还是”也可以具有那种带有轉折色彩的強調意义：

- 1) 我|还是|去！
- 2) 你|还是|再|去|問|他！
- 3) 我|想|还是|叫|他|“秋宝”|吧！
- 4) 我|还是|不到|三十|岁的|人哪，后|半|輩子|怎么|过呢？(櫻海集，291頁)

所有上面举的助詞，在汉语里还可以有語气的意义。

王力教授、龙果夫、雅洪托夫和其他某些学者都指出了助詞“就、便、才、还、又、也…”的語气作用。

例如王力教授把在系詞前面的“就”看作是“語气副詞”，并且指出，在其他一些近似判断語的句子里，它也可以起語气作用。^③

龙果夫也強調“才、就”的語气作用，并認為将来它們可能脱离副詞的范畴。^④

按照雅洪托夫的意見，“就、便、才”在時間状語后头时具有語气的意义。他写道：“在一定的場合，副詞‘还’和‘也’失去了自己独立的意义，并且連‘就、便、才’也能使整个句子具有語气的色彩。”^⑤

助詞“还”的語气作用發展得更为强烈，它往往表达不滿的感情色彩。^⑥

- 1) 没|有|就|收拾了|得啦！还|总|得|織|那个|玩意儿！(孙犁，327頁)
- 2) 没|有|就|拉到|喂！还|总|得|你們|張罗！
- 3) 她|那兒|总|有|事，这个|家|还|能|擺得了|她|啦！(孙犁，240頁)
- 4) 她|还|能|听|你的|嗎？(孙犁，238頁)
- 5) 是|我，还|不|开|門|嗎？(中国語法理論，上，324頁)

但是，助詞“还”还可以表达惊讶(例1)和贊同(例2)的意味：

- 1) 奔走了|一|輩子，还|怕|風|嗎？(櫻海集，139頁)
- 2) 所以|妹妹|还是|我的|大|恩人|呢！(中国語法理論，上，325頁)

当“还”处在否定詞的前头时，它的語气色彩就表现得特別清楚。

- 1) 小|毛……又|向|二|姐|道：“你|还|不|快走！”(赵树理，8頁)
- 2) 叫|你|媳妇|吃|喂！总|出去|走去，还|不|得|多吃|点。(孙犁，240頁)

雅洪托夫甚至还断言：“在否定詞‘不’的前头时，‘还’永远只有語气的意义，而沒有实在的意义”。^⑦我們同意語气助詞“还”在否定詞“不(沒)”的前头时，語气色彩要比在肯定的句子里来得濃一些。但是，我們不贊同雅洪托夫那种認為“还”在否定詞“不”的前头时永远只有語气意义的提法。下列几个例子說明，副詞“还”就是在否定詞“不”的前头，也仍然保持自己副詞

① 王力：《中国語法理論》，上册，320頁。

② 雅洪托夫，399頁。

③ 王力：《中国語法理論》，上册，326頁。

④ 《現代汉语語法研究》，207頁(中譯本199頁)。

⑤ 見上引雅洪托夫論文。

⑥ 王力：《中国語法理論》，324頁。

⑦ 上引雅洪托夫論文，400頁。

的意义(直到现在还)。

- 1) 我|还|不|知道|他|肯|不|肯|呢! (中国語法理論, 上, 285 頁)。
- 2) 自然|我|还|不|能|完全|忘掉|那个|怪|好听的|字——爱。
- 3) 初|干的|时候, 我|很|害怕, 因为|我|还|不|到廿|岁。
- 4) 到|这个|时候, 他|还|不|得|回来。(孙芋, 241 頁)

“还”用作副詞的例子还可以找到一些, 但是就只这一些例子也足以說明, “还”在否定詞“不(沒)”的前头时, 也并不是永远起語气作用的。在这些“还”仍是副詞的場合, 我們沒有权利說它們是有語气意义的, 因为在这种場合, 它們跟語气助詞不同, 它們有实在的意义, 并且在句子里担任状語的职务。这一职务語气助詞是不能担任的。

除了以上所举的几种情况以外, “就”和“才”也可以在句子里充当限制助詞。

- 1) 我|才|十|几|岁。(櫻海集, 257 頁)
- 2) 那|几|家|种|稻子|的|人家|我|都|去了, 就|有|一|家|还|剩了|一|点|这么|短的, 别的|人家|都|烧|火啦。(孙芋, 238 頁)
- 3) 他|别人|都|不|怕, 就|怕|你|一个|人。(中国語法理論, 下, 286 頁)

助詞“就”除了以上的用法以外, 还有使陈述明确化的意义(уточните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赵树理, 31 頁)
水仙庙|就|在|这里! (中国語法理論, 上, 326 頁)

所有以上列举的助詞的意义(強調的, 語气的, 明确化的, 限制的…)都不是副詞所固有的。这也使得我們不把它們归入副詞。

三 副詞和連接詞

連接詞也跟副詞有緊密的联系。現代漢語里有許多起源于副詞的連接詞。底下这些就是:

- “然后”——以后,
“接着”——后来, 跟着,
“才”——時間-条件連接詞,
“就”——時間-条件連接詞,
“便”——時間-条件連接詞, 等等。

上列連接詞都有跟自己同音的副詞。在这些不同的詞中間只存在着親屬的关系。外形跟副詞吻合的連接詞, 并不用来作某一个詞的状語, 而是用来联系詞和句子的。以上这些同音詞用作連接詞的时候比較多, 用作副詞的时候比較少。

为了更清楚地划出副詞和从副詞来的連接詞間的界限, 我們底下举出同音詞“然后”的几个用法不同的例子:

- 1) 然后|才|有|可能, 在|日本|侵略者|被|消灭|之后, 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毛澤东 論联合政府)
- 2) 她|看出|这个|来, 然后, 死|也|甘心了。(櫻海集, 131 頁)
- 3) 他|把|自己|的|遭遇|說完了, 然后|問|小|常。(赵树理, 42 頁)
- 4) 給|他|講解了|一|下, 然后|問|他|会|写|字|不|会。

在第1句里, “然后”是時間副詞(以后, 将来), 做状語用。在第2、3、4句里, “然后”是連接詞, 表示一个事实(前一个句子里說的)是另一个事实(后一个句子里說的)的依存条件。正因为这样, 在后三个句子里, 連接詞“然后”可以用具有同样职能的另一連接詞“才”来代替。

至于時間-条件連接詞(условно-временный союз “就、便、才”这一問題, 則一般說来已經在雅洪托夫的上述論文里得到了正确的、圓滿的解决。我們同意并推荐雅洪托夫关于这些詞在語言里的功能和职务的說法。但是我們跟他不同: 我們認為, 在那种情况下, “副詞获得了純語法功能——从屬連接詞(还有并列連接詞——罗)的功能”(着重点是我加的——罗), 因而失去了实詞性的副詞的特性, 所以不能再認為它們是副詞, 而應該認為是連接詞, 因为“純語法功能”不是副詞的功能。(金有景譯)

附莫斯科大学东方語言学院院长 为本文致本刊的推荐書

莫斯科大学东方語言学院中国語文教研室和办公室, 請《中国語文》杂志發表教員 E. И. 罗日捷斯溫斯卡娅(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ая)的論文《关于汉語副詞轉变为其他詞类的問題》。这篇論文在中国語文教研室會議上討論过, 并決議介紹發表。

附上教研室決議摘录

莫斯科大学东方語言学院

院 長 A. A. 柯瓦列夫 副教授

莫斯科大学东方語言学院

中国語文教研室主任 Л. Д. 坡茲德涅耶娃教授

1958年11月10日(№ 61/511)

中国語文教研室會議記錄摘录

听取了 关于教員 E. И. 罗日捷斯溫斯卡娅的論文《关于汉語副詞轉变为其他詞类的問題》的介紹——建議發表。

決 議: 把教員 E. И. 罗日捷斯溫斯卡娅的論文介紹發表。

莫斯科大学东方語言学院

中国語文教研室主任 Л. 坡茲德涅耶娃教授

秘 書 Л. 馬 特 維 耶 娃

1957年12月27日

現代漢語詞語的縮簡

筱 文

所謂詞語縮簡(也叫“語詞緊縮”),顧名思義,是指把一個結構較長的詞語緊縮成一個結構較簡短的詞語,亦即用一個較小的語言單位去代表一個較大的語言單位。緊縮以後的詞語通常叫做“簡稱”或“緊縮詞”(在外國語里,一般稱之為“略語”或“縮寫詞”等)。例如,“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經常縮簡成“八大”。被縮簡的詞語主要是名詞或習用詞組,特別是專有名詞一類,但并不局限於名詞或習用詞組。

詞語縮簡是一般語言所共有的現象。例如,俄語中有 СССР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КНР (中華人民共和國)、КПК (中國共產黨)…。英語中有 USSR (蘇聯)、CPSU (B) (聯共[布])、PO (郵政局)…。縮簡也是“自古有之”的,例如,我國古代就有“孔孟”、“老莊”、“四書”、“三國”、“七雄”、“新舊唐書”、“南北朝”等等。把一個語言中所有的緊縮詞(或“簡稱”)彙編成集,這就是一部“略語詞典”,或者叫“縮寫詞詞典”。

詞語之所以需要而且可以縮簡,是由于人們在運用語言的交際過程中,遵循了“辭達而已矣”這個經濟的原則。省略句(即句子成分有省略的句子)的產生也是同樣的道理。一種意思,可以這樣去表達,也可以那樣去表達。但如果這樣去表達很繁瑣,而那樣去表達却很簡潔,同時又不致發生誤會,那麼,我們總是那樣去表達它。由此可見,詞語縮簡的目的是在於更經濟地運用語言。

詞語的縮簡同詞語的發展,從表面看來似乎是矛盾的。人們為了更好地表達思想感情及其細微差別,所用詞語的發展必然由簡單而複雜,語言單位由小而大。可是,詞語在發展中又要把繁復的、較大的語言單位縮簡得很簡短。拿漢語來說吧,大家知道,漢語在它的歷史發展進程中,複音詞的數量不斷地增加,但與此同時,緊縮詞也大量產生。其實,這並沒有什麼矛盾,而且可以說是必然的現象。因為詞語大大發展了,而且變得越來越繁復了,因此才需要在不影響意義的表達下進行縮簡。如果所有的詞語都非常簡單,那麼又有什麼縮簡的必要呢?

詞語縮簡在詞彙發展上有着一定的作用——構造新詞。我們有理由把詞語的縮簡認為是一種構詞手段。例如,現代漢語中的“軍屬”、“烈屬”、“掃盲”、“整

風”、“文藝”、“文教”、“文娛”、“增產”、“黨章”、“團紀”等等緊縮詞,我們通常是把它們看成詞的,把它們作為一個個最小的語言單位來運用的。它們尽管來自詞組,但與一般詞組不同。一般詞組是人們在交際過程中,根據交際的需要而從語言詞彙中選出合適的詞,按照語法規則臨時組織起來的,因此,它的結構比較靈活。而緊縮詞的結構是比較固定的,這種固定性主要取決於原詞語的固定性。

二

現代漢語詞語的縮簡,按其組成成分的不同,可分為兩大類,各類又可以根據構成方式再分為若干小類。

第一類:由原詞語中的詞或詞素構成的。

(一)由原詞語中各個詞的第一部分構成的,例如:

文字改革	→ 文改	支部書記	→ 支書
文化教育	→ 文教	初級中學	→ 初中
勞動模範	→ 勞模	基本建設	→ 基建

另外,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馬、恩、列、斯(或“馬恩列斯”);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台、澎、金、馬(或“台澎金馬”)等同屬此類。這是現代漢語中詞語縮簡的最常見的形式,數量也最大。有人說這類縮簡法很象外國語中用各個詞開頭的大寫字母來代表整個詞語一樣。我覺得這類縮簡法似乎更接近於俄語的 колхоз (集體農莊)←коллектив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комсомол (共產主義青年團)←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молодежи; партком (黨委會)←партийный комитет 之類。

(二)由原詞語中前一詞的第一部分和後一詞的第二部分組成的,例如:

軍人家屬	→ 軍屬	外交部長	→ 外長
礦業學院	→ 礦院	鋼鐵元帥	→ 鋼帥
增加生產	→ 增產	掃除文盲	→ 掃盲

(三)由原詞語中前一詞的第一部分和後一詞的首末兩部分構成的,例如:

支部委員會	→ 支委會	高等教育部	→ 高教部
財政貿易部	→ 財貿部	少年先鋒隊	→ 少先隊
共產主義青年團	→ 共青團		

(四)由原詞語中各詞的第一部分和它們共同含有一個成分構成的,例如:

中學小學	→ 中小學	青年少年	→ 青少年
------	-------	------	-------

中型小型→中小型 工业农业→工农业

男社員女社員→男女社員

这一类在汉语中是比较多见的,它的特点是:1)原词语是并列结构,而且并列各词是偏正结构(即“主从结构”)。只有极少数是例外。2)并列各词的中心词相同。3)有一定的限制。例如,可以说“大中学生”、“小学生”,但不说“大小学生”;可以说“指战员”,但不说“指通讯员”,等等。4)并列各词如果关系不很密切,则通常用顿号隔开。例如,化肥、草肥→化、草肥;乡干部、社干部→乡、社干部;轻工业、重工业→轻、重工业等。但由于两者关系不很密切,因此听起来觉得别扭,所以这种缩简法多见于书面,口语中还比较少见。5)并列词在三项以上,一般需要用顿号隔开(习用的除外),例如,大、中、小学,工、农、商业等。有时还加进一个数词,例如,春季,夏季,秋季,冬季→春、夏、秋、冬(或“春夏秋冬”)四季;农业、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农、林、牧、副、渔(或“农林牧副渔”)五业等。

(五)由原词语中首末两个词或词素构成的,例如:

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社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

供销合作社→供销社

北京车站→北京站

(六)由原词语中的一个词或词素来代表的,例如:

中国→中

历史→史

清华大学→清华

杭州→杭

共产党→党

和平电影院→和平

共青团→团

这类紧缩词在运用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脱离了确定的语言环境(谈话、上下文),往往不容易理解其确凿的含义。例如,“和平”这个紧缩词,如果没有确定的语言环境,它可能指“和平电影院”,也可能指“和平宾馆”、“和平饭店”、“和平理发馆”,等等。因此,这类紧缩词的词义的表达几乎完全依赖于确定的语言环境。如果我问你:“今儿个愿上哪里看电影?”答:“和平。”这时候,我就知道“和平”指的是“和平电影院”,而不是其他。因此,语言环境如果不明确,这类紧缩词不宜多用,以免发生误会。

(七)由原词语中前一词的第二部分和后一词的第一部分构成的,例如:

人民警察→民警

历史地理→史地

工厂矿山→厂矿

四川大学→川大

(八)其他,例如: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

第二类:由原词语中抽出各组成词中的共同成分(词素、词、词组)与一个数词构成的,例如:

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三好

秋收工作、秋耕工作、秋种工作→三秋工作

官僚主义作风、主观主义作风、宗派主义作风→三风

官气、暮气、阔气、娇气、骄气→五气

其他如人民公社中所实行的“三化”、“三包”;商店开展的“×满意”运动;爱国卫生运动中的“三课”、“四无”;建筑业中的“四不用”,等等。但必须注意的是:1)数词必需与原词语的并列成分数相当。2)凡两项并列的词语,数词只用“双”而不用“二”。

这类缩简法非常简便,也很实用。近来比较多见。

现代汉语词语缩简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绝不止上列几种。上面所提到的只是我们所经常看到的,也是经常为人们所采用的几种主要方式。

三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几个结论:

(一)现代汉语中的紧缩词以双音节的为主。汉语是由单音节的词根语逐渐发展为多音节语的。由单音节过渡到多音节(特别是双音节)的发展,是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之一。现代汉语是多音节语,而且以双音节词为主。现代汉语的词语缩简也反映了汉语词彙的这种发展的基本趋势,反映了现代汉语词彙的基本特点。三音节以上的紧缩词也有,但数量较小。

(二)紧缩词的成分必需是原词语中最主要的成分,要能够表示原词语的意思,而且要一望而知。例如,劳动模范→劳模。“劳”尽管有“劳力”、“劳驾”、“劳神”、“劳绩”等结合词,但在我们的脑子里,最容易想起的是“劳动”这个意思;“模”尽管有“模型”、“模仿”、“模糊”、“模拟”等结合词,但在我们的脑子里,最容易想起的,特别在“劳动”这个意思的后边,那只会是“模范”的意思,而不会其他。“劳”、“模”是“劳动模范”中的两个主要成分,它很好地表达了“劳动模范”的原义,而且是一望而知的。如果用“动模”、“动范”、“劳范”等形式,就不能很好地表达“劳动模范”这个意思了。

(三)词语缩简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究竟采用哪种方式,除了要遵守(二)的原则外,还要使之不发生误会。例如,“北京大学”、“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同是学校名称,但缩简的方式不同。“北京大学”、“交通大学”简称为“北大”、“交大”,而“南开大学”简称为“南开”不简称为“南大”,这是因为“南大”既可能指“南开大学”,也可能指“南京大学”,容易发生误会。另外,“清华大学”简称“清华”不称“清大”,“复旦大学”简称

“复旦”不称“复大”。那么“北京大学”、“交通大学”为什么不称“北京”、“交通”呢？这是因为：如果“北京大学”、“交通大学”称为“北京”、“交通”，就与普通名词“北京”、“交通”相混了，而“清华”、“复旦”等则不会混。

(四) 紧缩词的构成方式一般与原词语的构成方式相同。例如，“初级中学”与“初中”同结构，“扫除文盲”、“节约用电”与“扫盲”、“节电”同结构。只有第一类中的(四)情况不同，原词语是并列结构，而紧缩词则为偏正结构，例如“教员职员”（并列结构）→“教职员”（偏正结构）。

(五) 紧缩词在实际运用中有一定的限制：1) 需要有确定的语言环境。2) 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文体中，使用情况不一。一般说来，口语中紧缩词用得较多，书面上用得较少（这是由书面语的特点所使然）；一般文体中用得较多，政策、法令、文告、条约等庄重文字中用得较少（尽量不用）。3) 有些紧缩词只流行于某些地区或个别单位，如果超出这个范围，人们就不一定了解。

四

解放以来，紧缩词大量出现，而且还在不断地产生。例如，“党委”、“团委”、“省委”、“基干（民兵）”、“基建”、“人代会”、“学代会”、“妇联”、“学联”、“劳保”、“统

战部”、“劳改”、“夜大（学）”、“护林”、“化肥”、“土特产”、“纠偏”、“文娱”、“文（娱）体（育）”、“良种”、“科研”，等等。随着祖国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各项政治运动的展开，总有大批的紧缩词出现。例如“双减”（减租减息）、“土改”、“反霸”、“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四防”、“双反”、“五保”、“整风”、“反右”、“建社”、“建党”、“四害”，等等。这些紧缩词大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生造的、词义不清的紧缩词，损害了祖国语言的纯洁，造成了语言的混乱。例如，有人把“社会科学基本知识”称为“社基”；把“马列主义基础”称为“马基”；把“干部群众”称为“干群”。这些紧缩词是令人费解的，是不合乎汉语规范化的原则的，必须加以反对。这类生造的紧缩词在报章杂志的标题上最多，这是不能不引起编辑同志注意的。

词语缩简是为了交际的方便，为了省事，但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一方面在运用紧缩词，而同时又担心别人不懂或恐怕发生误会，因此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例如“（优）良（品）种”、“村干（即农村工作干部）”等形式。这不但省事，反而更累赘了，实在是多此一举。总之，语言是“约定俗成”的，紧缩词也一样。如果觉得这个紧缩词语义不明确，可能发生误会，那么就干脆不要用。

山东师范学院语言学教研组的新跃进

山东师范学院语言学教研组最近在修订教学计划和科学研究规划方面有新的跃进。

教学计划：现在的教学计划是，把语言课程分做“马克思主义语言基本理论”、“现代汉语”、“古汉语”三门课。“马克思主义语言基本理论”讲授一学期（一年级上），每周两节。内容包括：

- 1) 语言的社会本质；
- 2) 语言的起源和发展；
- 3) 毛泽东同志论语言；
- 4) 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语言工作的重视（重点讲中国共产党对语言工作的关怀和重视）。

此外有两个附录：

1) 语言学名词浅释；2) 世界语言分类和中国各民族语言分类。“现代汉语”有两点与过去明显不同的是，第一，包括了原《语言学概论》中关于语言学各部门的最基本的理论。第二，注意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坚决克服烦琐的解剖学、分类学倾向。练习课加多。

科学研究规划：全教研组集体研究的有两项：1) 山东方言词汇调查。这项工作与一年级全体同学（220位）合作。计划在今年“七一”前编成《山东方言词汇》，向党献礼。现在已编好《山东方言词汇调查手册》，将发给同学利用寒假回家的机会进行调查。2) 毛泽东语言研究。这主要是青年教师搞的，要根据几个专题分别写成论文或小册子。属于个人的有普通话学习手册、汉语词汇论、古今汉语词法比较、民歌的修辞手法，等，将分别于“五一”、“七一”、“十一”向党献礼。（予 朗 1959年1月）

广东阳江話物量詞的語法特点

黃伯榮

阳江話是粵方言的次方言。阳江話量詞跟广州話大抵相同，跟普通話差別相當大。本文只談阳江話物量詞跟普通話不同的地方。

1 阳江話量詞跟普通話量詞的使用範圍大都是不相等的。其中詞形相同的有個、條、枝、張、只等；詞形不同的有窺 [luk²⁴]（計算又圓又直的東西時用）、lem²⁴（半个）、pa⁴⁵⁴（計算濕而軟的東西時用），等等。就拿詞形相同的專用量詞來說，①也很少有一對一的关系。如：

阳江量詞	名詞	普通話量詞②
條	棍（棍子），頭毛（頭髮）	根兒
條	索仔（繩兒）	根兒，條
條	皮帶，路，河，蛇，魚，褲（褲子）	條
條	歌	個
只，條	褲腳（褲腿）	條
只	大腿（腿）	條
只	船，手（手和臂），脚（脚和腿），眼（眼睛）	只
只，個	燕子	只
個	羊，貓，鴨（鴨子）	個
個	人，朋友，月亮，碗	只
個	牛	頭
張	紙，凳（凳子），台（桌子），床	張
張	信	封
張	被（被子）	條
張	椅（椅子），刀，鐮仔（鐮刀）	把
把	較剪（剪刀），剃刀，柴，扇（扇子）	把

上面每個量詞只是舉了少數名詞，如果多舉幾個，情況就更複雜。從上面簡單的對比中可以看出，“條、只、個、張、把”等幾個常用的量詞沒有一個使用範圍是相等的。至於那些方言的特殊量詞，更難找到與普通話使用範圍完全相等的量詞了。

2 阳江話量詞可以在沒有數詞的情況下受形容詞“大、細、𤣎 [tit²⁴]（小）”的直接修飾。如：

- 1) 其買都三個鷄𤣎 [tj'en³³] 好細個。（他買了三個鷄蛋，很小的。）
- 2) 我果張刀𤣎張，你那張刀大張。（我這把刀小，你那把刀大。）
- 3) 大張個柴刀好駛過細張個柴刀。（大的柴刀比小的柴刀好用。）
- 4) 那𤣎 [nei²⁴] 番茄堆得大堆得滯，下低個番茄做下都 kem⁴⁵⁴ 爛都。（那些西紅柿堆得太大，下面全部都壓爛了。）

- 5) 亞三妹吃蔗愛吃大窺 [luk²⁴] 個。（三妹吃甘蔗要吃大的。）

上面例1、2的“形·量結構”（即形容詞修飾量詞的偏正結構）是作謂語的，例3是作定語的，例4是作補語的，例5是由“大窺”這個“形·量結構”組成的“個字結構”（相當於普通話的“的字結構”），拿“個字結構”作賓語。“形·量結構”不能作狀語。“形·量結構”前頭經常再有修飾成分，如例1的“好”（很）。

修飾量詞的形容詞還能重迭，重迭后的意思相當於“很”，重迭後不能再受副詞“好”和代詞“𤣎” [neŋ²¹]（那麼）的修飾，前面也不能再有數詞。如：

- 1) 那個夫娘大大個。（那個婦人個子很大。）
- 2) 其買條手巾𤣎𤣎條。（買一條小小的毛巾。）
- 3) 卑几粒𤣎𤣎粒個珍珠其也。（給他几粒小小的珍珠吧！）
- 4) 髻仔插緊一朵細細朵個花仔。（髻上插着一朵小小的花兒。）

上面例1、2的“形·量結構”都是作謂語的，例3、4的都是作定語的，這兩點是跟一般形容詞相同的，不同之點在於它作定語時必須帶助詞“個”（的），它不能作狀語。

3 單音量詞後面能加“仔”表示數量少，有強調不多不大的意思。這時量詞前面必須有數詞。它們一般只用作定語。如：

三兜仔菜芥 meŋ⁴⁵⁴（什麼）事。（三顆菜太少了，不頂事。）

其卑兩粒仔豆米我。（他給我僅僅兩小粒花生。）

鑊乃華有一條仔蕃薯。（鍋里只有一小條甘薯。）

阳江話量詞和數詞之間能插進“大”，但不能插“細、𤣎（小）”；普通話數詞之間也能插進“小”。

4 阳江話一部分量詞有形態變化，它由單音變成雙音，它變形後極言事物之多。變形後有一定的語音結構規律，也有一定的使用範圍。例如：

① 兩種話的表示度量衡的量詞（斤、兩、丈等）或借用量詞（桶、杯、船等）絕大部分是一對一的关系。

② 普通話書面語言中一個名詞往往可以配上幾個專用量詞，如“繩兒”可稱“條”，“魚”可論“條”論“尾”，北京話還可以論“個”。這些現象是應該加以規範的。本文只採用比較常見的量詞。至於阳江話的名詞所用的專用量詞就比較固定，很少一個名詞用幾個專用量詞的情形。

pan³³lan³³ (般栏): “一大帮、一大群”, 只加在指人或动物的名词前面。

有一般栏人采改过。(有一大群人从这儿经过。)

p'an⁴⁴³lan⁴⁴³ (棚): 计算蔓延在一块的植物时用。

其屋门口栽紧一棚葡萄。(他家门口种着一大棵葡萄树。)

p'a⁴⁵⁴la⁴⁵⁴: 计算因饱含水分而软绵绵的东西时用。

片糖溶都, 成都一 p'a⁴⁵⁴la⁴⁵⁴。(黄糖溶化了, 成了软绵绵的一大块。)

p'eu²⁴leu²⁴: “一大包”, 计算鼓起来的東西时用。

袋里头果 p'au²⁴leu²⁴ 系 mi⁴⁵⁴嘢? (口袋里这一大包是什么东西?)

tui³³lui³³ (堆): “一大堆”。

一堆人采乃搞火。(成堆人在这火旁取暖。)

teu²⁴leu²⁴ (門漏): “很大的一窝, 成群結队”。

一門漏細仔采乃搞。(成群的小孩在那兒鬧。)

其养紧一門漏猪仔。(他养着一大群小猪。)

t'un⁴⁴³lun⁴⁴³ (团): “一团”。

其拈紧一團飯焦。(他拿着一大团鍋巴。)

t'ap⁴⁵⁴lap⁴⁵⁴ (□腊): 计算迭起来的東西时用。

卑猫打烂都一□腊碗。(給猫打破了一大迭碗。被猫把迭起来的許多碗打破了。)

ka²⁴la²⁴ (挂喇): 计算一县串, 或县形塊状的东西时用。

其今日又买都一挂喇猪肉。(他今天买了县長的一大塊猪肉。)

kon³³lon³³ (江): “一大群”。

有一江□雀仔憑改飞过。(有一大群小鳥从这儿飞过。)

keu⁴⁵⁴leu⁴⁵⁴ “一大塊”。

果 keu⁴⁵⁴leu⁴⁵⁴ 系 mi⁴⁵⁴嘢呢? (这一大塊是什么东西呀?)

k'am⁴⁴³lam⁴⁴³ (□藍): 计算乱絲、乱髮、乱柴枝之类的

东西时用。

那坭紗綫乱都, 成都一□藍, 无解得开都。(那些紗乱了, 混成一团, 解不开了。)

k'eu⁴⁴³leu⁴⁴³: 计算积在一起的成顆成顆的东西时用。

树尾有一 k'eu⁴⁴³leu⁴⁴³ 果子。(树頂上有許多果子。)

t'iem²¹lem²¹ (枕): 计算聚集在一起的東西时用。

改处有一枕□瓜秧。(这儿有一大片集中起来的小瓜苗。)

t'in²⁴lin²⁴ (串): “一連串”, 计算一个接連一个的东西时用。

挖沟个人排成一串□。(挖沟的人, 一个接一个地[一連串地]排列着。)

上面这些双音物量詞都表示集体数量, 前面只能加数詞“一”或指示代詞詞素“果(这)、那”, 不能加別的数詞。它的意义相当于單音物量詞前面加“大”。它的語音結構很有規律: 1) 双音量詞的两个音节的韵母, 声調一定相同; 2) 第一个音节的声母都是塞音或塞擦音, 第二个音节的声母一定是边音“l”。

这种格式跟普通話書面語言中“一系列、一連串”等說法相近, 但是語音結構不相同。它跟北京話的“一tulu 葡萄”的tulu 相同, 但普通話書面語言很少見。如果把阳江話双音量詞的后一个音节去掉, 大都仍不失为一个完整的量詞, 基本意义仍不变, 只是分量不同, 也不表示集体的量(如头几个例子)。还有双音量詞跟單音量詞的句法作用很不相同, 它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省去“一”或“果、那”, 双音量詞也不能有各种重迭式(如个个或一个个、一个一个), 不能放在名词后面(韵文除外)。

(上接 132 頁)

(2) 虽…尙…

这相当于現代語的“虽然…还(也)…”。一般說来, 这种格式的轉折語气比上一种輕一些。《大雅·蕩》中有一例:

虽无老成人, 尙有典刑。

[虽然没有老成人, 还有成規可循。]

《詩經》中出現的成对关联詞当然不止上述几种。即从这些来观察, 也明显地可以看出一部分現代关联詞的語源。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詞彙的發展”一章中說: “先秦时代的联結詞, 留存在現代口語里的已經很少了。現代漢語中所用的联結詞大多数都是后代逐漸产生出来的。”^①这样的說法, 从詞彙范疇來講, 固然可以, 但是如果从語法范疇來講, 恐怕未必尽然。試把上述各种关联詞归納一下, 就可以知道:

(1) 原样留存在現代口語里的, 有: “匪(非)…不…”, “不…不…”, “不…亦(也)…”。

(2) 詞有变动, 語法作用不改变的, 这里又有三种情形: a) 一个詞有变动, 其余一个留存下来, 如: “不…則…”, “不…乃…”; b) 其中一个詞作了現代語的詞素(詞根), 另一个有变动, 如: “虽…而…”, “虽…尙…”; c) 两个詞都有变动, 如: “无…无…”, “匪(非)…匪(非)…”、“縱…宁…”等。

(3) 現代語已完全不用的, 如“載…載…”作“忽而…忽而…”講的, “无…无…”作无法計算講的, 等等。

以上所說的, 并不包括留存在成語里的关联詞在內。如果把“无法无天”“非驢非馬”等成語也算在內, 先秦时代的联結詞留存到現代的, 那就更多了。

这篇文章是本人讀《詩經》札記的一部分, 虽然写成后一再整理补正, 錯誤和遺漏恐怕还是难免的。希望讀者給予指正。

① 王力: 《漢語史稿》, 下冊, 494 頁。

晉東南方言中的“圪 kəʔ”

王 迅

本文所說晉東南主要是指陽城、晉城、陵川、屯留、長子各縣以及沁縣、黎城、襄垣等縣的大部分地區。

晉東南方言雖屬於北方話系統，但也有些特殊的語法現象。這裡打算談談其中的“圪 kəʔ”。

“圪” kəʔ 讀入聲。調子低平而短促，調值為 4₂。“圪 kəʔ”附加在其它詞上的時候，讀音較輕。

名詞 凡表示形體比較小和許多小形體積累起來的具體的單音名詞前，都可以加“圪 kəʔ”。

1) 原來是單音詞，加“圪 kəʔ”變成複音詞：

圪泡(如血泡、膿泡等) 他手上打滿了圪泡。

圪凹(小土坑) 操場上到處是圪凹。

以上為表示形體較小的名詞。

圪塹(tʂA) (垃圾) 把圪塹掃出去。

圪沫(水沫) 河裡漂着許多圪沫。

以上為表示許多小形體積累起來的名詞。

2) 名詞前邊加“圪 kəʔ”，而省“子”、“頭”詞尾：

圪枝(枝子) 把圪枝取過來。

圪杈(杈子) 拿圪杈把門頂住。

以上為表示形體較小的名詞。

圪台(台子) 他站在圪台上講話。

圪石(石頭) 院子裡圪石很多(院子裡只有一塊石頭，就不能說“圪石”)。

以上為表示許多小形體積累起來的名詞。

3) 有少數表示大形體的單音名詞前邊，也可以加“圪 kəʔ”。但在“圪”前，還得加形容詞“大”或“老”：

大圪凹(大土坑) 地裡有許多大圪凹。

老圪石(大石頭) 大門外放着一塊老圪石。

4) 表示形體較大的具體單音名詞、抽象名詞和複音名詞前邊不能加“圪”：圪人、圪馬、圪思想…都不行。

動詞 只有在表示具體行為、動作的單音動詞前邊，才能加“圪 kəʔ”：

1) 加在動詞前邊的“圪 kəʔ”，對該動詞起弱化作用，並表示連續動作：

圪踩 他把銅錢埋進了土裡，又圪踩了一會。

(表示用腳踩若干次)

圪搓 他把紙圪搓壞了。

圪揉 他把紙圪揉壞了。(以下不再舉例)

圪游 圪溜 圪蹀 圪捻 圪抓 圪拉 圪陽…

2) 抽象的動詞、同動詞、助動詞前邊，都不能加“圪 kəʔ”：圪想、圪是、圪能、圪會…都不行。

3) 複合動詞前邊，不能加“圪 kəʔ”：圪打擊、圪逃跑、圪打掃…都不行。

4) 前邊加“圪 kəʔ”的動詞後邊，都能加“着”、“了”、“過”：

我把玻璃圪擦過了。

他圪捻着紙條。 他把紙圪揉了。

5) 前邊加“圪 kəʔ”的動詞的重迭。

a) 詞的重迭，相當於北京話動詞重迭嵌“一”：

圪擦圪擦(擦一擦)。 圪抓圪抓(抓一抓)。

b) 詞的重迭，中間可以加“了”：

圪擦了圪擦。 圪摸了圪摸。

c) 詞的重迭，中間不能加“一”：圪擦一圪擦、圪擦一圪擦、圪擦一圪擦…都不能說。

d) 詞的重迭，中間可以加“了一”：

圪塞了一圪塞。 圪看了一圪看。

e) 帶“圪 kəʔ”的動詞的單字重迭後語氣加強：

圪圪跳跳(形容很活潑，即蹦蹦跳跳) 這個小孩圪圪跳跳，真叫人愛。

形容詞 單音重迭形容詞前邊都可加“圪”：

1) 單音重迭形容詞前邊加“圪 kəʔ”，除有加強語氣的作用外，還表示“愛”的意思，如：圪彎彎的、圪曲曲的、圪紅紅的、圪香香的…。

2) 單音重迭形容詞前邊，可以連加兩個“圪 kəʔ”，有加強語氣的作用：

圪圪彎彎(很彎) 山路圪圪彎彎真難走。

圪圪曲曲(很曲) 圪圪凹凹(很不平)。

3) 在一部分單音形容詞前邊，可以加“圪低圪 kəʔ tikaʔ”，除有加強語氣的作用外，還有“厭惡”的意思：

圪低圪彎(討厭山路很彎，不好走的意思)

圪低圪凹(很不平) 圪低圪曲(很不直)

量詞

1) 在一些特殊的單音量詞前邊加“圪 kəʔ”，除把原來的單音詞變為複音詞外，再無其他作用。但一般是不能省掉的：

一圪堆(土) 一堆(土)

一圪撮 一小撮

一圪凹(水) 一池(水)或一凹(水)

一圪節(竹杆) 一節(竹杆)

2) 普通的量詞前邊，不能加“kəʔ”：圪斤、圪斗、圪尺、圪個…都不行。

《詩經》中成对关联詞的格式

竹 安

本文試圖从《詩經》中找出若干种跟現代漢語可資相互比照的成对关联詞的格式，以供閱讀或研究《詩經》的讀者參考，并为漢語史供給一点資料。为了使讀者易于了解，文中比較深奧的例句，或全句語譯，或注釋部分詞語。譯文引用了或參考了目前出版的几种譯本。

(一)表示并列关系的：

(1) 既…且…

它关联着两个形容詞或者動詞，相当于現代漢語“又…又…”，例如：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常棣)
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卷阿)
〔君子騎的馬，又熟練又快。〕
既微且慙 尔勇伊何？(巧言)
〔又慙腿又腫脚，你的勇气是什么？〕

也出現“既…又…”这样的格式：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破斧)

(2) 不…不…

用它組成的联合結構表示两者都不这样。在关联着两个動詞或形容詞的时候，用法跟現代完全一样。

例如：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伐檀)
〔不插秧不割稻，憑啥千緡万緡往家搬？〕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雄雉)
〔不妒忌不貪心，还有什么不好？〕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十月之交)
〔地震雷電隆隆地响，这是天下不安政教不善的迹象。〕

还有关联两个名詞的，例如：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愒？(君子于役)
“不日不月”就是“无日无月”，也就是日子没法計算的意思。这种用法在現代語中已經沒有。

“弗”“不”都表示一般性否定，从意又上講，“弗”大多数可以訓“不”，① 因此“弗…弗…”也可以跟“不…不…”相当。下边是用“弗…弗…”的例子：

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节南山)
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山有樞)
〔“弗鼓弗考”就是不打鼓不敲鐘。〕

(3) 无…无…

在《詩經》里，它有三种用法：1)表示两者都沒有。

例如：

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七月)

上天之載，无声无臭。(文王)

〔上天的事情，沒有声音，沒有香臭。〕

現代語中的成語“无法无天”“无柴无辱”，就是繼承这格式而成的。2)“无”訓“毋”，跟“不可”相当。例如：

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議，无父母詒罹。(斯干)

〔“无非无仪”就是不要違背，不要起邪心。〕

无踰我里，无折我樹杞。(将仲子)

《召南·甘棠》有一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可以跟上两例比較。3)“无”跟“無論”通。相当于“無論…無論…”或者“無論…或者…”，表示无条件。例如：

无冬无夏，值其鷺羽。(宛丘)

无大无小，从公子迈。(泂水)

“靡”“无”相通，1,3 兩項，“靡…靡…”均能承当，

例如：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采芣)

〔玁狁，种族名。〕

既愈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晝作夜。(蕩)

〔已經失尽了你的仪容礼节，不論晴天或者阴雨天，大吵大叫，把白天当作黑夜。〕

(4) 匪(非)…匪(非)…

这一格式有两种用法：1)在关联两个名詞的时候，相当于“不是…也不是…”，表示两件事物都否定。

例如：

匪鶉匪鸞，翰飞戾天。(四月)

〔鶉，高；戾，到。〕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何草不黄)

〔兕，野牛。〕

2)在关联两个動詞或形容詞时，相当于“不…不…”。

例如：

匪教匪誨，时維婦寺！(瞻卬)

〔妇寺，女人和太監〕

篤公刘！匪居匪康，迺場迺疆。(公刘)

〔“居”和“康”都是安的意思。〕

(5) 載…載…

成对用时的“載”，表示两个动作同时發生或者两种性状都具有。例如：

既見復关，載笑載言。(氓)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泂水)

〔又溫和又帶笑，不發怒光教导。〕

憂心烈烈，載飢載渴。(采芣)

① “不”和“弗”的用法不是完全一样的。參看王力《漢語史稿》中冊，324 頁。

有时却表示時間上的交替,相当于“忽而…忽而…”的意思。(这种用法本应入下节叙說,姑附此。)例如: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小戎)

〔兴,起来。〕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菁菁者莪)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四月)

(二)表示交替关系的:

(1) 或…或…

“或”作为虚指指称用的詞,成对用时,相当“有的…有的…”,和現代語“或者…或者…”不同。①例如:

国虽靡止,或聖或否。(小旻)

〔否,笨人〕

有不止用两个“或”的,如: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北山)

〔有的在家安安逸逸,有的为国尽心尽力,有的整天在床上睡大觉,有的整天到处奔忙。〕

(2) 不…則…

这一格式相当于現代漢語的“不(是)…就(是)…”,表示二者必居其一。例如:

不能辰夜,不夙則莫。(东方未明)

〔不能司夜的人,不是过早,就是太晚。〕

(三)表示正反关系的:

不…乃…

这一格式表示先否定前者而后肯定后者,相当于現代語的“不(是)…而(是)…”。前后两部分之間有襯托和被襯托的关系。例如:

不見子都,乃見狡童。(山有扶苏)

〔不看見子都(指心目中的情人),而只看見那个小滑头。〕

这里“不見子都”有襯托“乃見狡童”的作用,“乃”應該重讀。

(四)表示先后相承关系的:

既…則…

“既”和“則”都是副詞,它們先后呼应着用,表示两个动作在時間上先后相承接的关系,相当于“…以后,就…”这样的說法。例如: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出車)

有时只在前一分句用“既”,意思还是一样。例如:

既見君子,我心写兮!(蓼蕭)

〔写,釋然。〕

这里的“既”跟現代語的“既然”,虽然在語言演变史上有先后繼承的关系,但用法完全不同。

(五)表示縱予关系的:

(1) 虽…亦…

“虽”通“縱”,②“虽…亦…”就是“即使…也…”。例如:

虽速我訟,亦不女从。(行露)

〔即使要同我去打官司,我也不会順从你。〕

潛虽伏矣,亦孔之炤。(正月)

〔即使藏在深水里了,看起来也还是一目了然。〕

(2) 不…亦…

跟現代語一样,在緊縮复句中用它来表示先縱予后推論的关系。例如: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思齊)

〔即使不知道从前立下的規矩,也能符合規矩
即使沒有臣子来諫劝,也能向善的地方做去。〕

(3) 縱…宁…

这一格式是先縱予后詰問。例如:

縱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子矜)

〔即使我不往你那兒去,您为何不給我个音訊?〕

(六)表条件关系和假設关系的:

匪(非)…不…

“非…不…”这种格式在現代語中仍常見。它用来表示前边是个唯一条件,后边是个推論。在《詩經》里,“匪”后边只限于用名詞,这一点比現代語“非…不…”的运用范围要狹一些。先看《詩經》中的例子: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

湛湛露斯,匪阳不晞。(湛露)

〔晞,乾。〕

現代語中除了“非开水不喝”“非棕棚床不睡”这样的說法外,“非”字后边更常見的是動詞或有動詞的主謂結構。例如:

…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魯迅:論雷峰塔的倒掉)

…非花費許多時間不能写成个样子。(老舍:我怎样學習語言)

在今晚的会上非他来主持不解決問題。

(七)表轉折关系的:

(1) 虽…而…

它相当于“虽然…但是…”。例如:

戎虽小子,而式弘大。(民勞)

〔你虽然是个年輕小伙子,可是用場却大哩。〕

有只在从句前用“虽”或“虽則”的。③例如:

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常棣)

虽則七襄,不成报章。(大东)

虽則如云,非我思存。(出其东门)

〔虽然(姑娘)多如云,可都不是我所思念的。〕

(下轉 129 頁)

① 参看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187、190、352 頁。

② 見楊樹達《詞詮》卷六,95 頁。

③ “虽”單用,尚有其他用法。如:“女虽湛乐从,弗念厥紹。”(大雅·抑)“虽无予之,路車乘馬。”(小雅·采芣)前者相当于“只”,后者相当于“豈”。以上見楊樹達:《詞詮》卷六,95 頁。

关于改进汉语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几点意见

南京大学中文系語言教研組

一年来，南京大学中文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教学改革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运动。在运动中系统地检查和批判了过去错误的教学观点、态度和方法，重新制定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并开始编定新的教材。在这一系列的运动里，我们在汉语的教学问题上也有许多收获，不仅仅在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开设了语言专业，而且对过去的汉语教学上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改进方向也有一些初步的认识。现在我们仅就如何加强调查研究，结合实际，进行汉语的教学与科学研究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这些意见是根据我们学校的情况提出的，很不成熟，希望各兄弟学校的同志们能给予批评指正。

这里有两个问题要先说明一下：1) 这里谈的是汉语课程的教学改革问题，这个课程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方言学(目前根据实际情况暂改为“方言调查”)、汉语史以及文字学、音韵学，等等。对于其他一些理论课程，如语言学概论、一般语言学(即普通语言学)和语言学史等，除了联系比较密切的语言学概论外，这里暂时都不讨论。2) 去年秋季以来，南京大学中文系在原有的基础上分设了语言、文学和新闻三个专业。在这三个专业里面，除了新闻专业外，语言和文学两个专业都有共同的汉语课程，但由于两个专业培养的目标不同，所以我们认为在讨论具体的教学问题时，应该把它们区别开来。

南京大学中文系过去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同前几期《中国语文》所报导的各院校的情况大致相同，这里不再赘述。

关于如何改革教学与科学研究，我们一致认为应该着手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改变过去的那种重外轻中的错误观点。所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原则，从我国实际(主要是汉语实际)出发，继承和发挥我国过去优秀的语言学传统，并吸取和学习外国语言学(特别是苏联的语言学)的先进经验和成就而建立起来的语言学。

根据这一基本观点，我们今后要着手做好下列几方面的工作：

1) 在各门课程中彻底贯彻从汉语实际出发的方针，打破过去的旧框框、旧体系。例如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词汇学等课程，应该彻底改变过去重外轻中，照抄的情况。目前我们正在进行“语言学概论”及其他课

程的教学改革，希望不久以后能编出一套真正从汉语实际出发的教材。

2) 必须对我国过去的语言学的传统和成就进行总结，批判地接受过去的传统。这方面，我们打算抽出一定的力量来进行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对我国语言学的各部门及各种问题做一总结工作，并适当地同外国语言学进行比较。目前，我们打算从解放十年来的中国语言学研究成就做起。教研组计划在1959年国庆以前编写一部《解放十年来的中国语言学》，内容包括对十年来中国语言学的成就、缺点以及存在问题的评价，并附十年来发表的语言学著作、论文的目录索引。今后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在教学中尽可能地向同学介绍有关这一方面的知识，例如在语言学概论中讲到语言学的各部门时，必须介绍我国过去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和成就，以促使他们对本国语言学传统的重视。

3) 加强对我国当前语言政策中实际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象汉字改革、汉语规范化以及推广普通话等问题的研究，不仅对于促进社会主义事业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实践意义，而且对于语言学各种有关问题的理论研究，也同样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这一方面，我们今后准备进行一些工作，例如江苏省委已决定在1959年5月在全省推广普通话，我们除了配合进行方言调查，编写学习普通话小册子之外，还准备在适当的时间组织教师和语言专业的同学到各县各乡参加实际工作，并且在工作中进行方言调查和一些有关问题的研究。

4) 应该使当前国内外的语言学问题的讨论与斗争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有显著而及时的反映。这在教学上应该打破过去旧的体系，及时地加进新的东西。譬如我们认为“语言学概论”这门课程就应该解决如下的几个问题：a) 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b) 研究些什么？c) 在这问题上有那些意见分歧或斗争？d) 还存在着什么问题？除了每门课程中及时反映这些问题之外，我们还准备就一些目前讨论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例如当前国际上的结构主义讨论，教研组也准备抽出一定的力量，在过去开过的“索绪尔一般语言学”这门课程的基础上做些研究工作。

其次，我们认为要改变过去的情况，还必须密切联系学生实际情况进行教学工作。只有从学生的水平出

發，才能使教學達到一定的效果。要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我們認為需要注意下列幾個方面：

1) 在講授有關漢語的系統知識的同時，必須從同學的水平出發，注意培養同學的實際工作能力，改變過去只顧科學體系而忽視同學水平和需要的情況。今後我們在一些具體的課程中，例如現代漢語、方言調查等，將密切注意培養同學的發音、聽音、記音以及寫作、分析的能力，增加一些實際訓練的時間。

在這方面，我們認為對不同的對象應有不同的措施。例如現代漢語語法這一課程，對於文學專業的同學來說，應該偏重於解決同學寫作中的語法修辭問題，而對於語言專業的同學，則應更進一步使他們掌握漢語的語法體系，培養他們對語法現象的觀察能力，為將來進一步研究打好基礎。

2) 應該更多地結合同學的實際情況進行教學和

科學研究，例如現代漢語語法，應該對同學寫作中的一些病句進行分析。我們教研組目前正配合系里的“作品選讀和寫作實習教研組”進行這方面的工作，並就這方面的問題做些研究工作。

一年來一系列的運動，特別是最近開展的教學改革運動，使我們深深体会到：要徹底地改革過去教學中的錯誤傾向，使漢語教學達到一定水平，在上方還必須發動全體同學積極行動起來，改變過去那只管傳授知識，把學生看成是單純接受知識的人的教學方法，用大鳴大放、大爭大辯的方法進行教學和科學研究。經驗證明，科學的發展只靠幾個專家學者是行不通的，必須大膽放手發動群眾，才能得到應有的效果。我們目前正在發動同學以三結合的方式編寫各門課的教學大綱和教材。相信不久以後，一定會得到良好效果。

(黃景欣整理，1958年12月)

湖南師範學院語言教研組的教學改革和科學研究

經過1958年的教育革命，湖南師範學院語言教研組在教學和科學研究方面都躍進了一大步。

在教學方面堅持貫徹了為政治服務和聯繫實際的原則。根據新編的教學大綱，把語言學概論、古漢語和現代漢語合而為一，編寫出了新的講義。在新講義的緒論、語音部分緊密結合漢字改革和推廣普通話的政策，批判了派分子攻訐文字改革的謬論；語音教學注重口耳練習。語法教學中避免繁瑣、重複，注意結合學生寫作實際。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實際方法和經驗不多，還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1) 語法如何為寫作服務，語音如何為推廣普通話服務。現在學生學了語法，覺得對寫作幫助不大，學了語音，還不能很好掌握拼音方案，不能說好普通話；2) 教學中對聯繫實際的理解有些片面，有忽視必要的、基本的理論的傾向，如在語音中一些普通的音變規律(如化、異化)也沒講；3) 講義中沒有安排系統的練習，臨時布置的練習不夠系統，收效不大；4) 教學實踐中如何為政治服務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

科學研究方面，在黨總支領導下，師生合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58年國慶節前完成了湖南方言普查工作(共95點)，各點都寫出比較詳細的方言調查報告。1959年元旦前寫出了：“楊樹達《高等國文法》批判”和“學習毛主席著作中古語詞的運用”兩篇論文。前者批判了楊樹達在語言研究中的唯心主義觀點和形而上學的方法，並指出了該書中一些較大的錯誤；後者對毛主席創造性地運用有生命的古語詞，作了初步的探討；對“古為今用”的原則有了深一層的體會。我們体会到科學研究對提高教學質量，認清語言學中兩條道路的鬥爭，提高教師業務水平都有良好的作用。

今年，教學方面將根據1958年新編的教學大綱進行教學，並結合所取得的經驗，繼續鳴放，發現問題，隨時進行改革。語音教學小組在開學的头一個月將對一年級學生進行語音教學補課，並為本學期在全院教學語音知識和推廣普通話準備力量。科學研究工作，仍採取在黨總支領導下師生結合的方式進行。現在初步確定了下列幾個項目，作為今年國慶的獻禮。

1) 漢語講義的編寫。在已取得的經驗的基礎上，繼續鳴放，制定出新的教學大綱，在“七一”以前編寫出整部新的漢語講義。

2) 國慶以前完成湖南方言調查報告，編寫出各方言調查點的“普通話學習手冊”(基本上是一縣一冊)。

3) 毛主席著作的語言研究。(秦旭卿)

语文短评

评《由“可畏”到“可爱”》

楊万昌

1959年2月13日《光明日报》第2版的《新老团结共同推进地质科学》专栏里发表的题为《由“可畏”到“可爱”》的文章，就思想性来衡量，是无可疵议的。但由于遣词、造句和结构上的一些缺陷，给读者一种支离破碎、堆砌滞涩和枯燥无味的感觉，看不出一个自觉命笔的那种心情舒畅、意气风发、昂扬阔步的豪迈姿态，因而也就相应地削弱了它对读者的感染力量和教育作用。

现在，试从语文的角度，依文章的写作顺序，提出比较显著的几个缺点来谈谈。

这篇文章共分四段，约一千二百多字。头一句说：

我原本旧社会中的一个旱干苦生……

这句的毛病在于：1) 在“我原本”的后边少了个“是”字；2) “原、本”同义，这里没有并用的必要，用了反而累赘。再看下面两句：

正由于自信不强，对青年更也就难以推腹置信，青老关系处于若接若离之间。长期如此，我所负责的分析化学室也就陷于支离破碎之境。

这段话的毛病比较多。1) “推腹置信”不通，应该是“推心置腹”；2) 句子的组织结构别扭：“更也就……”应改为“也就更……”；把“长期如此”的“长期”二字移到上句“青老关系”的后边，把“如此”二字改为“因而”，就显得语义鲜明、生动、紧凑了。

第二段里的开头一句说：

经过反右斗争，明确了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批判了个人主义，坚定了自己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这个句子缺少主语中心词。是谁“明确了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呢？在“明确了”的前面应加上个“我”字，在“明确了”的后边加上“应该”两字。这就使“自己”这个人称代词前面有了着落；同时，也使整个句子的意义更为鲜明突出了。再看下面这段话：

双反运动期间，又有百余张大字报烈火烧我，震惊甚痛。也正在此时，我研究室的青年同志，热情熾烈，在春节之夜，不眠不休……把相当于一年工作量分析的工作，六天之间完成，使我深为感动。青年推动了我前进。

在这段话里，“震惊甚痛”显然是不通的；“也”改为“而”较好；“热情熾烈”的前面可加个“却”字；“春节之夜”前面的“在”字可删；把“分析”“工作”之间的“的”字移到“分析”的前面去；“六天之间”改为“在六天之内”。

这样，句子之间的关系就紧密了。至于“青年推动了我前进”这句话，孤伶伶地放在这里，给人一种无依无靠的感觉，如果把“青年”改为“他们的干劲”，“青年”前的句号改为逗号，句子的关系就接上了。再看下面：

我为了自救自拔，和青年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日日夜夜。……我曾经认为被石头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工作，感到轻松愉快了。

1) 把“日日夜夜”作为修饰语移到“和青年生活在一起”前面，既符合语言习惯，免得生硬孤独，又为别的句子充实了血肉；2) “我……认为……工作感到轻松愉快了”句子不通。改成：“……我曾经认为象石头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工作，现在做起来也轻松愉快了。”

第三段里“变为青年之一员”也应当在“青年”后边加上个“中”字才通顺些。

尽管总结性的文章不能象诗歌小说一样地夸张渲染，但“文从字顺”和“生动鲜明”还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写作时要正确对待用字

安汝馨

语文刊物上虽然经常对一些书报杂志的文理不通现象进行过批评，但这种不通的现象，特别是用字上的毛病，还是经常出现。下面举的一些例子，只谈用字上的毛病，语法上的问题暂不谈它。

应当说，有些写文章的人，甚至一些较有成就的作家，对用字是不重视的。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出现错别字。《红旗谱》是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但我们在这本小说里却找到不少这方面的例子。请看：

1) 人家上排户商量定了，要砸罐卖铜顶赋税。（《红旗谱》，2页）

2) 上排户哪里出过公款银子？回回都是下排户包着。（同上，22页）

“上排户”和“上牌户”是一个词，但在用字上却前后不同。且先不去管用哪个“pái”合适，前后总该一致吧！

类似上述情况的，我们还可以从张雷的《山河志》、杨茂林的《新生社》里看到：

3) 我去找侯二合谈一下……（《山河志》，44页7行）

4) 你去找寿臣叔，跟他和谈一下。（同上，44页11行）

尤其不应该的是，这种不一致是在只有三行之隔的情况下出现的，这就更可表明作者用字的粗心了。

5) 连根娘果然在晚饭前又把名字勾了。（《新生社》，31页9行）

6) 入呀,不入呀,在我那个名單上拘了写上,写上拘了也不在一两次啦。(同上,31頁14行)

“勾”和“拘”是同样的意思,不該用两种写法。这种不一致也出現在同一頁上,作者对用字的态度可見一斑了。下面再举一些例子,并提出改正意見。

7) 运动过去,人們一口同声:“共产党不是說空話,是办真事的。”(紅旗譜,196頁)

8) 他只說些革命的道理,不說出他們根抵兒在什么地方。(同上,226頁)

例7的“一”应改为“异”。例8是“根底兒”,而不是“根抵兒”,因为这个“底”才含有“基础”的意思。

9) …回到家去, 趨在炕上,忽拉着良心想想吧!(同上,271頁)

10) 一个个都有那种見了亲人就委曲的感觉。(山河志,121頁)

例9的“趨”应改为“躺”。例10的“委曲”的“曲”应该写“屈”。

11) 兒媳妇不还言,就認定是新媳妇按心给她窩囊气。(張雷:王家的祖傳)

“按”音“àn”,沒有“存心”的意思,应改为“安”。

12) 你先同你爹把牛根按置好…(辽宁文艺,1956年1月号,55頁)

13) 在鉄屑可能飞达的範圍內,按装防御屏。(大众医学,1959年1月号,32頁)

“按置”“按装”都应分別改为“安置”“安装”。因为“安”才有“装置”的意思。

14) …对面毀了它,万一犯了事还有个憑具。(山河志,45頁)

“具”沒有“憑証”的意思,应改为“据”,即“憑据”。

15) 那一天,竟会成为介决思想矛盾、鼓起我创作热情的永远难忘的一天…(上影画报,1959年第1期,21頁)

“解”尚未簡化为“介”,应该还用“解”字。(按:怎样对待簡化汉字問題,我們推荐讀者最好看一看《光明日报》1959年3月1日三版讀者来信栏內溫港所写的《必須正确地使用汉字》一文——編者。)

《中国語文》二月号一篇 文章中的語言毛病

宋玉柱

《中国語文》1959年2月号上發表了王德春同志写的《認真学习毛主席的語言理論》一篇論文。我認为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它把毛主席有关語言問題的指示做了系統的整理,并作了必要的闡述和研究,对我們学习毛主席的語言理論有着一定帮助。当我們今天对毛主席的有关語言的指示尚未进行充分研究的时候,这篇文章的出現就更有它的指导意义。

我对这篇文章所要提出的意見是关于它的語言問

題。王德春同志在那篇文章中說:“毛主席还屢次指示我們要保持語言的純潔和健康,他很不滿意那些講究語法修辭、不注意用詞造句和篇章結構的作風。这話說得很对。然而遺憾的是,在王德春同志这篇文章中,却恰恰多少存在这种毛病。且讓我們举例說

在上述文章的一开头,王德春同志写道:

很少人說毛主席是一个語言学家;但是,他不仅在語言的實踐方面是一位使用語言的巨匠,是现代汉語的作家,就是在語言的理論方面,在許多有关語言問題的重要言論和指示方面,对語言科学和語言实践也都有巨大的指导意义。(67頁)

讀完了这长达九十来个字的句子(比毛主席指的“句法有長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还要長一倍)后,我們按着句子結構来分析一下,不禁要問“誰有巨大的指导意义”?从句法結構中我們只能找到主席“他”,即毛主席。“毛主席…有巨大的指导意义”,这成話。从上下文中,我們体会出作者的原意是說:主席的“許多有关語言問題的重要言論和指示”“語言科学和語言实践[也都]有巨大的指导意义”。由于作者多用了个“在…方面”就破坏了句子的原意。可長句子是容易使人迷糊的。还是讓我們听毛主席的指示少写些“長到四五十个字”(甚至更多)的句子吧!

下面这句话的毛病就更多一些:

濫借外語的結果,不仅不能丰富祖国語言,不能实现它的实际职能,而且会引起語言的混乱,妨碍交际。正这样,毛主席又說:“我們不是硬搬或濫用外国語言。”(71頁)

首先,“結果”这个詞兒是沒必要用的,应刪去。其次,“完善”是形容詞,不能用做使動詞。誠然,現在有些形容詞已經發展成使動詞,如“丰富”“端正”等;“完善”却还没有發生这种变化。这句话最大的毛病在具有連接作用的“正是这样”的运用上面。作者在述了濫用外語的严重后果以后,紧接着是要轉述主席的正面指示。这里应该用的是“正因为如此,所以主席又說…”,而不应该是“正是这样”。

毛主席反对生造的詞語,而王德春同志的下面这句话中就存在这种现象:

象这样合理而适当的应用古語成分,无疑地会使語言这个武器变得更鋒銳更有力。(71頁)

我們平常只說“鋒利”和“銳利”,而沒有說“鋒銳”的。这恐怕就是生造的形容詞之类。

在篇章結構上,我認为这篇文章也存在缺点:标题是“認真学习毛主席的語言理論”,但文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談毛主席的語言艺术。我認为这是在結構上存在的不严谨的毛病。

(按,这里所举的第一个毛病和标题与内容不相称的毛病,是編輯部加工时的疏忽所致。第二、三两个毛病虽然是稿有的,但是編輯部也沒有尽到修正的責任。——編者)

对張滌华《現代汉语》一書的意見

編者按：張滌华先生編著的《現代汉语》(上册)，原是安徽师范学院語文函授專修科的講義，1958年6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最近我們收到几篇对本書提出批評的文章，有的是就書中所反映的資產階級学术观点加以批評的，有的是就个别問題进行商榷的。現在节要發表于下，以便于閱讀这本講義的人参考。

張滌华先生在《現代汉语》上册緒論中講到“什么是汉语”时說，汉语“对其他民族語言的影响最大。汉文化的悠久，在历史上曾經跟許許多多的外族發生过交涉，因此汉语的影响很早就遍及于全世界。…不过，这种情况还不算很特殊，特殊的是汉语在东亚的历史地位。汉语在过去簡直是亞洲的共同語，許多邻邦都受到它的影响，…在現在朝鮮語的詞汇中，汉语的借詞仍在一半以上。…越南的人名、地名都用汉语，新名詞也都在汉语的基础上創造出来。这些事实足以說明汉语在东亚的历史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它一直处在領導的地位”(9—10頁)。(着重点是引者加的，下同)

汉语是汉族人民的民族語言，也是世界上最發達最重要的語言之一；但是，这跟上面的說法是完全不同的。誰都知道，馬克思列宁主义一向主張实行种族平等、民族平等和語言平等的民族政策；可是張滌华先生在这里却不自觉地違反了民族平等、語言平等的馬列主义民族政策。尽管張先生在書中也曾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規定：汉族跟其他少数民族，地位是完全平等的，語言也是完全平等的”(6頁)；但是，在一些具体問題上，張先生却忽略了語言平等的原則。因为既然認為“汉语过去簡直是亞洲的共同語”，“汉语在东亚一直处在領導的地位”，那么必然会使人覺得有一些語言一直处在被領導的地位。把世界諸語言說成有处在領導地位的語言和被領導地位的語言，这是資產階級学者的說法，事实上資產階級学者一直都在宣傳着这种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語言优越論”。

其实，这样的說法不是偶然出現的，本書其他地方也有。比如在談到使用汉语的人数最多时，作者說：“…又据調查，英語使用人数約一亿七千万以上，俄語約一亿三千万以上，德語約九千万，西班牙語約六千五百万，法語約四千五百万。这几种較有势力的語言，比起汉语来都差得很远”(6頁)。這話就使人覺得汉语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語言”了。把世界上的語言分成有势力的語言和沒有势力的語言，这不是等于宣傳世

界上某些語言比另一些語言来得优越嗎？我們認為，世界上存在着使用人数較多和通行地区較广的語言，这是事实，承認这事实并不違反語言平等的原則；但是作者在这里把世界上某些語言認為是有势力的，却違反了語言平等的原則。

再如，作者認為“汉语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最發達的語言之一，主要的就由于汉语本身具有很多的优点，比如：就語音說，声調鏗鏘，且有多种变化，富于音乐美；就語义說，詞汇丰富，构詞灵活；就語法說，条理簡明，組織机动；就記錄語言的文字說，也有整齐簡煉的好处。除了这些之外，汉语还富于形象性和邏輯力量”(8—9頁)。必須說明，热爱祖國的語言，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为祖國語言的純潔健康而斗争，是我們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但是这里未免过分夸張汉语的优点，例如把“整齐簡煉”看成我們文字的優點，这样的提法是很成問題的。“富于形象性和邏輯力量”，难道是汉语特有的嗎？

我們認為这决不單純是指辭的問題，而是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問題。这种思想就是屬於資產階級範疇的大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實質是不尊重世界上其他民族的語言，不尊重國內各兄弟民族的語言，这是必須徹底批判的。

現在再就本書所講“什么是現代汉语”的問題，談談我們的看法。作者說：“現代汉语是…全民性的民族共同語。这种民族共同語，为簡便起見，也可以就叫‘普通話’。”又說，“…它是汉族的民族共同語，不包括各地的方言…”(27頁)。把現代汉语說成“是全民性的民族共同語”，我們認為是不妥當的。因为“現代汉语”跟“汉民族共同語”并不是同義詞。在現代汉语中，汉民族共同語(普通話)是最高形式，汉语的方言是服从于民族共同語的低級形式。現代汉语不但包括全民性的民族共同語，而且也包括为全民族內一定部分人民群众服务的汉语諸方言。目前，普通話虽然在迅速推广中，可是方言区的人仍然可以用当地的方言来交流思想，我們能說方言区人們說的不是“現代汉语”嗎？

所以說“現代汉语不包括方言”是不够妥當的。事

實上本書也講到了方言，可見這個說法是有矛盾的。

《現代漢語》(上冊)除了上述的原則性的錯誤提法以外，還有一些可商榷的地方和個別的引文錯誤，這裡就不多說了。(楊長弘)

二

張滌華先生編著的《現代漢語》(上冊，只包括緒論、語法部分)，因為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有推薦作課本的意思，所以有必要在這裡就書中的缺點，提出我們的意見。

本書緒論中既然說“現代漢語……不包括各地的方言”，可是又說，“就一種民族語言說，它往往包括多種方言，方言與方言之間，語音和詞匯的差異可以很大，但語法的差異微乎其微”(48頁)。“所以，漢語雖然包括了很方的方言，但這些方言仍屬於同一民族語言，而不是許多種不同的民族語言”(49頁)。在講到現代漢語構詞法時，也講到江南話、廣東話、現代吳語、皖中方言。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現代漢語是包括各地方言的。

所以前面說“現代漢語不包括各地方言”的提法，在作者的實踐中就證明是有矛盾的。

緒論中還說：“斯大林教導說，正因為語言是‘社會現象’，所以它不可能是階級的……”(5頁)。

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我們是找不到這樣的“教導”的。張先生對斯大林的話可能有所誤解。我們知道，語言是“社會現象”，這只是就它“替社會服務”這一點說的。必須闡明語言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才能得出“語言沒有階級性”的結論。如果根據作者的說法，我們能夠類推地說，正因為哲學是“社會現象”，所以它不可能是階級的嗎？

關於“詞嵌”的問題，本書前後說法也有矛盾。前面說，“一般認為是詞嵌的有四種(按：指‘得、不、里、哩、啊、呀、一’之類)比較常見”，後面又說，“把‘得’、‘不’和‘一’認作詞嵌，許多人都不同意”(82頁)。既是“許多人都不同意”，怎麼能“一般認為”呢？又如先說“里”……之類“能不能算做詞嵌也有問題”，但在後面卻把“里”當作詞嵌。

關於“獨立成分”和“獨詞句”的界限問題，作者既然指出《漢語教學參考書》第三冊和第四冊對這一問題的看法還有矛盾(232頁腳注)，可是在本書里也沒有加以解決；同樣的語言成分，在講獨立成分時就是獨立成分，在講獨詞句時就是獨詞句。儘管作者也劃定一個標準，可是並未能概括所舉的例子。

在講到“兼語式”和“主謂結構作賓語”的時候，作者舉了“願您作一個優秀的人民教師”、“我希望他能辦這件事”這兩句作為例子，前者是“兼語式”，後者是“主

謂結構作賓語”(243頁)。但是，這兩個句子，不論結構關係或意念關係來說，都不能作為兩種句型處理，因為它們之間的不同點只是在於“願”和“你”的結合較緊和“希望”和“他”的結合稍微鬆點。“願”和“你”的結合所以較緊，乃是因為它們都是單音詞，在說話的時候就容易成雙捉對。同時，“願”在這個地方就是“希望”的同義詞，如果把它改成“希望”(我認為完全可以)，那麼這兩個句子的所謂區別也就不存在了。由可見，“願你作一個優秀的人民教師”不是“兼語式”句型而是“主謂結構作賓語”的句型。

作者強調漢語的“優點”時說，“就記錄語言的文字來說，也有整齊簡煉的好處”(9頁)。這句話，除了對漢字優點而違背了漢字改革的方針以外，還有把“文字”同“語言”混為一談的毛病。文字本身並沒有什麼簡煉和不簡煉，因為它只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我們通常說的“文字簡煉”，這“文字”已近於“書面語言”的同義詞了；而作者明明指的是“記錄語言的文字”，同漢語本身的“優點”有什麼關係呢？

以上不過是我們所看到的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另外，我們最不能同意的是作者對漢語的優越性的說法。作者說漢語“本身的優點最多”，“過去簡直是亞洲的共同語”，在東亞“它一直處在領導的地位”(8—11頁)。大家知道，我們只能說“漢語是世界上最發達的語言之一”，說漢語有漢語的優點是對的，可是不能說“優點最多”，這也就難怪作者認為漢語還能“處在領導的地位”了。

最後還值得指出的是，本書所引材料中有些是風中有政治問題的人的文章，作者編寫這部書的時候可能這些人的反動面目還未公開暴露，這不能厚責作者；但是這部書出版的時候，這些人的反動面目已暴露了，作者應該及時通知出版社，把有關這些人的“理論”和對他們贊許的話從中刪掉。拿本書作為課本來說，作者沒有這樣做，應該是一個遺憾。在這裡，也反映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在审稿工作中存在一些粗枝大葉的作風。

我是一個初學語言學的人，對語言學方面的問題懂得很少，因此上面這些不成熟的意見當中，可能有很多錯誤。我殷切地期待着專家們(特別是我的老師張滌華先生)和同志們的批評和指正。(胡振榮)

三

我讀了《現代漢語》函授講義之後，受益很多，覺得張滌華先生對漢語某些問題的闡述非常清楚，在某些認識頗不一致的問題上，張先生的看法也很有見地。這樣的書，對學習語文的人應該說是有幫助的。但是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感到有一些語法方面的問題需

要提出來同作者商榷。

本書在語法部分談完了“語法的特点”之後，提出了“語法構造的重要”一節，用兩個理由來說明“語法構造實在比基本詞匯還重要些”(46頁)的道理。我們認為這兩個理由都不能為作者說明這個道理。張先生以為“語法構造比基本詞匯更能表現語言的特質，更能顯示語言作為工具和武器的效用。”其理由是“語法的重要，就在於它能夠把一個個只能表示獨立的、簡單的概念的詞有條理地組合起來，使之更進一步能夠表示完整的、複雜的思想。語法的重要，就在於它能賦予詞匯以條理、以規律……”，“倘若沒有語法構造，那末語言只有一堆堆零碎的材料，它的效用就要受到極大的局限，它就不能成為工具和武器……”(46—47頁)。的確，語法對於語言是重要的；但是，作者這樣強調語法的重要性，就難免使人認為作為語言的基礎、語言特點本質之一的基本詞匯是次要的了。

其實，我們不僅沒有理由，而且也沒有必要來強調這一要素對於語言一定比哪一要素重要，因為“語言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匯是語言的基礎，是語言特點的本質”。這兩個要素，對於語言哪個也不能缺少，缺少語法不成其為語言，缺少詞匯同樣也不成其為語言。至於第二個理由，作者以為“語法構造比語言的詞匯更能成為民族語言的特徵”，其理由是，“就一種民族語言說，它往往包括多種方言，方言與方言之間，語音和詞匯的差別可以很大，但語法的差別則微乎其微”(48頁)。我們認為，同一種語言的方言和方言之間，語音和詞匯的差別一般要比語法方面的差別大是事實，但是，它不能說明作者所要說明的“語法對於語言比詞匯重要”的問題。方言是一個語言發展分化的結果，方言之間，語音和詞匯之間所以差別較大，乃是由這語言兩個構成要素的本質特點所決定的。因為語言的詞匯對於社會的發展變化是最敏感的，所以我們決不能用方言之間的詞匯的差別比語法的大來說明“詞匯對於語言沒有語法重要”的道理。其實，同一語言的諸方言之間，語音和詞匯要比語法方面的差別大只是語言發展的一般

現象，但也有相反的現象，即同一語言的諸方言之間，詞匯、語法的差別都相當大，如德語諸方言和意大利語諸方言就是。所以，各民族語言中方言之間的特徵內容是不盡相同的。我們決不能僅依據某一民族語諸方言間，某一語言要素差別的大小來肯定或否定它對於語言的重要。

本書在講到“的”字結構跟名詞一樣，用做謂語時一般也要用判斷詞“是”(219頁)時，曾舉“武隊長你是知道我的”(楊朔)為例，不知道究竟是作者擴大“的”字結構的範圍還是舉例疏忽。我們認為，這句話不是“的”字結構作謂語加“是”的句子。句中的“你”是主語，“知道”是謂語，“知道”的賓語是“我”。至於“是”則是加在謂語“知道”前面表示強調的，“的”是語氣助詞，“是……的”是用作強調動詞謂語“知道”的。

本書某些話有含混不清的地方，也許是作者對某些問題的理解，別有見地“不便曲從”的緣故。比如在“詞的類型”一節中說：“如果拿詞所包括的成分有沒有意義來做標準，那末，我們也可以把詞分成以下兩類：甲、單純詞……乙、合成詞……”(65頁)(着重號引者加)。這段話可能是表達上的毛病，但它很可能引起讀者對詞的構成成分不正確的理解。這裡作者可能是把注意力過多地轉到“字”的方面去了。如果按照“詞的構成成分有沒有意義”來分類，只能分為下列兩類：有的詞是由一個方塊形體作一個詞素，構成一個詞。如“人”“馬”等；有的詞是由兩個或幾個方塊形體(如翻譯的外來詞)作一個詞素，構成一個詞。

最後，我們覺得本書對於黎錦熙先生的“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句本位”的分析法還有戀戀不舍之情。雖然，處處說為了便於教，便於學，採用新語法體系，但是作者卻將黎先生的《新著國語文法》“句本位”的分析法大加宣揚、贊賞。我們覺得，凡是讀過張先生的《現代漢語》函授講義的人可能都會產生這樣的疑問：張先生這樣極力贊揚“句本位”的分析法，是不是在否定新語法的“詞法句法並重”的新語法體系呢？是不是同自己編的講義有矛盾呢？(李子云)

(上接 113 頁)

9) 光明日報編者：很多化學工作者和教師來稿來信討論化學名詞的整理和改革(1958, 12, 25)；北京部分化學家對於化學名詞整理和改革的意見(12, 27)；關於化學名詞問題的討論(12, 27)。

10) 倪海曙：科學應該用什麼文字寫(新文字周刊, 27期)。

11) 鍾兆璣：統一譯名和拉丁化(翻譯通報, 2卷6期)；再談關於專門名詞的統一(新文字周刊, 42期)。

12) 沈志遠：關於名詞統一工作(翻譯通報, 1卷3期)。

13) 肖業倫：科學名詞必須適當吸收外來語(文字改革, 1958, 5, 15)。

14) 丁濂：拼寫醫學名詞的幾個問題(同)。

15) 化學物質命名擴大座談會紀要(化學通報, 1955, 12月)。

16) 科學名詞審訂工作的情况(科學通報, 1953, 2月)。

17) 許宜蔚：公制度量衡名稱的漢語化(拼音, 9期)。

18) 傅懋勳：關於少數民族語言中新詞術語的問題(中國語文, 1957, 10)。

評介《人文杂志》批判傅子东的文章

李千英

我們讀了《中國語文》(1956年9月号至12月号)連載的傅子东先生的《詞类的区分和辨認》以后,当时就有意見,但是由于水平所限,未能及时提出批評。最近我們偶然翻閱西安师范学院的《人文杂志》(1958年第5、6期),發現其中有六篇文章对傅子东的学术思想、治学态度和作風等方面进行了批判。在批判资产阶級学术思想的今天,我們認為把它介紹到《中國語文》杂志上来,是完全有必要的。

在《傅子东先生的“語法体系”剖析》一文中,作者着重批判了傅子东的所謂語法体系,尤其是它的核心——“位次論”。作者指出,“位次論”并不是什么独創的和新穎的东西,它一方面是“按照西洋語言的‘格’杂七杂八、东拼西凑編織成的”;而另一方面是,在《馬氏文通》和《新著國語文法》中,把“这个过了时的东西檢了过来,东拼西凑地修补一下…以它为中心編造成了自己的‘語法体系’”。作者并指出,在实际应用上,“位次論”形同虛設,远不如用主謂語等术语来得直接、簡單、明了。

作者接着指出,詞的性質与詞的功用是辯証統一的关系,詞的性質是从詞的功用中表現出来的,两者相互依存。可是傅子东不了解这些,他把詞的性質和詞的功用割裂开来,認為詞性和它的功用不一致。作者認為,名詞执行与形容詞相同的职务,也是一种正常現象,而傅子东之所以持相反的看法,是因为他无视汉语实际,硬套西洋語法的結果。

作者同时指出,傅子东“語法体系”的另一支柱是有关“施受关系”的理論。作者認為,称“主詞即动作的主体”、“述詞即主詞执行的动作”,不但是以偏概全,不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而且会导致以意义分析去代替語法分析,得出“动作必有动作者,动作者必有动作的句子規格”来。这样,也就难怪他会把“果子發亮了”分析成“亮从果子上發出”了。

《批判傅子东在語法理論研究上的资产阶級学术观点》一文,对傅子东在《語法理論》中所強調的“汉语和印欧語的共性是主要的,特点是次要的”这个荒謬的說法,着重地作了批判。文章指出:傅子东之所以不顧客观事实,硬說两种語言在語法結構上有“本質的共性”,用意很明显,这完全是为自己任意篡改汉语語法創造前提的。傅子东为了建立所謂傅氏的語法理論,当自己的理論和汉语实际發生矛盾时,也不願按照

汉语实际来修改或补充,反而在印欧語系中找根拠加在汉语上。这种不是来自汉语实际的“理論”,是不能为汉语服务的。文章在批判傅子东所認為的“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沒有区别,或基本相同的主張”时指出:这是傅子东以“重視語法历史的繼承性”为名,企圖达到用古汉语来改造现代汉语的目的,使已死語言借尸还魂。傅先生曾列举了好些现代汉语,牽强会地說是和某些古汉语是同句型的。文章指出:象这种追本溯源的方法,实質就是否認汉语的發展,是反历史观点的。由此可見,傅子东的語法理論是怎样的“理論”,如果用他这样的理論来指导实践,只有造成語法上的混乱,破坏祖国語言的純潔和健康。文章还指出《語法理論》中反映出来的主观唯心主义,还体现在傅子东光从邏輯意义出發来分析现代汉语,忽视了句子的結構,也就是忽视了分析句子的物質基础,这样,必然会陷入主观主义的泥坑里。

在《批判傅子东在語法理論研究上的反馬克思主义观点》一文里,指出傅子东片面地夸大加工語言的功用(他的所謂加工語言,并不是指现代典范著作中的語言),輕視人民群众的口語。傅子东曾說:“把口語放在第一位,加工語言擺在第二位,是朝后看,不朝前看的”(《語法理論》67頁)。文章指出:这是完全同毛主席教导背道而馳的,毛主席告訴过我們:“要向人民群众學習語言。人民群众語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潑的,表現实际生活的”(《毛澤东选集》卷三,838頁)。而傅子东却把人民群众的口語認為是落后的、粗俗的、不規範的、邏輯性不强的語言,这种徹头徹尾的反历史主义观点,就很明显看出傅子东的語法理論是为誰服务的。文章接着—針見血地指出:傅子东研究語法理論的目的并非为人民服务,而只是为追求名利,因此,在西北工作,就視西北为建立自己的語法体系的根据地;在課堂教学,目的是企圖通过教学工作来証驗他的主观臆測的“理論”,从而推广这“理論”。

在另外几篇批判文章里,还指出傅子东的恶劣作風,說傅子东为了實現他的“理想”是不擇手段的,他要組織“語法統一战线”,并宣称“他对黎錦熙的政策是‘求同存异’,王力是他的主要对象,他要联黎攻王”。还說“我目前不攻击黎錦熙,只要和黎一起打倒王力,吕叔湘,然后再向黎錦熙开火”。他搞語法,并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不朽”,为了“留名千古”,为了追求“一

万元稿费”。可見在傅子东的头脑里，隐藏着多么丑恶的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腐朽的卑鄙思想。

在这几篇文章里，还指出傅子东在学术研究上的狂妄无知。比如为要达到建立自己的“语法体系”的目的，就不惜篡改鲁迅、赵树理等人的作品；侈谈什么“句子标志”；把不符合“理论”的语言事实，一概目之为“省略”；自视为当代的语法权威学者，要建立所谓傅氏语法体系，要与《马氏文通》并列，要超越于《经传释词》之上；吹嘘自己在古汉语方面的成就，认为在一切“经生”和当代语法学家之上。

从上面事实，傅子东的立场、观点、研究方法是怎样的，就已经可以有个初步的了解了。

这一点在《傅子东先生究竟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方法来对待汉语》一文中，就更具体地被揭露出来。文章指出：傅子东在《语法理论》自序中，吹嘘自己是个唯物主义者，说自己从1931年开始，不仅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根对立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叶斯柏森的语言学理论有所批判。在1946年写的《傅氏文典绪论》和1949年写的《傅氏白话文法绪论》里，标榜自己对叶氏的唯心主义的语法理论曾加以攻击，从而建立所谓“位次论”。文章揭露了傅子东在解放前所持的“国文或国语比拉丁语系文字组织上实在有重

大的缺点”等等的论调，妄图改造汉语，建立什么新汉语语法。从这些论调中可以看出傅子东解放前是个“崇拜外国的民族虚无主义者”。文章接着指出：傅子东解放后摇身一变，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来攻击唯心主义者，实质上却仍然在偷偷地贩运叶氏的唯心主义观点。比如在他攻击王力先生的汉语没有形态的说法时，是以叶氏的“词序是一种形态”的“客观存在”为根据的。文章还提到傅子东怎样玩弄马列主义词句，怎样地以无赖手段糟蹋辩证法，企图达到个人目的。

我们所以要摘要介绍《人文杂志》这几篇批判傅子东的文章，就是因为语言学界展开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的现阶段，傅子东的例子是最突出的，同时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不过，我们看了这几篇文章以后，觉得对傅子东恶劣的学术作风方面还有进一步揭露和批判的必要，这一点也是上述的几篇文章说得不够的地方。另外，这些文章中还有一些小缺点，例如对“位次论”的批判，就嫌过于简单了一些，理论上的阐明，还不够全面和深刻。关于词的性质和词的功用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还有些措辞不够恰当的地方，例如在批判傅子东的“省略法”时，作者说，“但这并没有使我们的黎先生难为情”。我们认为这样的话在批判傅子东的场合中没有必要提出来。

《有关语言学的几个问题》简介

根据中苏两国科学院1958年合作协定，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谢列勃连尼柯夫(Б. А.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博士最近来华讲学，讲论了苏联语言学的发展道路和语言学理论中某些主要问题。院士留华期间，除在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广州各地讲学外，还同我国语言学工作者讨论了语言学上的许多问题。《有关语言学的几个问题》是院士在我国所作四个学术报告的译稿。

谢列勃连尼柯夫院士是苏联知名的芬兰-乌格尔语专家，在普通语言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院士现任苏联科学院语言文学部副院士秘书，在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领导“语系与语族的历史比较研究室”中心问题的研究工作。

本书的四篇论文论述了当前语言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第一篇《苏维埃语言学的发展道路》，全面地介绍了苏联语言学的发展情况，着重指明十月革命以后三个语言学派(传统主义者，马尔主义者和语言学实践家)对苏联语言学的影响，以及1950年语言问题辩论以后苏联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科学的概况；并指出苏联语言科学的发展前景和作为今后研究方向的五个中心问题。第二篇《论语法结构的研究方法》分五部分：1)划分断代历史的问题，2)词类问题，3)语法范畴的概念，4)关于描写语言学的语法结构的几项原则，5)关于描写语法形式的意义和特点的几种方法。作者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论述了同汉语语法有关的重要问题。第三篇《关于类型学研究的一些方法和批判》，作者用历史比较语言的研究成果，指出了雅柯伯逊类型学的方法上的错误。第四篇《苏联各民族语言和方言的新材料》，是介绍苏联近年来在研究苏联各民族语言和方言上所获得的新成就的。

我们愿意介绍本书给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作为参考。(按本书是由科学出版社于1959年1月出版的)。(管燮初)

語法研究上要求加強協作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現代漢語小組

本小組計劃寫一部《現代漢語語法》，目前正在做準備工作。我們希望更清楚地了解什麼是現代漢語語法規範，使這部《現代漢語語法》能對實現漢語規範化起一些作用。這部書打算給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幹部、編輯、教師等閱讀，幫助他們正確認識和使用祖國語言。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所選用的研究資料一般都是普通話里能說的句子，是合乎現代北方話說話習慣的。我們根據這些資料研究現代漢語的語法規範。

當然，我們的工作是在前人積累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的。我們應當盡量採用他們的成果；同時，也還有許多結論需要加以補充、批判、統一，或是揚棄。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希望我們的工作多少能更深入一些，更具有建設性。單靠幾個人的力量，這樣的工作是不大會做好的。我們希望全國關心語法規範和多年從事語法研究的同志都來通力協作。

下面提出的一些研究問題，我們以為都還沒能很好地得到解決。希望同志們能從中選擇題目作進一步的研究，寫成專題論文。論文可以自行發表，也可以寄給我們，由我們選擇介紹給國內刊物發表。同志們的研究成果將來都會吸收到這部《現代漢語語法》中去。我們希望這部書是全國語文工作者集體勞動的產物，也希望大家在工作中互通消息，互相幫助。

我們研究語法的主要精神是遵守意義和形式相結合這個原則。拿動詞為例，一般從動詞里边分出兩個小類來，就是副動詞（介詞）和助動詞（能願動詞）。副動詞、助動詞和一般動詞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單憑意義往往講不清楚。把這兩個小類從動詞里分出來，只能是因為它們能夠造成與一般動詞結構不同的句法形式。這樣，我們研究語法就不是從邏輯範疇或詞匯意義出發，而是從句子的意義和形式相結合這個觀點出發。

意義和形式相結合，這是一個理論問題。也許有的同志看法和我們不完全一樣，我們也希望同志們在這上面多發表意見，展開討論。至于同志們自己研究某一個題目，也不一定要嚴格遵守我們所提出的原則。

從整個語法體系來說，所提的問題有的是局部性的，有的牽涉較廣。有的問題也許只是關聯到語法理論聯繫語言實際這方面，但是也不能說同語言實踐、語

言教學沒有關係。因為，假如理論問題沒弄清楚，語法教學上，學習普通話上，乃至教不說漢語的人學習漢語上，都會發生很多困難。研究這些理論問題，困難往往在於某兩個語法概念所包含的具體內容（語言現象）有彼此復迭之處，或是彼此脫離之處，以至好些具體句型和結構不知該怎麼說明。

這裡提出的幾十個問題，當然不可能包括盡語法研究里一切需要研究的問題，以後我們還可能提出一些新的問題來供同志們參考。特別是下面的題目——沒有把一些動詞和虛字的特殊用法的研究包括進去，待我們把手頭的資料詳細分析之後，再提出這方面的研究題目來。我們也特別歡迎正在學習語法的同志提意見，看看下面的問題是否迫切需要解決，還有什麼需要解決的問題這兒沒提出來。

一 關乎單句和複句的問題

1. 什麼是漢語的一個句子？

2. 分別單句和複句，主要關鍵在哪兒？一個句子須具備什麼條件才能叫做複句？“緊縮式”“連鎖式”複句有什麼分別？語調的詳細描寫能幫助解決這一問題麼？現代漢語的語調系統是怎樣的？

3. 複句的種類（“條件”、“讓步”、“因果”，等等）原來是單憑意義分的，或是憑某些個連詞分的，能進一步就句子的結構和語調把這問題解釋得更清楚一點麼？

二 關乎句子類型的問題

4. 北京話（或某種別的北方方言）的句子能憑語調分為多少種？

5. 語助詞的用法。每個語助詞（包括複句里邊句末了的語助詞）規定了哪些句子形式？

6. 否定句的格式。（總結了各家的意見，自己還有新意見麼？）

7. 問句的格式。（同6）

8. 比較句的格式（包括“……一樣”、“……似的”，等等）。

三 關乎動詞的用法的問題

（據我們看來，我們對印歐語系的語言的語法能

会到什么程度,采用到什么程度,一部分取决于我们对汉语动词的性质看法。

9. 动词和主语的关系是怎样的?(参《语法讲话》“主语”节,《中国语文》1953年1月号,16页;抽印本22页)。

10. 动词和宾语的关系是怎样的?(参《语法讲话》,《中国语文》1952年9月号,23页,抽印本6页;1953年1月号,18页,抽印本24页。)及物和不及物是否汉语的语法范畴?

以上9.10.又牵涉到给动词下定义的问题。

11. 主动和被动的分别是怎样在形式上表达的?

12. 动词和形容词(作谓语用的)的界限应该划在哪儿?

四 关于介词和连动式、兼语式的问题

13. 根据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原则来看,介词和一般动词的分别在哪儿? 凭介词结构(介词+名词性成分)能否单说的标准来判断,行得通么? 合理么? 该怎样分别介词和一般动词? 分出哪些介词来? 介词或副动词,哪个名称较为合理?

14. 介词和主要动词的关系大致可分两类。一是同连动式相类的,二是同兼语式相类的。它们和连动式、兼语式的界限怎么分?

15. 连动式的两个动词之间是否一定要有一个宾语性的成分? 没有宾语性成分的例子怎么处理?

16. 兼语式的两个动词之间是否一定要有一个宾语性的成分? 没有宾语性成分的例子怎么处理?

17. 兼语式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至少跟主谓宾、谓宾、谓宾(因而也跟双宾)分不清楚。例如:

我爱他老实。(是兼语结构么?)

我爱他老实(主谓作宾语?)

我爱他老实(双宾? 补语?)

一般是凭意义来分的,有的例子就有不同解释的可能。怎样才能结合着形式来分?

18. 怎样的动词能引起兼语? 怎样的动词一定引起兼语?

五 关于助动词(或能愿动词)的问题

19. 怎样凭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原则来说明助动词? 能愿动词和助动词,哪个名称比较合理?

20. 能愿动词的结构何以近乎形容词结构? 能愿动词和副词怎么分? 能愿动词所引起的谓语结构和一般谓语有什么分别?(变化更多还是更少?)

21. “愿意去”、“愿意他去”各自跟连动、兼语、谓宾形式作宾语、主谓作宾语、双宾有什么形式上的分别?

六 关于补语的问题,牵涉到“连锁句式”

(不包括动词或形容词后面直接连着的简单补语,或用“得”、“不”、“得不”引出的补语。)

22. 更详细地描写“名词性成分+停顿+补语”的格式。这样的格式和“同位”究竟有什么分别?(例:“他,大大咧咧的,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我,中国人,就该象一个中国人。”)

23. (主语)动词或形容词+停顿+(直接连着的)长串补语,这样的结构和复句,和“流水句”有什么分别?(例:“×××死了(咽了气了),——孤零零的,……”)

24. 这样的补语,往往弄不清是补动词(或形容词)的,还是补主语的(尽管承上文而说,主语并不出现)。这种现象如何处理?

25. “打一打”(“打打”),“打一下”,“打一回”之类是动补结构还是动宾结构? (“打一下锣鼓”是否双宾? 跟一般的双宾有无分别,例如在次序上?)

26. 双宾语的次序是怎样的?(参考自己的方言)能帮助解决第25题么?

27. “我喜欢他聪明”,“我买一个苹果他吃”,“我买一张桌子缺一条腿”,“我买一张桌子三条腿”,这一大类的结构如何分析? 一共有几个形式? 这里有补语没有?

28. 上题所举的例子是否“紧缩式”、“连锁式”? “紧缩式”、“连锁式”这样的名称和分析法在语法基本理论上引起什么问题?

七 关于时、地词作主语的问题,牵涉到“倒置式”

29. 时、地词在句子里可能处的地位有哪些? 时和地有什么分别? 如何肯定时、地词是主语?

30. “台上坐着主席团”,“前面来了一个和尚”这一类句子已经有许多人讨论过了,还有没有新的见解? 有没有新的方言资料、历史资料或是汉藏语系比较语言资料能帮助解决这问题?

31. 假如用“倒置式”(“倒句”)这概念来处理第30题所提到的一类现象,在语法基本理论上引起什么问题?

32. “倒句”和“主谓谓语句”这两个概念能并存不能?“倒句”这概念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使用?

八 关于词类的问题

33. 从“句本位”的观点(就是在句子里分词类,不用各“类”词来造句的观点)来看,词类该怎么分? 一共有多少大类,每大类分多少小类?

34. “我、你、这、那、每、各”六个詞可以分为几类?

35. 詞类的活用(象說“抽象名詞”之类)和轉变是憑什么决定的? 如何跟主謂形式作主語、謂語形式作主語、主謂形式作宾語、謂語形式作宾語等等概念統一起来?

九 一些比較局部性的問題

36. “有”字的用法。“有”字引起兼語么?(例: “有一个人来看你。”)

37. 副詞用在句末, 前面有停頓的, 北方方言里(根据自己的方言記錄)有哪些个?(例: “大家来了么, 都沒有来呀, 还。”) 在詞类上是否引起了新問題?

38. 趋向性的补語“来”、“去”、“回来”、“过去”在北方方言里的用法。(例: “派出去一个人”, “派出一个人去”, “派一个人出去”, 是否三者都能說? 意义和句型变化上是否各有区别?)

39. 趋向性补語的“引申”用法, 象“看上去”, “走起路来”之类, 在句法上和一般的趋向性补語有何分別?

40. “来”和“去”的用法。(“来”的用法比“去”广泛。)

我来看一看 (比較輕音)

我吃飯来了

用笔来写字

派出一个人来

二十来个人

一来…, 二来…

(还有别的用法, 有的不是北方話的也不妨补上。)

这些“来”字是否一类? 哪些是詞哪些不是? 是詞的, 归哪一类詞?

(“去”同样处理。)

41. “着”“了”“过”是怎样表达時間概念的?

42. 上文14題提到介詞可以分为两大类。每一类之中还能分小类么?

43. “給吃了”的“給”是什么詞?

44. “在念書”的“在”是什么詞? 和“住在这里”的“在”是否同类?

45. “到北京来”和“来到北京”的“到”是否同类?

46. “的”字(不是“小心地”的“地”)是“詞尾”还是詞? 还是在某种条件下是“詞尾”, 在某种条件下是詞? 假如是詞, 該归哪一类詞?

47. “得”字(“吃得飽, 吃不飽”的“得”)是詞么? 該归哪一类詞?

48. “所”字在現代漢語里是哪一类詞?

49. “难吃, 容易做”/“好去了”/“好看”这样的結構該怎样分析? 是否同类?

50. “連×都×”, “越×越×”, “隨×隨×”等等結構該怎样分析? 是單句还是复句? “連、越、隨”等是哪一类詞?

51. “方位詞”(“×上、×里、×东边、以內、之中、×东…”)都是同一类么? 在構詞法上各占什么地位? “×上”等等是否一个所謂“向心格”的詞?

52. 長的結構的兒化, 在語法上該怎样处理? (請尽量列举資料。)(参: 《漢語的構詞法》第20章第1节說“兒”, 科学出版社版, 131頁。)

53. 說“是”。“这花兒是紅的”, “这花兒是紅”, “是誰摘了这花兒?” “这个問題, 是人都明白。”…是同一个“是”么? “不是、倒是、就是、还是”等, 是多音詞么? 是, 不是, 各和句子的分析有什么关系?

把話說得簡洁些

郝小洲

星期六晚上, 我到电影院去看电影, 听放映員这样广播: “現在馬上就要开始放映了。…”这是一句很平常的話, 可是說的是这么囉嗦。說“現在就要放映了”不是可以嗎?

又有一次, 我去听报告, 在报告前, 主持报告会的同志这样宣布: “全体到会的諸位同志們…”这也够重复。“全体”和“諸位”在这里是一样含义, 况且还有个“們”字, 不必叠床架屋地用上这么些。“到会”更不必用。

我們的电影院是进行宣傳教育的場所, 报告会是进行宣傳教育的場合, 职工和干部同志們應該把話說得簡洁些、精煉些, 这不但有利于进行宣傳教育, 而且也有利于促进漢語的规范化。

语言学名词解释 (六)

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編

68 語言分类法

語言分类法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把語言进行分类的方法。目前在語言学中最著名的語言分类法是形态学分类法和發生学分类法。形态学分类法主要是根据詞的語法构造进行分类的方法；發生学分类法主要是根据語言的共同起源和“亲屬关系”进行分类的。其他还有一些語言分类的方法，如：概念分类法，这主要是根据語言表达概念的不同手段来进行分类的；心理学分类法，这是形态学分类法的又一特殊形式；阶段分类法，这主要也是根据形态学的标准把語言划分为不同阶段的一种分类法；等等。（請分別參看各分类法的名詞解釋）

到目前为止，这些分类法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些缺点，但比較起来，發生学分类法在科学上是最有价值的。（赵）

69 發生学分类法

發生学分类法又称譜系分类法，是把有共同起源的語言按照它們的亲屬关系进行分类的方法。語言的“亲屬关系”是指从同一个“基础語”（有人称它为“母語”）分化出来的語言，它們在基本詞彙和語法构造上有着显著共同点。怎样知道有些語言是来自同一个“基础語”的呢？这主要是运用历史比較法（关于这一方法請參看“历史比較法”）并且联系各民族的历史来找出它們發展的过程和起源的。

对語言亲屬关系的研究早在中世紀就开始了。但是發生学分类法的建立还是在十九世紀才开始的。当时很多語言学家把生物学現象和語言現象混同起来，如德国語言学家施来赫尔（A. Schleicher 1821—1868）就提出了“譜系树”的理論，也就是把語系的形成描繪成树一样，主干生支干，支干生分枝，分枝又生分叉，也好像生物中母生子，子生孙的关系一样。这个學說曾获得广泛傳播。因此这样一些术语，如“亲屬关系”、“語系”、“語族”、“語支”等就一直沿用到今天。但是，我們必須明确，作为社会現象的語言間的关系和作为自然現象的生物中的“亲屬关系”是截然两回事：語言間的关系应当看成是历史的現象，而絕不是生物学的現象。

由于語言材料的限制以及运用發生学分类法研究語言間的关系也还不够，特别是它所运用的历史比較法还存在一些缺陷，因此世界上許多語言至今还没有

弄清楚它們的亲屬关系，如日本語、朝鮮語、巴斯克語等。即使已經确定的一些語系和語族，研究得也还不够透徹。根据發生学分类法可以分出以下一些語系：汉藏語系、印欧語系、阿尔泰語系等。其中对印欧語系的研究比較多，也取得了一些成績。汉藏語系的研究进展和成績都不大，这首先是由于过去对它沒有認真地研究，另外，对汉藏語历史比較的研究方法还需要我們进一步研究。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們对汉藏語系的历史比較研究有了开展。怎样进一步解决汉藏語系中語言間的关系，并以此丰富普通語言学的理論，这将是我国語言工作者必須担当起来的一项重大的任务。

發生学分类法虽然有一些缺点，但是它在目前語言的分类法中，还是科学上最有价值的一种。这一方法是按起源的原則来归类的。同时也是历史的分类，这一点十分有意义。恩格斯和斯大林对这一方法都曾予以很高的评价。（赵）

70 概念分类法

語言的概念分类法是美国語言学家薩丕尔（E. Sapir）提出来的。薩丕尔反对一般的形态学分类法，認為它只适用于一部分語言，而且界綫也不清；因此提出根据概念进行分类。首先，他把語言中所表达的概念分成四类：

第一类，基本的（具体的）概念：即以独立的詞或詞根所表示的，如汉語的“人”、“手”等。

第二类，派生的概念：以构成詞干的附加成分所表示的，如英語的“farmer”（农民）中的“er”。

第三类，具体的关系的概念：以非詞根成分加到詞根上去或內部修飾，但它在詞的意义以外还表示关系，如英語中“generalize”（普遍化）中的“lize”。

第四类，純粹关系的概念：以非詞根成分加到詞根上，內部修飾，独立的詞或詞序表示具体成分間的关系，以此形成句法形式，如汉語的詞序。根据这四种概念，他把語言分成四类：

1) 純粹关系的語言

（有第一、四类概念的）
A. 簡單的：詞干只有基本概念。
B. 复杂的：詞干有派生概念。

2) 混合关系的語言

（有第一、三类概念的）
A. 簡單的：詞干只有基本概念。
B. 复杂的：詞干有派生的概念。

薩丕尔認為这种分类法很灵活，因为这四类还可以根据詞干所加附加成分的紧密程度再分粘着、融合、

象征次类等，而根据词的组成又可以再分为综合和分析等。总之，他认为语言是历史的复杂的结构，因此分类不能固定。

其实，萨丕尔的語言概念分类法并不能象他所想象的那样代替形态学分类法，因为它同样有形态学分类法的所有缺点，而且更为复杂。(赵)

71 形态学分类法

語言的形态学分类法是根据語法结构的特点来进行分类的，并且以語言的形态构造作为基础，其中以詞的结构作为主要标准。

根据詞的形态构造把語言进行分类，历来的主張很多。最早提出出来的是德国的語言学家弗·施列格尔(F. Schlegel)，他在1808年就提出把語言分成有内部語音变化的有机語言和只是詞根上加形态变化的无机語言，以后有人提出“三分法”、“四分法”、“六分法”等。但一般比較公認的是分为四类：

1) 詞根語(或称“孤立語”)：主要的特点是詞不变化，詞与詞之間的关系只以詞序来表达。如汉語的“天”、“地”、“人”等沒有詞的形态变化。汉語、越南語和非洲某些土著語言属于这一类語言。

2) 粘着語：主要特点是詞有附加成分，詞根和附加成分間联系松，每一个附加成分表示一个語法意义，如阿尔泰語、芬兰-烏格尔語属于这一类語言。

3) 屈折語：主要特点是附加成分同詞根結合紧，詞内有語音变化，附加成分和語法意义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如印欧語就是属于这一类語言。

4) 多式綜合語：主要特点是詞包含有各种成分，这些成分相当于别的語言的独立的詞，因此它的一个詞相当于其他語言的一个句子。如美洲的某些印地安語就属于这一类語言。

在形态学分类法中，还有人把屈折語分出分析和綜合两种类型。分析語主要是靠虛詞来表示語法关系的，而綜合語主要是以詞的形态变化来表示的。

形态学分类法的缺点是它不能全部概括世界上所有的語言，它們之間的界綫也很难划分。而且有人認為語言的發展阶段是由孤立語發展到屈折語，似乎屈折語才是最高級的語言，这种看法也是十分錯誤的。

形态学分类法的主要优点是对語法的静态描写有好处，它可以明确某一語言的一些基本特征。

語言形态的發展不能認為只是以一种方式發展，而且一种語言的类型也可能發生变化。我們應該注意將發生学分类法和形态学分类法联系起来研究，也就是把静态的研究和歷史的研究結合起来。(赵)

72 粘着語

粘着語(又称胶着語)是語言的形态学分类中根据詞的构成方式划分出来的一种語言类型。这类語言的主要特点是：将具有

一定語法意义的附加成分接在詞根或詞干上来形成語法形式和派生詞。粘着語中的詞同綜合語一样，都具有表示詞汇意义的詞根和表示語法意义的附加成分(包括构詞成分和构形成分)，但它們彼此的結合并不紧密，附加成分好象是粘附在詞根上似的，所以叫做“粘着語”。

粘着語的特点如果同屈折語进行比較，那就更为明显了。

首先，屈折語詞根中的音位可能發生交替(即内部屈折)，作为表示語法意义的手段，而粘着語的詞素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發生变化，即使有变化，也是純粹属于語音性質的，沒有任何語法意义。

其次，在粘着語中，一个附加成分只能表达一个語法意义，而某一語法意义也固定由一个附加成分来表示，因此当一个詞具有一系列語法意义时，詞内就要包含一系列的附加成分。例如土耳其語動詞詞根 sev- 表示“爱”，附加成分 -dir 表示第三人称，-ler 表示复数，miş 表示过去时，-erek 表示将来时，那么 sev-miş-dir-ler 就是“他們从前爱”的意思，sev-erek-dir-ler 就是“他們将要爱”的意思。

再次，粘着語的詞根和附加成分都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就詞根說，它們不和附加成分結合也能独立存在；就附加成分說，由于每一附加成分都只表示一种語法意义，而每种語法意义又固定用一个附加成分来表示，所以当一個詞的形式中存在附加成分时，只要根据这个形式的語法意义和讀音就能很容易地把其中的附加成分区分出来。由此可見，粘着語中詞根和附加成分的結合是并不紧密的。

在关于屈折語的說明里可以看到，粘着語的上述第二和第三个特点也是和屈折語不同的。

属于粘着語类型的語言有：突厥語系、芬兰-烏格尔語系、班圖語系和日本語、朝鮮語等。(叶)

73 屈折語

屈折語是語言的形态学分类法中根据詞的构成方式划分出来的一种語言类型。屈折語中的詞除表示詞汇意义的詞根外，还有表示語法意义的附加成分(包括构詞成分和构形成分)，詞根和附加成分結合得非常紧密。这种类型的語言的主要特点是依靠内部屈折和外部屈折来形成詞的語法形式。所謂“内部屈折”是指替換詞根中的某些音位。例如俄語的 избегать(避免)是未完成体動詞，完成体是 избежать，它們的詞根 бег—беж 中就有輔音的交替 г—ж；又如英語的 foot(脚)是單數名詞，复数是 feet，它的單、复数就有元音的交替 oo—ee。所謂“外部屈折”一般是指詞尾的变化。例如俄語的 рука(手)是單數主格，單數的其余五格为 рука́, руке́, ру́ку, руке́, руке́,都是通过詞尾的变化来表示不同的

格位。屈折語的一个詞尾往往表示几个語法意义,象 *рука* 的 -а 就同时表示阴性、單数、主格。同时,为了表示相同的語法意义,在不同的詞中可以采用不同的詞尾,例如俄語 *девочке* (女孩) 中的 -е 和 *лошади* (馬) 中的 -и 都表示阴性、單数、与格; *лежишь* (你躺) 和 *читаешь* (你讀) 中的 -ишь 和 -ешь 都表示現在时、單数、第三人称。所以在同一种語言里就有几种名詞变格和動詞变位的体系。屈折語中詞根和附加成分結合得非常緊密,有些詞根如果没有附加成分和它們結合,就不能作为独立的詞来应用。从語音上看,詞根和附加成分結合的地方往往会發生語音变化,把它們溶合起来(例如俄語 *детский* 一詞詞根中的 т 和后加成分中的 с 結合讀成 ц)。由于以上原因,要区分屈折語中的詞根和附加成分就比较困难。

印欧語系、閃語系和含語系都属于屈折語的类型。俄国的語言学家福尔吐那托夫(Ф. Ф. Фортунатов)曾认为閃語系与含語系兼有接近粘着語的某些特征,而把它们列为另一种类型,叫做“屈折-粘着語”,并认为只有印欧語系才属于屈折語的类型。从这里也可看到語言的形态分类只是大致的分类,其間存在着不少交叉的現象。(叶)

74 綜合語

綜合語是語言的形态学分类法中根据詞和詞之間語法关系的表达方式划分出来的一种語言的类型。同綜合語相对的,是分析語。

綜合語依靠詞本身的形态变化,如內部屈折、外部屈折、重音等来表示詞和詞之間的語法关系。它的主要特点是格的存在,例如俄語的 *книга петра* 和拉丁語的 *liber Petri* (彼得的書) 都是將“彼得”变为生格来表示詞之間的語法关系。此外,動詞能綜合地表示語法意义,形容詞的級通过形容詞本身的屈折来形成等,也可以算作这类語言的特点。例如拉丁語動詞 *venit* (他到了) 和形容詞 *longior* (更長)、*longissimus* (最長) 就分別相当于分析語类型中法語的 *il est venu plus long* 和 *le plus long*。

純粹的綜合語,也就是說,詞之間所有的語法关系都用詞的形态来表示的語言,是并不多見的。通常除了詞本身的形态以外,还用虛詞表示語法关系,这种語言也叫做綜合語。

本来,划分綜合語和分析語的目的,主要在于能够更精密地确定作为語法單位的詞的界限,只是对屈折語的再分类,并不涉及其他語言。后来有人把这两个概念推广到屈折語以外的語言,例如說汉藏語系的語言既是詞根語又是分析語,等等。关于这两个概念的應用範圍問題,在語言学界还有不少爭論。

在印欧語系的範圍內,属于綜合語类型的,有古代

的梵語、古希臘語、拉丁語、古斯拉夫語等,以及現代的絕大多數斯拉夫語言、德語、立陶宛語等。(叶)

75 分析語

分析語和綜合語相对,是語言的形态学分类法中根据詞和詞之間語法关系的表达方式而划分出来的一种語言的类型。

分析語和綜合語不同,它不是通过詞的形态变化,而是借助于虛詞、詞序这样一些詞以外的因素来表示詞和詞之間的語法关系的,例如“彼得的書”,譯成法語便是 *le livre de Pierre*, 其中用虛詞 *de* (的) 来表示 *livre* (書) 和 *Pierre* (彼得) 的关系。

在印欧語系的範圍內,属于分析語类型的,有羅馬語族的各種現代語言,英語、丹麥語和斯拉夫語族中的保加利亞語,等等。

有的資產階級語言學者認為,由綜合語类型变为分析語类型是标志着語言的进化。这是一种錯誤的理論。因为各種語言的語法結構都是按照自己的內部規律在不斷改进、不斷完善的,發展既可以循着綜合的方向(例如俄語),也可以循着分析的方向(例如英語),方向本身并不能說明進步與否。事實証明,俄語同英語一樣,發展到現在早已成为世界上最丰富、最精密的語言之一了。(叶)

76 詞根語

詞根語(又称孤立語,无形态語)是語言的形态学分类法中根据詞的构成方式划分出来的一种語言类型。这类語言的主要特点是:在一个詞里面只有詞根,沒有附加成分,詞的本身沒有变化,因此各種詞类在形态上不具备定型性,句子里詞与詞之間的关系通过詞序、輔助詞等的手段来表示。这类語言中的詞,由于只由詞根組成,所以称为“詞根語”。“詞根語”还可以叫做“孤立語”或“无形态語”。所謂孤立語,是指其中的詞本身不能显示与其他詞的詞法关系,它們的形式也不受其他詞的約束,因而具有孤立的性質。至于“无形态語”这一名称则是从这类語言中的詞沒有形态变化的角度來說的。

世界上各種語言的結構相当复杂,根据詞的形态特点只能把語言大致划分为几种类型,事实上沒有一种語言完全适合某个类型的标准,例如純粹的詞根語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般說来,例如汉藏語系的諸語言可以归入詞根語这种类型。

就漢語來說,虽然大多數的詞由詞根組成,如“天”、“地”、“人”、“火車”、“飞机”、“語言学”,等等;但是漢語到近代已經产生了一系列由实詞虛化而来的附加成分,它們中除了构詞成分外,还有构形成分。例如“第一”、“初五”、“老虎”、“桌子”、“花儿”、“石头”等詞中的“第”、“初”、“老”、“子”、“兒”、“头”就属于构詞成分;“孩子們”、“拿着”、“看了”、“吃过”、“念下去”、“想起来”等詞中的“們”、“着”、“了”、“过”、“下去”、“起来”

等就屬於構形成分。可見漢語有構詞成分，而構形成分的出現，說明漢語也具有一定的形態變化。（這個問題，語言學界還有爭論。）不過總的說來，漢語的形態是少的，漢語語法的特点並不表現在形態方面，我們可以把漢語基本上歸入詞根語這一類型。

有些資產階級語言學者認為詞根語是原始的、落后的，從而宣稱漢語是一種落后的語言。這完全是一種無知的污蔑。首先，任何一種活着的語言都能很好地服務於使用這個語言的社會，滿足人類一切活動中交際和交流思想的需要，它們都是好的、稱職的；而且語言的發展各有自己的內部規律，發展內部規律的不同當然不能作為衡量語言的標準，因此不同的語言類型並沒有高低優劣之分。其次，語言是隨着它所服務的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由於各民族發展的不平衡，語言可以有比較發達和比較不發達的分別，這主要須看它的詞匯是否豐富，語法結構是否完密。用這一正確的標準來衡量漢語，應該得出怎樣的結論呢？漢語的歷史悠久和文獻豐富是世界上最有的，它的詞匯中的詞數已達百萬個，語法結構也很完密，我們可以用它來表達最精密的思想、最豐富的感情，因此漢語是世界上最發達、最豐富、最完善的語言之一。（叶）

77 擬聲詞

用摹仿事物或動作的聲音的方法去指明這些事物或動作而構成的詞，叫做擬聲詞，有人叫做象聲詞。比方，摹仿鐘擺聲音的“滴達”，摹仿跳入水中的聲音的“扑通”，摹仿打鼓的聲音的“鑼鑼”，摹仿某種動物的叫聲如“貓”等，都是擬聲詞。擬聲詞有兩種：一種是同感嘆詞相似，只摹仿事物或動作的聲音而不指出這些事物或動作的名稱，一種是既摹仿事物或動作的聲音而又指出這些事物或動作的名稱的。前者的例子：“拍拍！對面開了槍！”“砰！我把門打開了。”“喔！喔！喔！雞叫起來了。”後者的例子：“乒乓球”、“貓”、“鴨”、“柯達”。前一種擬聲詞雖然摹仿了事物或動作的聲音，但卻不指出這些事物或動作的名稱。比方說，“砰”固然是打門的聲音，但指明打門的聲音的詞却是“打門聲”，不是“砰”，“砰”甚至可以表示任何一種類似打門聲的聲音。這一種擬聲詞也同感嘆詞一樣，不成為句子成分，“砰！我把門打開了”之中的“砰”既不是句子中的主語，也不是句子中的謂語，或賓語、補語、定語、狀語等。不過也同感嘆詞一樣，在某種場合下，可以被用來作為句子的成分，於是它也就具有名詞、形容詞、動詞或副詞的作用了。比方說，在“手槍砰了一聲”這個句子中，“砰”是動詞性謂語，它具有動詞的作用，是個句子成分。因為這種擬聲詞和感嘆詞有這些相同的特点，有的語言學家就把擬聲詞看成感嘆詞的一種。但是，應當指出：擬聲詞雖然同感嘆詞有這些相同之點，但其主要特点卻與感嘆

詞不同。它是摹仿事物或動作的聲音而構成的詞，是表示說話人的感情或態度的，然而感嘆詞卻是說話人的感情或態度的。另一種擬聲詞儘管也是事物或動作的聲音的，但其作用卻在於指出這些或動作的名稱，代表概念。比方說，“乒乓球”儘管依照打這球時所發出的“乒乓”的聲音而構成的，它卻已經是這種球的名称，表示這種球在人腦中映成的概念，並在句子里起着句子成分的作用，例如“我買乒乓球去”這個句子里起着賓語的作用。這一種擬聲詞具有名詞、動詞、形容詞或副詞等作用。

78 感嘆詞

感嘆詞是一種特殊的詞類，與其他的詞類不屬於同一的範圍，它表示說話人的感情和態度，但不指出其名稱，同時也不作句子成分的詞。例如漢語的“哎呀！真不巧！”（表示惋惜）“噢！原來如此！”（表示驚訝）“嗨！這怎麼得了！”（表示嘆息）這裡的“哎呀”、“噢”、“嗨”都是感嘆詞，它們都表示說話人的某種感情，同時却不用作任何成分——既不是主語或謂語，又不是賓語、定語或補語，更不是補語。“感嘆詞”這個術語來自拉丁語 *interiectus*，它的意思指的是“干預”或“插入”，即之，即在通常的句子中插入句子以外的成分來干預句子的意思。所以感嘆詞并不用作句子的成分，而孤立地插入句子之中以表示說話人某種感情或態度，例如漢語表示驚訝、悲哀、喜悅、恐怖等感情或態度時，有“啊、喲、噢、嘿、喂、呸、哇、哈哈”等詞。因為感嘆詞是一種特殊的詞類，與其他的詞類不屬於同一範圍，有的語言學家就認為，其他任何一種詞類，甚至由其他任何詞類的詞所構成的整個詞組，只要不是用來指出事實的名稱，並且不是作為句子的成分，而是拿來表示說話人的各種感情或態度的，都可以叫做感嘆詞，例如“來！”“請！”“謝謝！”“對！”“的確！”“不！”雖然這些詞本來不是感嘆詞，但在這些地方成了感嘆詞。不過，這是廣義的理解，狹義的感嘆詞只指專為表示說話人的某種感情或態度的，是不起句子成分作用的詞。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把感嘆詞拿來指明某種事實的名稱，那末，這種感嘆詞也就被用為其他的詞類。例如我們說：“他叫了一聲‘哎呀！’”“人發出‘嗨’的嘆息。”這裡的“哎呀”指明客觀事實中的惋惜的聲音，並且是句子中的賓語，“嗨”指明客觀事實中的嘆息的聲音，並且是句子中的定語，因此就具有名詞或形容詞的作用。一般的情形，因為感嘆詞不是句子的成分，它可以插入句子任何地方，例如“哎呀，這簡直沒有辦法了！”“這，哎呀！簡直沒有辦法了！”“這簡直，哎呀！沒有辦法了！”。漢語里還有一種用在句子末尾的感嘆詞，表示整個句子是用某種感嘆的口氣說出來的，例如，“我真想不到有這樣的結果啊！”這裡的“啊”就是用在句子末尾的感嘆詞，這種感嘆詞就稱為句終感嘆詞。（高）

79 自然主义学派

自然主义学派的创始人是德国的语言学家施来赫尔(A. Schleicher 1821—1868)。

这一学派的主要特点是把语言看作自然界中的有机体，并且企图把生物学的观点拿来研究语言的发展及其分类。现将这一派的施来赫尔作为代表加以说明。

施来赫尔认为语言同自然界的生物一样都有生长和衰亡，他并且把语言按照形态结构分成了三种基本类型：孤立语、粘着语和屈折语，认为这就是语言发展的三个阶段，到了屈折语以后就走向衰亡了。另外，他把自然科学中的谱系的原理运用到语言的分类上，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好比原始汉藏语是母亲，生下四个儿子：汉语、泰语、藏缅语、苗瑶语；儿子又生孩子，如藏语又生藏语、缅甸语、景颇语、彝语等。施来赫尔又认为语言和生物一样有生存竞争。他企图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语言科学中来。1863年他曾写了一本《达尔文理论与语言科学》(Die Darwinische Theorie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1865)。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施来赫尔的语言学理论受黑格尔的哲学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是很深的。施来赫尔自然主义的理论还表现在《语言对于人类自然历史的意义》(Über die Bedeutung der Sprache für die Naturgeschichte des Menschen)一书中。他把这理论运用到具体的语言研究上主要表现在《德语》(Die Deutsche Sprache, 1860)中，他的第一部主要的系统论著《印欧语比较语法纲要》(Compendium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1861—62)对以后的语言学曾有相当大的影响。

语言学中自然主义的观点还表现在其他一些语言学的作品中，如穆勒(Max Müller)的《语言科学教程》(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1861)，拉普(M. Rapp)的《语言生理学试探》(Versuch einer Physiologie der Sprache, 1840)以及辉特尼(W. D. Whitney)的《语言的生命和发展》(Life & Growth of Language, 1875)。

自然主义者重视了活的语言材料，如施来赫尔对梵语和斯拉夫语的收集，并且在语音规律上作了指明客观的一些研究，这是他们的成绩。但是把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同自然现象中的生物混为一谈，这是他们带有根本性的错误。至于他们把语言发展分为阶段并认为语言发展到屈折语就走向衰亡，这也是十分错误的。(赵)

80 新语法学派

新语法学派(Junggrammatiker)是十九世纪70年代在德国形成的，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有：德国的勃鲁格曼(K. Brugmann 1849—1919)，奥斯脱霍夫(Osthoff 1842—1907)，莱斯琴(A. Leskien 1840—1916)，保罗

(H. Paul 1846—1921)，德尔勃吕克(B. Delbrück 1842—1922)；丹麦的维尔纳(K. Verner)；意大利的阿斯科利(G. I. Ascoli)等。

他们的基本原理主要表现在1878年勃鲁格曼和奥斯脱霍夫在第一期《形态研究》(Morphologische Untersuchungen)的序言中，这可以说是新语法学派成立的宣言。另一篇是保罗在1880年写的《语言历史的原理》(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这本书可以说是这学派原理的比较完全的综述。再就是勃鲁格曼和德尔勃吕克的《比较语法纲要》(Grundriss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1886—1900年)。

新语法学派的主要理论有以下几点：(一)反对自然主义把语言看成是有机体，以及语言服从自然发展的规律；他们把语言看成是个人心理活动的历史变化；(二)他们对语音变化的规律提出了两项原则：1)语音变化服从一种“盲目的必然性”，不允许有例外，2)类推作用在组成新的形式中有巨大作用；(三)他们认为构拟原始语并不能看作是语言亲属关系比较研究的唯一目的，具体的活的语言的历史研究被提到了第一位；(四)反对把语言发展分为具有不同规律的“史前”和“史后”两个时期，他们提出语言历史发展的一致性。

根据以上的主要理论，我们可以看出新语法学派在十九世纪时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譬如他们反对自然主义的生物观点和形而上学，强调语言研究的历史主义的观点。新语法学派的一些科学活动对现代的语言学也还是有积极作用的，譬如由于他们重视了活的语言的研究，因此曾对个别语系作了大量的历史比较研究，尤其是对印欧语系的研究，又如在亲属语言中建立语音对应的确定的方法，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根本不能接受新语法学派对语言本质和语言发展规律的歪曲。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曾经明确地提出语言是社会现象，它随着社会的發展而發展，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语法学派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把语言只看成是个人心理活动的历史变化，而且过分夸大类推作用的错误。

另外，新语法学派研究的范围也太狭窄。他们对语言结构的研究主要只是语音和形态方面，至于句法等方面的研究却被忽视了。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对语言系统的概念是格格不入的。(赵)

更正：本刊1959年2月号81面倒15行“向群”应为“向熹”。

讀者 作者 編者

要繼續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

我是一個語言學初學者。從1954年以來，每期的《中國語文》我都較仔細地閱讀，有的文章甚至讀到十遍。《中國語文》對我的教學和進修的是很有幫助的。

正因為《中國語文》對我的幫助大，我希望它辦得更好一些，希望它在祖國朝氣勃勃大躍進的今天也來一個大躍進。因此，我建議：

1) 關於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語言學理論的批判要繼續深入地搞下去。

2) 繼續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因為過去作者的面不夠廣，多數是幾個有名的學者（當然他們應該寫，而且應該多寫）；新生力量的培養較忽視，這半年來，青年作者多起來了，這是好現象。至於編輯部同各地的語言學者或語文教學工作者的聯繫，我看也還不夠，象我們湖南師範學院語文系語言組，幾年來，編輯部沒有約過稿。

3) 要不斷提高內容質量。過去發表的文章質量，大部分是好的，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參考價值，但也未盡如人意。尤其是個別文章的語言不簡潔明確，佶屈聱牙，讀起來頗費勁。

最後，我期望並且深信《中國語文》同全國各方面的事業一樣能夠大步地躍進。（湖南師範學院 張應德）

講修辭學的文章太少

《中國語文》的內容，修辭學方面的文章占分量太少。可以說這一年來沒發表過這方面的文章。

此外，我以為應增加篇幅，發表的文章的範圍應擴大，如詞匯研究、語言史、作家語言風格的研究等。並且應考慮多和讀者、作者聯繫。（上海 林文金）

請注意一下寫作體例吧！

近來寄給我刊的來稿來信中，還是常常有這樣情況：

1) 字迹十分潦草，亂造一些很難辨認的簡體，甚至把自己姓名和通訊處也寫得使人完全無法辨認。

2) 隨便用筆記本紙兩面書寫；

3) 在寫作上太不注意文章行款和標點體例；

4) 引文和所注出處十分馬虎，叫人無法核對。（如本期“語文短評”欄安汝磐同志一文在加工後所選的15個例句中，就有錯誤八處；宋玉柱同志一文在工時也發現五處引文錯誤。）

由於有這些情況，我們在处理這樣的來稿來信便費了很多不必要的勞力。按說，我們在寫作時如果稍稍注意一下，本來是可以避免上述情況的；可有些人在寫作時很少考慮到尊重別人的勞動，提起來只顧自己“方便”，不想想所寫的東西放在編輯部要費多少周折。比如，一封信提出什麼問題，本來要我們答復的，可是寫信的人姓名無法認出，通信處得不明確，我們怎樣處理呢？一篇文章儘管有內容，是字迹亂得好象故意同人為難，或者兩面寫起來，這樣的稿件如果採用的話，編輯部加工和印廠排字，就要費多少事呢？因此，我們要求熱愛本刊的讀者們在同我們聯繫或者為本刊寫稿時，務必儘可能做到：1) 字迹寫清楚些；2) 用有格稿紙單面書寫；3) 姓名住址寫清楚；4) 文章標點體例盡量同本刊所用一致。實，這些事我們曾一再在本刊上提出過請求，1958年1月號上還發表過《關於寫作體例的話》，希望親愛讀者和作者多多注意一下吧！

（本刊編輯部）

每冊定價人民幣0.24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中國語文

月刊

1959年3月號

總第81期

1959年3月22日出版

編輯者 中國語文編輯委員會
北京西城牆王府夾道7號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前街45號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橋

總發行處 北京市郵局

訂購處 全國各地郵電局

代訂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另售處

定價：三個月0.72元，半年1.44元，全年2.88元；寄費1.平郵寄費不計，2.掛號郵費由訂戶負擔。

1-18, 453

代號3-44